

01-简评土地改革运动

帖子由 于松然 » 2024 年 1 月 5 日



作者：于松然

早在 1946 年 5 月，根据毛泽东的意图，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首次提出了实行土地改革的政策。

这个政策，打着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旗号，开始了暴力杀掠式土地改革。而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则是承认土地投资人合法权益下的和平均田。

毛式土改是划出 8%~10%的地主、富农，发动 50%~60%的贫雇农（主要是贫雇农中的痞子、二流子和见利妄为分子）对他们批斗、掠夺和打杀，从而使农村占多数的贫雇农，能跟着共产党走，为夺取政权聚集力量。据资料记载，搞的最凶、杀人最严重的有胶东、晋绥、河北等地。他们的残杀手段，惨绝人寰。具体有：砍头、活埋、剥皮、石头砸死、烧死、马后拖死、树上吊死等等，甚至地主家怀了孕的女人，都要被剖腹，将婴儿取出活活摔死。有些地方，不仅分地主、富农的土地和浮财，还要分他们的老婆、女儿。1947 年，国军开始九月攻势，地主、富农、中农组织的还乡团，开始报仇，贫雇农遭到了报复。还乡团报复手段之残忍，不下贫雇农。挑起仇恨，这是中共土改的主要目的之一。因此，屠杀与报复，是分而治之策略的体现。有时，为了弱化敌人的反抗，平服贫雇农中善良群体的不满情绪，中共也纠正过一些残酷做法，但都是权宜之计，服从于土改的主要目的。对此，有共产党学者教导学生：“要从革命需要出发去理解这种杀戮的‘必然’性，而无庸道德价值判断。”

毛的这种出于政治动员的反人权、反人类的残忍谋略，果然奏效，贫雇农及其子女受到鼓励，纷纷参加解放军或地方武装和政府，同国民党军作战。

中共夺取政权以后，与台湾国民党的“和平土改”相反，于 1950 年在全国继续开展了暴力杀掠式土改运动。与过去政策稍有不同的是，强调“团结中农”，分老婆、分女儿的相对较少。

毛曾多次批评“和平土改”是右倾思想，要求全党继续推行“行之有效”的杀掠式土改。据文献记载：山西兴县土改时，时任晋西北行政公署党组书记兼副主任的中共干部牛荫冠，在家乡召开“斗牛大会”。他以工作组组长的身份，坐在主席台上，批斗跪在台下的曾被毛泽东誉为开明绅士的老父牛友兰。令与会的父老乡亲们震惊的是，他居然亲手用铁丝穿了自己父亲的鼻子(穿牛鼻)，游街示众，致其父三天后暴毙。由于立场坚定，大义灭亲，牛荫冠步步高升，官至正部级的全国供销总社主任；但他再也没敢回过兴县老家。坐镇广东的中共省委书记陶铸、赵紫阳等，大搞“村村见血”的红色恐怖，即每村都要至少枪杀一个地主，以立“政威”。原北大学生乐黛云，回忆 1951 年她在江西参加土改的情景：她所在的村子划出了八个地主，被副县长一声令下，全部就地处决；其中有一个老实八脚的老人，在上海干了一辈子裁缝，省吃俭用，攒了一些钱，土改前不久，回家买了些地，刚好划上了个地主，也被处决了；为此，她一直想不通。1951 年在重庆郊区，笔者曾目睹过一个公审地主的场面：地主被押上台后，先后有两人上台，控诉地主欺压他们的罪行；台下打倒恶霸地主的口号，此起彼伏；控诉结束，主持人便代表人民政府，宣布判处地主死刑；当即地主被拉到台下，枪响应声倒毙，暴尸于台边；年约十二三岁的地主儿子，在他脑浆开花的父亲尸体前，冷笑了一声，转身扬长而去。——怨恨者控诉，代替了检方起诉；政府公审，取消了法院取证和庭审；官员口头宣判，抛开了判决书；立即执行，勾却了上诉；连封建王朝稍带人性的“秋后问斩”，都被中共废止了。一言蔽之：野蛮取代了文明！

土地改革被中共宣称为解放生产力的手段，但它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动员策略：挑起占农村大多数的贫、下中农与地主、富农之间的仇恨，毁灭他们之间存续数千年和谐依存的道德伦理价值，迫使他们尖锐对立起来，变成你死我活、鲜血淋漓的阶级仇恨关系，使农民多数人依附中共，从而达到树立共产党权威、巩固农村政权之目的。对那些不愿和不敢分地主、富农财产的多数贫苦农民，用少数痞子、流氓无产者的带头和软硬兼施、“说服教育”的办法，让他们都能分到些田地或浮财，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据著名学者梁漱溟回忆写道：“1951 年 9 月，我从四川土改工作后回京见到主席，谈到土改中死了不少地主阶级的人。主席说：台湾造谣说死了一千多万人；哪里有那许多？我估计全国合共大约六十几万人吧！”又据有关文献记载，土改中“依法”处决的地主大约有 60~80 万，加上土改中被打死和自杀的地主、富农，大约死亡了 100~150 万人，其中 20~30 万人自杀。（由于档案死不解密，数字版本颇多，有待进一步考证。）毛泽东认为，通过这种策略——御人权术，就能使大多数农民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

毛泽东的中共，以革命名义进行“村村见血”的暴力政治土改，是中共对农民的第一次掠夺：掠夺颠覆了使我中华民族数千年凝聚在一起的仁义礼智信和真、善、美传统价值，摧毁了农村数千年和谐依存的宗法关系，扼杀了中国人勤劳和智慧，迟滞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毛的暴力杀掠式土改，是击败国民党的政治策略，并非真心把土地均分给农民，使农民

都变成土地的真正主人。历史业已证明，土改刚刚结束，毛泽东的中共便开始了对农民的第二次掠夺进程：他们运用专政权力，通过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打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旗号，摧毁了土地私有制，剥夺了农民们的私有权，把农村包括土地在内的全部生产资料攫为党国所有，使他们“名正言顺”地变成了全国唯一的雇主；同时，在第二次掠夺中，他们制造了一大批以痞子、流氓无产者为主体的农村官僚特权阶级，并以这些人为代理，迫使农民变成了依附于他们的农奴。——这就是毛泽东时代。在毛泽东时代，现代农奴与雇主及其代理人的矛盾日益尖锐化，迟滞、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当代中国亿万农民，之所以在“瓜菜代”的贫困中煎熬了半个多世纪，落后的农业之所以长期得不到改观，其根源皆在于此。（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笔者紧急呼吁：每年的 5 月 4 日，即中共在 1946 年通过实行土地改革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的那一天，理应成为“中国土改大屠杀纪念日”，年年铭记，岁岁不忘！）

土地改革中，当民主人士章乃器，向毛泽东反映“对地主滥用肉刑乱打乱杀”的情况时，毛泽东说：“这是一场革命，群众发动起来了，即使有些过火的行为，也不能挫伤他们的积极性。”毛共把这类御人权术合法化，就为尔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开了蔑视道德、侵犯自由、践踏人权的先河，也为尔后继续愚弄和全面掠夺农民打下了基础。

02-简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

由于松然 » 2024 年 1 月 5 日



作者：于松然

1953 年，毛泽东把中共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表述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

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3 年春，中国土地改革刚刚完成，相当一部分农民开始买牲畜、农具发展生产时，中共便大造舆论说，“分散、脆弱的农业个体经济既不能满足工业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又有两极分化的危险”，并在当年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开展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合作化遭到了农民的普遍反对，很多地区发生农民闹退社、砍伐树木、大量宰杀牲畜等情况。对此，毛泽东却一意孤行，他要让“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高层，他大批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是“小脚女人”，有严重右倾思想，撤了邓的职；在下面，他派出农村工作队，用哄骗和压迫相结合的手段、强制推行合作化，打击反对合作化的所谓“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狠批农村干部的“三十亩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忘本”思想，积极支持“一碗一筷归个人，一草一木归集体”的彻底掠夺。一时间，强迫命令风盛行起来，数十万农民因不愿将自己的农具、牲畜入社而被捕，或跳河、或上吊自杀。在毛和中共的软硬兼施下，仅用了三年，便从农民手中，夺走了土地、农具、牲畜、种子等全部农业生产资料，实现了农业合作化。接着，到 1957 年，全国初级农业社先后跨进高级社。到 1958 年，农村全部实现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化，实现权变物资的转化。这种名义上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实质上是毛党所有制经济，农民由此变成了中共党政权力的雇佣，从而使中共实现了对农民的第二次掠夺。

为了强行推行合作化，加快权变物资的进程，毛用惯用的动员和镇压相结合的手段，即树立 5% “阶级敌人”当靶子，打成“反革命”，借以警告农民不准抗拒合作化。他明确提出：“反革命五年抓一百五十万，每年三十万”，“我主（张）多抓”，“大捉特捉是重点”。在“大捉特捉”中，约 10~20 万农民被打死或自杀身亡。

中共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也是通过工作队去组织实现，即抛弃了“自愿加入”原则，用动员+强迫命令方式，组成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或供销合作社，任何单干，都被批斗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从此，街上再也见不到修鞋的，剃头的，补锅的和修自行车的，因为他们都被集体化了，都成为合作社社员。到 1956 年底，手工业也基本实现了合作化。

相比之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要比农业和手工业改造容易些。因为，中共明确规定：“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过渡时期的一项基本任务。”经过镇反和“三反”、“五反”的工商业界人士，没有人敢反对。因为，人们已经领教过“三反”、“五反”的血腥：曾被毛泽东表彰过的中国民族工商业四个代表之一的卢作孚，跳楼自杀了；上海“冠生园”品牌创立者、一个勤俭起家的工商业者冼冠生，因不堪凌辱，也跳楼身亡了；据报导，在“五反”高潮的一两个月里，有一千多人跳楼。因此，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仅用了一年时间。在合作化高潮中，识时务的资本家，便敲着锣、打着鼓，乖乖地将自己经营的全部产业交给了中共。到 1956 年底，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全部实现了国有化，完成了一次“有世界意义的伟大历史事变。”成千上万个想不开的资本家、小业主，也纷纷跳楼自杀，被斥为“罪有应得”。

中共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道路，是一条中共对中国老百姓实行全面掠夺的道路。全面掠夺使毛泽东和中共变成了全国唯一雇主。在新雇主的统一领导下，各级官员（权贵）形成了

中国特有的官僚特权阶级，而这个官僚特权阶级为九十年代演变成红色亿万富翁打下了基础，一如共产主义世界那样。在这种政治、经济体制下，老百姓变成了被雇主和官僚特权阶级任意驱使、宰割的奴仆。——这些都是权力拜物教的产物！

毛泽东死后的 1978 年，凤阳县小岗村十八户农民，为摆脱贫困，以不上吊、不跳河和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无畏精神，秘密用按手印、分田到户，即实行大包干的办法，率先反叛毛泽东的农业合作化，砸开了套在他们身上长达 22 年的枷锁，受到全国农民的欢呼和响应。中共权力拜物教思想开始有所动摇，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民们很快把肆虐他们近三十年的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和农业社，送进坟墓。在八十年代，以红二代为代表的中国红色资本家们，无视五十年代前辈们的跳楼史，在权力保护下，跃跃欲试，九十年代开始发迹，“三个代表”到手后，他们便入党做官，在官商一体中大显身手。二十世纪末，在“三个代表”的官场里，权力崇拜有了恶性发展之势：“闷声发大财”、“有权就有钱”、买官卖官、贪污受贿、官员财产保密，等等权力腐败，为权力拜物教增添了一系列新内容。

中国有一条谚语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看看中国农民和资产阶级的先后不同遭遇，这条谚语可算灵验！

不过，权贵和御用精英们并不认同。他们著书说：“农业合作化运动在总体上也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实际需要”，是“人民的选择”；他们又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全面总结了我国农村工作中的经济教训，创造性地实行了一系列新政策，使农业和农村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繁荣的局面”，是“历史的选择”。对此，老百姓不能认同！在“舆论一律”、拒绝选举、人民无法用选票来表达好恶的一党专政下，当人民成了任由官员们驱使、宰割的奴隶时，所谓“人民的选择”，就是权贵和御用精英们对人民的奸污；在档案尘封，真相藏于密室，公正性被严重扭曲的禁律下，当历史成了任由官员们打扮的小姑娘时，所谓“历史的选择”，就是权贵和御用精英们对历史的猥亵。按照权贵和御用精英们的逻辑，就是说，过去搞合作化正确，现在解散也正确，总之，“一贯正确”；之于过去消灭私人资本经济，现在发展私人资本经济，当然也是“一贯正确”。——这就是权贵和御用精英们的谎言逻辑。

在“一贯正确”和一党专政的铁拳下，尽管政策翻了个个儿，中共一对翻个儿的折腾不作任何道歉，二对全面掠夺不作任何赔偿，因而，那些在合作化中自杀或遭枪杀的农民们，那些在资本国有化中跳楼的死难者们，没人敢为他们鸣冤叫屈！

在天翻地覆的大折腾、大掠夺、大屠戮的“三大改造”中，六亿老百姓在当上了“社会主义国家主人”的同时，却失去土地和工商业所有权，变成了雇佣和奴隶，而中共则在“为人民服务”的高歌声中，变成了腰缠全国所有生产、生活资源的唯一雇主。在雇主的“全面专政”下，中国老百姓的灵魂，没有得到过他们“罪己诏”的安抚，更没有得到过他们一句表示歉意的慰藉，得到却是“三个代表”所表达的“一贯正确”的谎言：“中国共产党始终都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03-简评人民公社运动

帖子由 于松然 » 2024 年 1 月 5 日



图注：（自左至右）上行：1、毛对亩产两万斤的批语；2、公社召开亩产万斤的誓师大会；3、亩产万斤报导；4、水利兵团出发。下行：1、吃在公共食堂；2、登梯摘棉花；3、养猪养成象。

作者：于松然

1958 年 8 月 29 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自此，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合称为“三面红旗”。借着大跃进的红色狂潮，一个大办人民公社的全民运动，在全国农村正式地普遍地开展起来，并迅速达到了高潮。据官方报导，到 10 月底，全国 74 万个集体所有制的高级农业社，变成了 2.6 万个“政社合一”的、集“工农兵学商政”为一体的、全民即国家所有制的人民公社，完成了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

制造典型是毛泽东和中共的拿手好戏。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他们一手打造的王国藩、徐建春等一系列政治典型，让他们肩负着党的红托儿使命，在“共同富裕”的旗帜下，把六亿农民拖进了共同贫穷的深渊。在人民公社运动中，他们如法炮制，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典型——遂平县嵒嵒山卫星人民公社，就被他们制造了出来。其中，国务院副总理谭震霖、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陈伯达、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和遂平县委书记蔡中田等领导干部，为制造这个典型费尽了心机。

根据“一大二公”、“便于领导”、“全民皆兵”和“大兵团作战”的毛泽东思想，他们把嵒嵒山卫星人民公社变成了一个兵营。

嵒嵒山人民公社实行军事化管理。全公社共建 27 个生产兵团，外加一个钢铁兵团。以生产队为一个团，团内设正副团长、政委。一个中队为一个营，任命了营长、教导员和参谋长；营长领导全盘生产，教导员负责思想政治工作，参谋长负责技术指导。营下边按村庄和作业小组，组成连、排、班。此外，各团还专门设立了水稻营、棉花营、红薯营。

由于军事化管理，嵒嵒山人民公社的农民，都被约束在“统一起床，统一吃饭，统一睡觉，统一上工和收工”的军事管制之中。为了达到“伟大领袖”提出的“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要求，许多村都把男女分开，编成连、排，分开居住，“所有男人住村东

头的营房，所有女人住村西头的营房，老年人带着孩子住留守营房。”夫妻也不例外。由于欲火难耐，有些小夫妻竟敢铤而走险，夜半跑到山里亲热。

被哨兵逮住后，以严重违犯军纪论处。好事者记录了斗争辩论他们的场面：

审者：“你们为什么干这见不得人的事？”

违者：“想哩。”

审者：“想，想，想，谁不想？你们就不会忍一忍？” 违者：“忍不住呀。”

经过辩论批斗后，触犯“军纪”者提高了认识。审者：“还想不想？”

违者：“急死也不敢再想了；谁再想就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

这个记录已无法考证；但毋庸置疑的是，公社男女分开的军事化管理，增加了年轻夫妇“野合”的可能性。

由于最低层的生产队长可以当团长、政委，共产党的官有低贱之嫌。于是，在全国各地人民公社实行军事化过程中，中共做出了严格规定：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分别编为团、营、连、排。刚刚当上团长、政委没多久还没过够大官官瘾的生产队长们，立刻变成了兵头将尾的小排长。共产党的官又主贵起来。

公社军事化管理，就要实行“统一吃饭”。于是，毛泽东倡导的公共食堂，便横空出世，大放异彩。由于毛将公社规定为“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政权体制，属全民所有制即国家所有，各级党和政府，在对农民实行平均分配的供给制和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制的同时，有权无偿地调配各营、连、排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调配他们的粮、油、棉等生活资料，这种被时人称为即“合理”又“合法”的“一平二调”，使公共食堂有了“可靠”的供应保障。有资料显示：嵯峨山人民公社共建食堂 301 个，9,364 户全部参加了食堂；全社实行粮食供给制，全年每人 500 斤口粮标准，无价供应，社员凭粮证吃饭，可以吃个肚儿圆。在典型的带动下，遂平全县实现了公共食堂化，建幼儿食堂 99 个、青壮年食堂 247 个、幸福食堂(老

人)126 个、综合食堂 1,667 个。在初期的公共食堂里，人们初尝共产主义硕果，可以尽情地吃，忘情地喝（见上图）。张艺谋在他的《活着》影片里，就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公共食堂两次饭局的画面：一次是大吃捞面条，一次是大嚼肉水饺。笔者在北大荒的公共食堂里，曾

有幸享受过一顿“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生活，吃的是油条，喝的是玉米粥。1958 年 11 月 2 日，《河南日报》报导：“公共食堂的建立，其优越性如旭日东升，放射出万丈光芒。”

公社军事化管理，使毛泽东的大兵团作战思想大放光芒。毛泽东一声号令“钢铁元帅升帐”，全国九千多万男女齐上阵，以人民公社“钢铁兵团”为骨干的炼钢大军，使砖砌的小炼钢炉遍地开花，火光冲天。尽管小高炉炼出来的多是不合格的钢铁，却硬是把当年全国的钢产量翻了一番，达到了 1,070 万吨。

公社军事化管理，给农业大跃进安上了一双任意高飞的翅膀。在《人民日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文章的启示下（见上图），嵯峨山人民公社放出一颗亩产小麦 3,821.9

斤的“卫星”。但“卫星”上天不久，便被其他省市放出更大的“卫星”所取代。不服输的嵯岬山人，咬咬牙，又放出了一颗亩产水稻 31,403.33 斤的大“卫星”。好家伙，一亩竟产水稻 3 万多斤，这在遂平县放高产“卫星”史上，还是第一次。然而，他们高兴没过多久，广西环江县亩产 13 万斤中稻的“超级卫星”，飞上天空，力压群芳，成了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单产冠军！嵯岬山人蔫了，不敢再咬牙了。但省委书记吴芝圃死不服输，他硬把河南 1959 年只有 210 亿多斤的粮食产量，上报成 450 亿斤，达到和超过了毛泽东要粮食“翻一番”、全国每人每年“平均有粮食 1,000 斤，猪肉 100 斤，油 20 斤，棉花 20 斤”的目标。

嵯岬山人虽不敢再放“超级卫星”，但社办工业却捷报频传：几个铁匠集中在一起，一座炉，几把大锤，门口便挂起了“嵯岬人民公社修造厂”的牌子；几个木匠集中在一起，各自带着他们的斧、刨、锛、凿，“嵯岬人民公社木工厂”便宣告成立；油匠们支起了一口大锅，小毛驴拉着沉重的油磨，踩着没尽头的磨道，转了一圈又一圈，油匠们仰着一张张油光闪亮的脸，庆幸他们已从农民光荣地变成了“嵯岬人民公社榨油厂”的工人……嵯岬山人大办工业捷报，引领了全国农村工业的大发展，为全国“以钢为纲”的工业大跃进，做出了贡献。尽管人民公社引领了工业大跃进，但在“七千人大会”上，国家主席刘少奇竟敢说，1961 年，工业“减产了 40%。”

嵯岬山人在大办大学中，成效显著。在各级政要的帮助下，遂平县“嵯岬山卫星人民公社红专综合大学”正式成立，实现了毛泽东关于“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号召，成了当年典型中的典型。全校共 10 个系，在校大学生 529 人。该校教授是土洋结合，土教授可能识字不多，是群众推举出来的能人，洋教授由原来的小学教师担任。毕业生不仅能种地、开拖拉机、“拔白旗”和批判资产阶级，还能写快板书，宣传毛泽东思想。在典型力量的推动下，全国工大、农大、夜大、红专班等高等院校，与“红专综合大学”争红斗艳，遍地开花，使毛泽东“书读得越多越蠢”的教育革命思想，大放异彩。据统计，全国高等学校由 1957 年的 227 所，到 1960 年，增加到 1,289 所，猛增 5.6 倍。嵯岬山公社社员，几乎人人都变成了大学生。

然而，让嵯岬山人没有料到的是，进入 1959 年，日子越过越艰难了。首先是公共食堂告急，粮、油、菜的供应越来越少，有些食堂连喝稀都喝不上。在打倒了彭德怀之后，1960 年 11 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必须坚守公共食堂这块“社会主义阵地”指示，向全国发布命令：“公共食堂必须办好。”“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须坚持。”由于中央的决定，嵯岬人、河南人乃至全国各地的干部和群众，谁也不敢解散公共食堂。于是，在“社会主义阵地”的公共食堂里，红薯叶、马齿菜、菜梗和菜叶，都派上了用场，有些食堂，甚至派上了玉米心、花生皮、嫩草根和树皮。不过公正地说，这些“食品”，比笔者在北大荒用玉米穗衣作淀粉充饥，要好吃一些。

公共食堂喝稀断粮，都是高产“卫星”惹的祸。

在农业大跃进、大放“卫星”的浮夸风中，毛泽东的人民公社，使全国粮食总产量从 1957 年 3,700 亿斤，“激增”到 1958 年的 7,500 亿斤，猛增 1.03 倍。上行下效，在遂平县，1958 年全县粮食总产量约为 3.03 亿斤，却“激增”为 10.03 亿斤，猛增 2.31 倍。大丰收了，国家征购粮油数量也“理应”增加。在遂平，1958 年底，国家征购也从去年的 800 万斤，猛增到 9,000 万斤（县委书记认购数）；全国呢？国家征购数也“理应”自 1957 年的 960 亿斤，增加到 1958 年的 1,500 亿斤，但阻力太大，只征购到 1,175 亿斤。到了

1959 年，各地照例高奏大跃进、大丰收的凯歌。同年 8 月，在庐山，当把彭德怀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清除出中央后，毛泽东不顾各地已开始饿死人的严酷现实，率领全党、全军、全国，掀起了“持续大跃进的新高潮”。是年，在粮食减产 15%、年产不足 3,400 亿斤的严重人祸面前，在许多公共食堂无粮断炊的严酷形势下，毛泽东的中共，仍按他们心目中的产量，借着“反瞒产私分”运动的狂暴，强行从农民手里“征购”走了 1,348 亿斤粮食，占当年实际产量的 39.6%。在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独树一帜，他一拍脑袋，把全省 1959 年的粮食总产量，硬从 210 亿斤“拍”成了 450 亿斤，猛增 1.14 倍。在吴书记的“坚强”领导下，嵯峨山所在的信阳地区，地委书记路宪文，学着顶头上司吴书记，一拍脑袋，把当年实际 20

多亿斤的产量，“拍”成了 50 多亿斤，国家以此强行从农民手里“征购”走了 10 亿多斤，约占当年产量的一半。

民以食为天！当农民们眼睁睁看见政府用枪杆子强行夺走他们 40%到 50%的口粮后，陷入啼饥号寒的危机之中。在“社会主义阵地”的公共食堂里，短短几个月，便从喝稀走到了揭不开锅的尽头。为了活命，农民们便以瞒产、私分、私藏粮油、做小锅饭来与官府抗争，使征购遇到了强大阻力。天才的毛泽东，立刻发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富反坏右”要翻天。1959 年 2 月 22 日，他发出指示说：“公社大队长小队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影响广大基层干部的共产主义品德，影响春耕和一九五九年大跃进的积极性，影响人民公社的巩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于是，他在全国发动了以反瞒产、反私分、反私藏为中心的“民主革命补课”的整社运动。1959 年 8 月 19 日，他亲自对省委书记下令说：“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要用“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的办法去“反瞒产私分”。

那些以痞子、流氓无产者为主要成员的“群众”和干部们，闻风行动了起来，他们在反瞒产私分运动中，对农民、对私分的生产队干部，大打出手。他们扬言：“不打人就不是好干部！”甚至说“不打人就是右倾分子”，就是“小彭德怀”！

有关资料显示：在贵州，省委书记李景膺把反瞒产运动定义为“捉鬼拿粮运动”后，捉“鬼”变成了打“鬼”。据《炎黄春秋》报导：湄潭县在反瞒产运动中，全县被活活打死的群众就有 1,324 人，打伤致残的有 175 人，关押致死 200 余人，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开除公职、撤消一切职务的有 1,680 人。在广西，经过柳州地委同意后，1959 年 2 月 25 日，石龙县集中全县各社队干部 5,000 多人，在二塘樟村召开反瞒产大会。县委书记孟广平说，1958 年获得了大丰收，但由于“严重的资产阶级右倾情绪作怪”，各社队干部故意瞒产私分，有粮不交国家，因此，要大打一场“反瞒产的人民战争”。据说，在“反瞒产的人民战争”中，有数百人被打死。在上林县，打和罚的手段有 30 多种，其中包括拳打、脚踢、罚立正、罚跪、捆绑、罚挑水、扣工资、夺饭碗、背石头、罚苦工、晒太阳、带病上工等等。在河南，在嵯峨山的信阳地区，地委书记路献文，积极贯彻中央和省委反右倾精神，掀起了反瞒产私分、挖私藏粮油狂潮，全区打人成风。在光山县，县委召开的一次反瞒产会议上，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把反瞒产不积极的县委书记张洪福，活活打死。上行下效，县委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致死 40 多个农民。据统计，在整个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手打过人的占 93%。庐山会议后，从 1959 年 11 月至 1960 年 7 月，信阳地区在反瞒产、挖藏粮中，由公安机关逮捕的 1,774 人中，有 36 人被打死在狱中，拘留的 10,720 人中，有 667 人被打死在拘留所里。全国呢？笔者找不到这方面的资料。粗略保守估算：按每县打死打伤 30~40 人计，全国死伤不会少于七万人，其

中被打死的，应在三万人以上。

随着反瞒产、反私分和挖藏粮运动的深入和发展，饿死在“天堂”里的人越来越多。在贵州湄潭县，从 1959 年 11 月到 1960 年 4 月的反瞒产运动中，全县共饿死 124,511 人，占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死绝户的达 2,938 户，遗下孤儿 4,737 人。在嵯峨山的信阳地区，据学者们估算，在庐山会议反彭德怀后的半年多里，“非正常死亡”约为 60~100 万人，三年里（1959~1961）“非正常死亡”约为 110~130 万人。其中，在人民公社的发源地嵯峨山卫星人民公社，全社仅 4 万人，从 1959 年冬到 1960 年春的三个多月间，就饿死了 4,000 人，占总人口的 10%。据潢川、光山、息县三县统计，孤儿就达 1.2 万人之多！在全国，

据专家测算，1959 年到 1961 年的“三年人祸”中，有 3,000~4,500 万人倒毙在人民公社的“天堂”里；官方在《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中承认：1958 年到 1961 年“非正常死亡”3,767 万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笔者紧急呼吁：每年的 8 月 29 日，即中共在 1958 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的那一天，理应成为“中国大饥荒纪念日”，年年铭记，岁岁不忘！）

“通向共产主义天堂”人民公社的恶果，迫使中共从 1961 年起，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采取了一些比较开明和有效的补救措施，如政治上广开言路的“神仙会”和经济上的“三自一包”等亡羊补牢措施，扭转了大规模饿死人的局面，当时颇得人心。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性质基本没动，数亿农民仍像现代农奴一样，不得不在雇主和各级官僚特权阶级的监控下，长期在“瓜菜代”的贫困中煎熬。

“通向共产主义天堂”人民公社的恶果，使中共陷入分裂。党内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右派逐渐得势，毛泽东的权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迫使他不得不退居二线。不甘心身居二线的毛泽东，开始在暗箱里策划向刘、邓兴师问罪的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死后，右派发动宫廷政变，击败了毛左集团核心“四人帮”，宣布文化大革命为“浩劫”。1978 年，在邓小平、中共的默许和支持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十八户农民签订“血”约，揭“书”而起，砸开了人民公社枷锁，率先分田到户。1979 年 9 月，中共在四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加快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承认小岗农民分田到户的合法性。1980 年 9 月，中共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1982 年 12 月，在全国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重新修改后的宪法规定：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重新设立乡政权。自此，肆虐中国农民二十四年又三个多月的毛氏人民公社，被迫退出历史舞台。接着，到了 1983 年，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推翻人民公社体制的同时，砸开了中共套在农民身上长达三十年的农业合作化枷锁，使亿万农民开始过上能吃饱饭的生活。至此，毛氏人民公社和它的前身共氏农业合作社，都被扫进历史垃圾堆，成了千古诅咒的妖孽。

04-简评反右运动

由于松然 » 2024 年 1 月 5 日



作者：于松然

吸取东欧“兄弟国家”匈牙利动乱的教训，毛泽东为了强化党的领导，打算采取“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等改善党的领导措施。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党内外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和建议。

为了给“整风运动”制造舆论，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他在《讲话》里，除提出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外，宣布“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向自然界开战”。对于如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他说：在政治上要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工作中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经济工作中要实行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方针，等等。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讲到知识分子问题和准备整风问题时，再次强调要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了贯彻毛的思想，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社论。社论说：

“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际上是不同意的。因此，他们就片面地收集了一些消极的现象加以渲染和夸大，企图由此来证明这一方针的‘危害’，由此来‘劝告’党赶快改变自己的方针。”社论批评那些“不少同志”，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并强调“目前的问题不是放得太宽，而是放得不够。”一些御用精英们更把“发动党内外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整风运动，颂扬为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

中共中央的整风指示，看起来好像很文明，很民主，但仔细推敲便推出了问题。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孳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土壤，反对这些主义，势必导致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中共无法摆脱的悖论。

当人们想起毛泽东强调要坚决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

督”方针的时候，有人曾“为毛主席的英明睿智、幽默风趣而欢欣，为共产党的伟大、光荣而感动。”甚至说什么“春色满园花胜锦，黄鹂只拣好枝啼。”——健忘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有些得意忘形了。他们忘记了毛泽东和中共的民主和自由，是铁笼子里的民主和自由：

在铁笼子里，中共恩赐的“民主”，你可以纵情挥扬，中共赠予的“自由”，你可以任意驰骋；但如果你不小心冲撞了笼子铁壁，不是头破血流，便是粉身碎骨。健忘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忘记了延安整风和文豪王实味被斩首的教训，内心一种承担社会责任的渴望，又被共产党开门整风的“诚意”和毛泽东充满“礼贤下士”的讲话精神，激发了起来，自觉或不自觉地想碰一碰笼子的铁壁，试一试毛泽东和中共的诚意。5月21日，民盟副主席、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说：“政协、人大、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设计院。”（上图：批斗章伯钧）6月1日，文汇报总编储安平，在统战部的发言中，上书毛泽东说：“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又说：“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他们的意见，虽代表了人民的正义呼声，显然已冲撞了中共笼子的铁壁。

毛泽东突然变脸，他把冲撞笼子铁壁的人称为右派。5月15日，他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给中共高干阅读。在这篇文章中，毛写道：“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6月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说：“党报正面文章少登（可以登些中间派文章）。大字报必须让群众反驳。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些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他们是最好的教员。”毛泽东将此计管叫做“引蛇出洞”。

紧接着，6月8日，《人民日报》刊出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毛泽东发出了反击右派“进攻”的号令，在全国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右派运动。

反右中，有人指责毛借整风之名来反右是阴谋，毛泽东对答说：“这是阳谋。”有人指责毛是“秦始皇”，毛泽东对答说：“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一年后的4月6日，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有声有色地说：“蛇不让他出来怎么能捉它？我们要叫那些王八蛋出来唱戏，在报纸上放屁，长长他们的志气。”“我们是一逼一捉，一斗一捉，城里捉，乡里斗，好办事。”——好一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痞子嘴脸！

在这场运动中，有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一百多万人被内定为中右或异己分子等罪名，存入档案，监督、限制使用或将来算总帐；数十万有右派言论的工人、农民，被打成坏分子。反右中和反右后，有约5~10万人被打死、自杀，或在劳改中死亡，数不清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一千多万人受株连。其中，文汇报总编储安平，在文革中，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数字版本颇多，尚须进一步考证。）笔者时任教于长沙高级工程兵学校，五十多人被打成右派，自杀两人，数十人被结论为中右、阶级异己分子，记录在档案中，“发配”

到北大荒劳动，笔者为后者其中之一。

据钱理群在《地狱里的歌声》书中披露，在甘肃省酒泉市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夹边

沟，是个右派劳动教养农场，“收容”有甘肃省各类右派二千四百余人，包括部分高级知识分子和干部。三年后，被抢救出的奄奄待毙的“劳教人员”，仅 1,100 人，其余 1,300 多人已葬身于荒漠之中。据铁流的《“南瓜山”数千饿殍的见证人 一位公安干警的自诉》中记载：“南瓜山不是山，是个埋死人的地方。在四川省峨边县沙坪劳改农场场部医院后面的一块荒坡上。当时沙坪劳改农场关押近一万多教民，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右派分子，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中，两年多的时间里竟饿死五千多老右，直到现在也鲜为人知。”原毛泽东的秘书李锐，在他的一本《按照历史的真相总结历史》书中说：反右结束后，河南省信阳地委为“改造右派”，在所属的大别山区的谭家河，建了一个“万胜山林茶场”，共送去右派二百多人，逾半数去而不归，埋骨荒山；幸存下来的则多因伤残，未得尽天年。至今人们谈起谭家河，都感到毛骨悚然。最令人无法释怀的是，这些残害右派分子的遗址，同“血肉横飞大辛庄”的受难者的归宿一模一样：埋葬右派分子的“万人坑”都被填平了，那些右派分子死后留下来的血渍，在“主旋律”的高歌声中，已被“导向”洗刷得干干净净，那些埋葬在地下的右派分子遗骸，在“主旋律”的催眠曲中，也已被“遗忘”分解得无影无踪！

运动结束，中国出现了空前的“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政治局面，为毛泽东的一言堂，为毛泽东和中共制造饿殍遍野的“三面红旗”的胡做非为，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

因右派言论获罪的诗人杨一华，在监狱、劳改场里，度过了 19 个春秋。他把他的深切感受，写进他的一首诗里——《1957 年反右有感》：

百花齐放百家鸣，
纳善从流剧可亲。
谁识翻云覆雨手，
一时才俊尽沉沦。

1978 年 4 月 5 日，毛泽东死后不到两年，在党内外的压力下，中共中央才批准统战部、公安部的“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自此，一场悲惨的恶作剧，才在权力不请愿平反的“改正”花饰下，从形式上划上了个句号。在一党专政的铁拳弹压下，面对这个“句号”，抱打不平的旁观者，无可奈何，遭受残酷镇压的受难者，只好认命！

05-简评大跃进运动

帖子由 于松然 » 2024 年 1 月 5 日



作者：于松然

稻堆堆得圆又圆，
社员堆稻上了天。
撕片白云揩揩汗，
凑着太阳吸袋烟。

毛泽东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1958年，当农民们掌握了“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毛泽东思想以后，便“焕发出无穷的物质力量。”这首诗就是证明。

1958年1月，在中共中央南宁会议上，胸怀“大救星”权力情结的毛泽东，再次批评了周恩来，指责他“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是与右派“只剩了50米的错误。”3月，在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多次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届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正式通过了根据毛泽东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确认，“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宣布许多地方的重要领导干部为“右派集团”、“右倾集团”或“反党集团”。毛泽东在会上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创造精神”，“争取在15年，或者在更短的时期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会后，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红色狂潮。

1958年各项经济指标，按大跃进速度进行修订。那些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教授们，许多人在反右中已中箭落马，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那些没有中箭落马者，大都心有余悸，“乖乖”得多了，一切听任政治家们安排，谁敢多说一句？

毛泽东规定：“每年增加一千亿斤(粮食)，搞到一万亿斤，要好几年。明年钢增加多少增加四百万吨，是一千七百万吨。后再增加四百万吨。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

由于怕反党当右派，怕犯右倾错误，各级干部们的高指标、浮夸风便泛滥起来。

6月22日，毛泽东批转的冶金部党组《关于产钢计划的报告》中说：“明年（笔者：指1959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3,000万吨（笔者：1957年才524万吨，年均翻2.86倍），而1962年的生产水平则将可能争取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是1957年的16倍多）。”在逢迎献媚和异想天开的竞争中，谁是佼佼者？显然，在毛泽东的心目中，非冶金部党组莫属！

8月北戴河会议上，考虑到光靠“洋炉子”完不成任务，毛泽东决定“土洋结合”。他要求，全党全民大办“土炉子”炼钢，实行书记挂帅，并用“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的铁纪律去完成任务。到1958年年底，投入的农村劳动力达9,000万人（另说6,000万人），“土炉子”全国遍地开花（见上图）。由是，1958年全年完成炼钢任务1,070万吨，虽比计划少230万吨，但比去年翻了一番多。（笔者：中间有多少不合格的钢材？）

9~10月，《人民日报》多次介绍推广商城经验：花100多元建一个炉子，只用250斤木柴和木炭，就可以炼出一吨钢，并郑重其事地说，这不是“炒铁”、“板铁”，是名符其实的“钢”。对此，10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说：“河南金榜第一名”。在毛下令“钢铁元帅升帐”之时，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干部们，也在中南海里搞起了“土炉子”炼钢，并恭请“伟大领袖”莅临指导。毛应诺前往视察（见上图）。

40年后人们才得知，1961年实际钢产量仅为870万吨，四年间比1957年增加了66%。

在全民大炼钢铁的同时，农业也“捷报”频传。6月8日，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小麦亩产3,821.9斤，放出了第一颗单产“卫星”（另说为2,105斤）。几天以后，湖北省谷城县星光社亩产4,353斤的水稻“卫星”也飞上了天。从此，一场放“卫星”的竞赛活动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继四川卑县放出中稻亩产82,525斤的“卫星”后，广西环江红旗人民公社，不甘落后，便放出一颗中稻亩产130,434斤的“超级卫星”，创下了古今中外空前绝后的最高纪录！9月18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报导了这个令人鼓舞又令人困惑的消息。为了证明“高产卫星”的“真实”性，许多报纸都配发了“嬉戏在卫星田里谷穗上的儿童”的照片！（见上图）

乘着大放“卫星”的狂风，毛泽东踌躇满志地巡游祖国大地。6月14日，他在河南封丘说：“不要很久，全国每人每年就可以平均有粮食1,000斤，猪肉100斤，油20斤，棉花20斤。”8月4日，他在河北省徐水县回答粮食多了怎么办时说：“可考虑让农民一天干半天活。”（见上图）对“伟大领袖”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中国亿万农民感激涕零。11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是一个很好的口号。”对此，毛十分欣赏。

12月，八届六中全会公报宣布：今年粮食产量将达到7,500亿斤左右，（笔者：1957年为3,700亿斤；另说为3,900亿斤）棉花产量将达到6,700万担左右（笔者：1957年为

3,280 万担)。

历史跨進 1959 年，频传的“捷报”变成饿死人的“丧报”，雪花般地飞入中南海。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果然，1959 年 9 月，在庐山会议上，反党分子彭德怀“跳”了出来，竟敢“我为人民鼓与呼”。毛泽东率众反击，把彭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清除出中央，由此掀起了“持续大跃进”的新高潮。

那难忘的三年，笔者在北大荒农场劳动。1958 年中期，当时的农垦部部长后来在八十年代荣升国家副主席的王震上将说，下半年农场全部吃四菜一汤。秋，笔者在兄弟农场食堂，享受过一顿“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吃得是油条，喝的是玉米粥。1960 年吃水煮玉米粒和玉米穗衣淀粉。1960 年冬，农场做人造肉展览，宣传“玉米秸秆全身都是宝”，属“国家机密”，参观回来后，笔者被指派用玉米穗衣做淀粉，人吃后拉屎干结，有时得用手抠。黑龙江历来都是“清明忙种麦”，王震“敢想”，下令种冬麦，结果数十万亩绝产。王震敢干，农场挣钱门路多。种大烟，花朵五颜六色，非常好看，花籽吃着比芝麻香。冬天进完达山原始森林里伐木，各总场、分场都建有伐木队，挣现钱，年年如此：靠山吃山嘛。伐木人零下 40 度取暖，把直径 40~60cm 的百年大树放倒，按 50cm 一节锯开，扳斧一劈四瓣，填进大油桶里烧……总之，笔者“得天独厚”，在大破环境中既没饿着，也没冻着，只是疾心难却。

到 1961 年，持续长达三年的大跃进，终以饿死农民 3,000 万~4,500 万的代价，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官方承认：1958 年到 1961 年，饿死即所谓“非正常死亡”3,767 万人。那个发射“超级卫星”的广西环江，全县 16 万人饿死了 5 万，创死亡率达 31.3%的世界纪录。据安徽省凤台县殷涧公社党委书记化名叫“石求明”的，上书毛泽东说：“据我知道的三个公社四个庄子的人口死亡情况，是极为惊人的，一个死亡占 5%，一个 11%强，一个 15%，一个占 20%多，有的村子几乎无人了，住在我们临淮关上，招收起来的被大人丢弃的儿童约三四百人，死了一百名左右。”1971 年 10 月，笔者于林彪摔死后不久，曾到河南信阳地区息县草黄林公社出差，同那里几个大队干部闲聊六〇年时，他们几乎毫无顾忌地、不加掩饰地说：那三年，他们公社饿死人在三成以上，有许多绝户。

对死亡，毛泽东早有“创见”。大跃进一开头，他就告诫中共高层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准备。在八届二次会议上，他讲大批死亡是“白喜事”。他说：“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两千多岁了，就很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死亡，是形而上学。”“鼓盆而歌是正确的。”（笔者：庄子亡妻后鼓盆而歌）“人死应开庆祝会”。如此说来，饿死几千万应开多大规模的庆祝会？草菅人命非其莫属也！四十年后，官方资料显示当年粮食实际产量和征购情况：

1957 年产粮 3,900 亿斤，征购 961 亿斤，占产量的 24.6%（另说产粮 3,700 亿斤，征购 960 亿斤，占产量的 26%）；

1958 年产粮 4,000 亿斤，征购 1,095 亿斤，占产量的 27.3%（另说征购 1,175 亿斤）；1959 年产粮 3,400 亿斤，征购 1,348 亿斤，占产量的 39.6%；1960 年产粮 2,870 亿斤，征购 1,024 亿斤，占产量的 35.7%；1961 年产粮 2,960 亿斤，征购 809 亿斤，占产量的 27.3%。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毛泽东许多反高指标反浮夸的言论。但我们无法否认，他是高指标

的始作俑者和恣意妄为者。毛泽东的天才在于他那政痞式的“一分为二”：对同一件事，他既善于肯定，也善于否定，既善于褒扬，也善于贬斥，一切都要求他的下级领会其“精神实质”；他的“理无常是：今日是之，后或非之；今日非之，后或是之”的痞子哲学，成了朝令夕改、出尔反尔的“理论”根据。当发现高指标祸国殃民时，他摇身一变，便从始作俑者变成了个反对者。这是中共的赤文化，亦即无产阶级专政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这种赤文化确保了毛泽东永远“伟大、光荣、正确”；如果发生错误，也是下面“歪嘴和尚念错经”的结果。

饿殍遍野的大跃进是“大救星”权力情结产物，亦即权力拜物教的滋生物，因而没有使毛泽东的中共翻然悔悟。但为了推卸责任，他们除大喊天灾外，却把罪责推到苏联乘人之危的“逼债讨帐”上。然而，历史记录却推翻了毛的谎言。据报导，在三年大饥荒中，苏联政府曾决定援助中国 50 万吨食糖，300 万吨粮食，都被毛“理直气壮”地拒绝了。

毛泽东说：“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的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我们不但不要苏联的援助，而且还要把欠苏联的债还清。”事后，他还对保健医生李志绥、秘书田家英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有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人，算啥大不了的事呀！让妇女敞开生孩子，死的几千万人，过几年不又回来啦！我们凭啥要吃赫鲁晓夫的嗟来之食？”就这样，数千万在饥饿中挣扎的农民，为毛泽东的“节操”和“志气”，献出了他们的宝贵生命。草菅人命之登峰造极者，非毛莫属也！

在这三年灾难中，有两件令人嗟叹欷歔的事，已分别载入史册。一件是，“伟大领袖”听到饿死几千万人后，心里很难受，表示三个月不吃肉，以此“悼念”饿死的阶级兄弟。御用精英们听了后，大为感动，纷纷著书立说，大讲毛主席与劳动人民同命运共呼吸的“高尚情操”和不吃“嗟来之食”的“志气”。另一件是，河南唐河县委书记毕可旦，因向上级要不到粮食，全县饿死十一万四千人。遭到上级批判后，怕当替罪羊被枪决，便领着老婆和三女一男全家六口人，夜半跳了井，14 岁的儿子毕剑增，侥幸水里逃生。后人没人敢为他著书立传，却有不少人称，这位县委书记是“以死谢罪”，死而余情犹在！

06-简评“七千人大会”

帖子由 于松然 » 2024 年 1 月 6 日



“七千人大会”会场

作者：于松然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7,118人，因此，这次大会又称“七千人大会”。

1961年9月，在庐山会议上，通过协商，决定第四季度从各地上调粮食32亿斤。可是到了11月中旬，时间过半，各地上交中央的粮食只完成23.4%。京、津、沪三大城市面临着粮食脱销的危险。城市粮食脱销的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心急如焚。

1961年，国家用了3.5亿美元（合人民币14亿元）进口粮食，几乎将所有外汇全部用来购买粮食。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就不能进口其他急需的工业物资。偌大一个农业国，靠进口粮食吃饭，怎么发展？用邓小平的话说，“永远也翻不了身”。

1961年11月11日，中央召开了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专门落实粮食征购问题。“各中央局书记面面相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

问题严重在什么地方？他们心照不宣地指向县委书记一级：1958年批他们右倾保守，是“睁眼瞎子”，看不见农民的积极性，迫使他们搞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放“卫星”，弄得劳民伤财，怨声载道；到了1959年，又把1958年的“一平二调”共产风、浮夸风全算到他们头上；庐山会议后，他们中许多人又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小彭德怀”；到1960年大量饿死人时，他们中许多人又变成了替罪羊，变成了阶级敌人，有的被判刑，有的被枪毙，有的见大势不好跳了井；剩下的都是忍气吞声者，反正毛主席和党中央永远正确，谁也不敢说这都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惹的祸；因此，为了保全自己，县委书记们，不得不把“屁股坐到农民方面”上来，一听征购粮食，就“抵触”，便“反感”。——凡此种种，各中央局的“封疆大吏”们，虽心知肚明，却不好说。

熟读经史的毛泽东，精通“宽猛相济”权术。他了解到上述情况后，决定用软的“民主”力克硬的“抵触”。他决定召开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中央工作会议，用民主总结的方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让下面各级干部“出气”，使各项工作（主要是征购）打开一个新局面。

在这个会上，他大讲民主的重要性，对过去几年的工作，也做了些自我批评。他说：“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中央其他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也做了些自我批评。上行下效，一时间，各级干部都做起自我批评来。自我批评虽然空洞无物，形式主义，但比胡批乱斗心情舒畅得多。

然而，大会也有不谐音符。林彪说：“产生经济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很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对林彪的讲话，毛泽东情不自禁呼唤：“讲得好！”并带头为林鼓掌。对此，许多人感到惊讶。

来自刘、邓、彭的声音，与林彪截然不同。刘少奇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反复强调“要科学分析当前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主要不是天灾，也不是赫鲁晓夫（苏共总书记）撕毁全部协议和合同，而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邓小平强调要发扬党的革命传统，加强民主集中制，影射党内缺乏民主。彭真直截了当地提出：“毛主席也应该作检讨，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在刘、邓、彭的鼓动下，有些地方干部便大胆而委婉地对中央提出了些批评，还提出了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的要求。尽管对中央的批评大都是工作方法上的小事，有意避开了造成灾祸根源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毛泽东还是非常不满。由于会议开得比较民主，绝大多数与会者心情比较舒畅，大都能想方设法去完成征购任务，从而使会议取得了成功。为此，有人编了一个顺口溜献给大会：“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笔者：与会者每天吃两顿干饭，一顿稀饭)，马列主义。”会上，毛泽东饶有风趣地附和那个顺口溜；但在私下里，他极其不满对亲信们说：“该改成‘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完全放屁’！”

“完全放屁”，毛泽东彻底否定了他发起的“七千人大会”。

会议刚过去半年，农民们也刚从灾难中喘过一口气，刚刚从“三自一包”中填饱肚子时，毛泽东便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严厉批评了“七千人大会”掀起的“单干风”(指“三自一包”)、“翻案风”(指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和“黑暗风”(指“七分人祸，三分天灾”的观点)，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自此，“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提法，被“三年自然灾害”谎言取代，刚过半年的“人祸”论，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全国农民不得不在“低标准”、“瓜菜代”中继续煎熬。

“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民主”之后就是镇压：四年后，第一个遭殃的是主张“毛主席也应该作检讨”的彭真，接着遭殃的是敢讲“七分人祸”真话的刘少奇。

07-骇人的“信阳事件”和饿殍

帖子由 于松然 » 2024 年 1 月 6 日

作者：于松然

正当毛泽东用湖南、山东、河南、贵州、黑龙江等几个大跃进红旗省的这类报告和经验总结来证明“三面红旗”无比正确时，随着满天飞舞的死人消息，大规模饿死人的河南“信阳事件”，倔强不屈地闯入了中共权力中枢中南海。

张素华在《变局：七千人大会》一书中写道：“信阳事件”是一幅怎样的情景呢？当年的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讲话中说：“我到光山（笔者：信阳地区的一个县）去看过，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确实是这样，这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攻击我们，这是真的。”1998年邓力群（笔者：曾任中共宣传部部长）回忆说：“我的一位老朋友彭大章（笔者：中南海秘书室的负责人）从信阳调查回来，对我讲：老邓啊，问题真严重啊！说时神色惨然！后来先念同志（笔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也去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笔者：家里死了长辈和丈夫的妇女，要穿白鞋守孝）”

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前往信阳调查，返京后与妻抱头痛哭。

河南省委党校教授乔培华，在《周恩来与信阳事件》一文中写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河南省委的精神到了信阳地委那里体现得更加突出，更加充分。1959年信阳地区实际粮食产量为20多亿斤，而信阳地委浮报为50多亿斤，河南省委信以为真，分配给信阳地区征购任务9亿多斤，加上下面的层层加派，达到10亿斤以上（笔者：数据与张树藩《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文中有出入），从而造成征了过头粮，而且把群众的口粮、种子粮、饲料等都搞光了，造成了信阳大量饿死人的情况。在当时的信阳地区及所辖的十几个县市都可谓“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有的户死绝了人。有很多小村灭绝了人迹，甚至还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广大农民连吃的口粮都没有，许多人都饿死了，哪里还有余粮上缴呢？在征收不出粮食的情况下，就大量地反瞒产，说不是没有粮食，而是隐瞒不报，因而采取逼、打的手段，出现了大量的逼死人、打死人的严重情况。如光山县委一位书记处书记对反瞒产有看法，县委会上，在第一书记（笔者：马龙山）的指挥下，就被当场打死。县、公社、大队各级干部和群众中对反瞒产不满而被扣上右倾帽子，被活活打死的人也有很多。（笔者：多少呢？由于地方政府严密封锁，不许外人调查，档案又死不解密，人们难以知道较准确数字。）

干部打人，并非河南一家。据报导，广西上林县县志记载了大跃进中干部打人现象：云黄大队队长扬言：“不打人不是好干部”，八个队干部全部打过人；大丰公社书记打过12个农民，公社副主任打过36个人；在上林，打和罚的手段有30种之多：拳打、脚踢、罚立正、罚跪、捆绑、上吊、扛水、挑水、罚跑步、拔胡须、打口粮、扣工资、夺饭碗、看饭盅、游全村、游田梗、背石头、封门口、插白旗、假枪毙、带高帽、用火烧、罚苦工、顶北风、放蚂蚁咬、晒太阳、放牛进屋、丢石入房、带病上工、打鼓喊冲锋，等等。乔文继续说：

事件发生以后，信阳地区的各县、公社、大队分别采取了各种方式封锁消息，民兵日夜站岗值班，不允许农民外出要饭，说外出要饭是给共产党脸上抹黑；不准农民向上级反映情况，说那是告黑状，是反对基层党组织，因此就是反党；不准私自在家做饭，说私自做饭是反对公共食堂，反对人民公社；特别是扣押许多群众反映问题的信件。如光山县委书记指示县邮电局，凡是外出的信件都要进行严格检查，谁写信给外地的亲戚朋友、上级机关、省市领导以及党中央、毛主席反映情况，就扣下来，对署名的人进行开会批斗，并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对匿名信就让邮电局的同志回忆是谁送的信，设法查出来。有一封反映光山饿

死人的信，邮电局的同志说好像是一个女的脸上有麻子，于是光山县对全县的女麻子进行检查，搞的人心惶惶。（笔者：显然，这种恶端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才能产生！）

尽管对于信阳地区的问题，河南省委缄口不提，信阳地委严密封锁。但消息还是或多或少地传出一些。

据学者们估算，在庐山会议反彭德怀后的半年多里，信阳地区饿死即“非正常死亡”约60~100万人，1959~1961年的三年里，“非正常死亡”约110~130万人。

《百年潮》1999年第12期，刊载了一篇文章《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系当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所写。

张树藩在文中写道：（摘录其中四段）

在中纪委两位处长把问题查清报告党中央后，毛主席批示说，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须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于是，中央从各部委抽调数百人来到信阳地区。这时省委才慌了手脚，也仓促组织了六七百人到信阳，全面改组各级领导班子。先派省农工部长赵定远任信阳地委书记，省统战部副部长赵子平任副书记，高祥辉、刘策分任地委组织和宣传部长；中央派的干部分别到各县、社任县委书记、县长、公社书记、主任等。原地委书记路宪文被停职检查，其他副书记、部长靠边站检查，原有九个地委常委仅留下我和纪委书记邱进敏没有动。

第二天，吴芝圃（笔者：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到固始县召开了万人大会，宣布原县委书记杨守绩是“反革命”，并将其逮捕。……因为杨在一九五九年群众开始发生浮肿病并有人饿死时，未经地委同意就给省委写了一个报告，反映了真实情况，要求拨给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这显然又是为了捂盖子、掩盖省委错误而采取的行动。

这一时期，全地区县市委第一书记被开除党籍、逮捕法办的就有八人，其余县市委书记统统被撤换。农村二十多万基层干部则被集中起来进行“特殊训练”，还调了部队，用绳子将他们一串串拴起来，武装押送。这成了一次全面彻底的大夺权。

这么多干部怎么会都变成了反革命，怎么能如此残酷地镇压呢？我想不通。……（我）在地委常委会议上忍不住大哭起来。我边哭边说：我在信阳地区工作十几年，和广大党员、干部有着深厚的感情，我弄不清那么多人怎么都变成了反革命。

张树藩“想不通”可能有些道理，因为他是体制内人，对有些党员干部因执行上级政策被批、被斗、被镇压他想不通；但对体制外的人特别是农民群众来说，批斗那些大刮共产风、强迫命令的党员干部，镇压那些狗仗人势、“比黄世仁还黄世仁”的恶霸党员干部，是件大快人心的好事。

1971年10月，笔者到河南信阳地区息县草黄林公社公出，曾同那里几个大队干部闲聊六〇年时，他们几乎毫无顾忌不加掩饰地说：那三年，我们公社饿死三成以上，有许多绝户；中央派人来这里搞“民主革命补课”，干部都“靠了边”，许多干部（包括生产队干部）被撤职、法办或自杀。

与农民群众遭受连续三年的大饥荒的同时，河南许多无辜的基层干部历经了三劫魔难：1959年河南在全省按照中央精神‘反瞒产’时，就有大批基层干部被关押、被拷打致死或自杀，是第一劫；在‘大饥荒’的饿殍中，不乏基层干部遗骸，是第二劫；根据毛泽东批示进行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是第三劫。据披露，在毛泽东制造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全国成百上千的地、县级党员干部被判刑；湖南全省 80 来个县，有 30 来个县委第一书记被撤换；河南处分了 23 万人，其中，信阳地委第一书记陆宪文、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被判死缓；河南南阳地区唐河县委第一书记毕可旦，因怕当替罪羊遭枪决，携妻子和三女一男投井自杀。实事求是地说，他们中有不少蒙冤者，但有相当一部分是罪有应得，如陆宪文、马龙山等痞子。大跃进政策和庐山会议后鼓吹“持续大跃进”并在全国大抓“小彭德怀”的始作俑者呢？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他永远还是那样“伟大、光荣、正确”。这是中国人的悲哀！

闯入中南海的“信阳事件”，并没有使毛泽东和他的幕僚们幡然悔悟。1987年赵紫阳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的几天内，对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说：“毛不知道或不相信在他的所谓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之后的可怕的年份中有无数的农民饿死。他拒绝批准进口粮食，因为那是‘修正主义’，是向资本主义送秋波。”

“信阳事件”不过是大跃进和“持续大跃进”运动恶果的冰山一角。据报导：到了 1961 年中期，全国工农业全面“跃退”，导致 3,000~4,500 万人饿死。据官方《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显示，1958~1961 年间，全国“非正常死亡”有 3,767 万人。

一个叫李为的安徽人，在《几个老人记忆中的那场饥荒》一文中写道：

一段历史如果经历太久，历史的细节和真实就会被忽略，人们的疼痛和灾难就会被删除。如果通过自己的努力，秉持良心，尽自己所能揭示历史事实，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有人会质疑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和合理性，甚至认为你图谋不轨。上世纪六零年前后那场饥荒就是如此。不知道我这段记述，你是否认为它是真实的？

笔者通过自己村庄的故事，几个依然健在的老人的回忆与叙述，记录一下当时的情形。

58 年，当春天小麦开始抽穗的时候，下了一场苦霜，导致了麦穗全部干枯，人们陷入了绝望，当时最有经验的老农都认为灾年将至，但是没过多久，小麦重新抽穗，而且那年的收成比往年还略微有增长，每亩地的收成都在一口袋以上（布制长口袋，在一百斤以上，当时还没有化肥，这个产量已经是不错的产量），但被征收后所剩无几，59 和 60 年庄稼还是收成了，但是总是收的不够被征收的，导致了在老人记忆中最为严重的饥荒。59 年陆续开始饿死人，首先饿死的是一些成分不好的家庭，越是大地主成分，活下来的可能性越小。

姓许的解放前是大地主家庭，弟兄 9 人加父母共 11 人，饥荒过后仅存一人，人们叫他二鳖子，现在已经儿孙满堂。

笔者的一个堂姐，一个堂哥被饿死，一个堂哥被爷爷用一斗玉米的代价卖给了陕西人，一斗玉米放了我堂哥一条生路，也救活了我的爷爷。堂哥现在还活着，现在 56 岁，已搬家到安徽宿州，有了自己的家庭。

姓徐的家庭，因饥饿中母亲没有奶水，最小的婴儿被饿死后，饥饿导致母亲把自己死去的婴儿煮吃了。被丈夫和大儿子发现后，此母亲被活活打死。此大儿子依然健在，现年 68 岁。笔者不敢跟他提起那件寒心的往事，不过他还是说：“那都是饿的，没有办法，哪个娘愿意吃自己的孩子啊！”

姓许的家庭一个儿子金锯，几乎被饿死，躺在地里时，被我的父亲背回了家，喂了他半碗粥，得以活命。现在每逢过年过节，依然到我家来看望我的父亲，他说父亲是他的救命恩人。曾经在我哥哥小时候打过我淘气的哥哥一巴掌，其母亲知道后带着他跪在我们家门前，说：“人不能没有良心啊，不是人家救你，给你半碗粥，你哪能活着啊”，父亲把他们扶起，说淘气的孩子该打，其母亲仍然说：“人不能没有良心！”。可见救人一命，胜造七级佛图，是千真万确的。

但那时候掌握粮食的人员饿死的很少，几乎没有饿着。一个老人说：“现在官员腐败，我们的生活依然逐渐好转，但是那时候的腐败是要命的，他们多吃一个馒头，就是吃了几条人命！”可见不要神化改革开放以前人们的纯洁度。

一个姓孙的老人说：“开始的时候吃野菜和草，后来草和野菜都吃光了，就吃玉米杆和麦糠做的馍馍了。那种馍馍不能见风，风一刮就飞了。”

一个姓王的老人说：“那时候人饿的，头发一摸全都掉光了。”



饥民逃香港

另据报导：

两年间，至少有十万广东和全国各地逃到深圳的饥民，成功地逃出中国(下图)，逃到当时被称为“处于水深火热中等待祖国去解放”的殖民地香港,成了“令人唾弃的叛国分子”。三年间，云南边民十三万多逃出国境，当了被人诅咒的“卖国贼”！

1962 年 4 月，新疆边境塔城、裕民、霍城六万余人逃往苏联，当时说这是民族分裂分子同苏联修正主义者共同策划的一次大叛逃。

一九六〇年前后死于饥馑的人数之所以空前，与“一大二公”当年被赞为“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桥梁”——人民公社的军事化密不可分。

据报导：

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许多农村实行“聚家并屯”，进行所谓“军事共产主义”改造。“以一个县为一个团，一个公社为一个营，一个村庄为一个连，拆散家庭，把人口按男棒劳力、女棒劳力、少年劳力、老弱病残等几个特征分开，分别住在不同的‘连队’（村庄）里，分配以不同的劳动定额、不同的粮食定量。不到的时间，亲人们互相不允许见面。”

“聚家并屯实行后，农民被迫从世代居住的村庄和住房中搬出重新洗牌，居住地发生了大迁徙，原来的自然村落变成了‘男人村’、‘女人村’和‘老弱病残村’。”

“由于老弱病残不进行‘重’体力劳动，因此食物定量也少。实际上，以正常的标准来衡量，‘大跃进’期间老年人从事的劳动也是很重的，因此很多老年人在饥饿和劳累中悲惨地死去，死时连亲人的面都见不到。”

为了逼着人人进食堂吃饭，“村干部只要一看到哪家有炊烟，就立刻带人去搜查，没收农民私藏的粮食和家什。等到劳力们都上工后，村干部和民兵手持一头削尖的铁棍，挨家挨户打开大门，一进屋就用铁棍在地上戳来戳去，以防止农民偷埋粮食。但凡有可能埋粮食的地方都要掘地三尺，一旦发现有偷埋粮食的，不但全部没收，而且要挨打、不许吃饭。”

1960 年前后死于饥馑的人数之所以空前，与为了早日实现共产主义因而要“鼓足干劲”拼命干活有密切关联。

有人曾目睹过这样的场面：

……在凛冽的寒风中，一面面红旗迎风飘扬，农民们全都光着膀子干活，甚至连妇女竟然也光着膀子。……村干部介绍说，这样做是为了“突出干劲”，妇女脱光膀子则可以证明“妇女能顶半边天”。赤裸着上身的妇女和赤裸着上身男人一同挖土石方，穿着棉袄大衣的村干部则站在堤顶，时不时举起右臂高呼：“超英赶美！”赤裸着上身的妇女也放下挑子，振臂高呼“超英赶美！”村干部又呼：“干！”农妇也呼：“干！”

村干部根据“伟大领袖”“拔白旗”的教导，对胆敢抗拒命令者，以“白旗”论处：“村干部一声令下，把‘白旗’围起来进行拳打脚踢棍子夯。”

1960 年前后死于饥馑的人数之所以空前，与为保卫“社会主义阵地”因而强制农民进公社食堂密不可分。

根据毛泽东“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所有制规定，土地全部国有化，粮食也随之国有化

（后来部分退给集体）。农民吃饭问题，由各级政府根据各公社、大队人口，核定口粮标准，分发给各级公社大食堂。因此，农民要吃粮，必需进食堂。



农村社会主义公共食堂

据报导：

1959年6月13日，毛泽东在他主持的一个中央会议上曾表示：“食堂，保持有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人吃就可以了……粮食要分给本人，你愿意吃食堂，就自愿参加，不愿意可以不参加。”6月底他访问老家韶山冲，当乡亲们明白表示对吃食堂不满意时，他说“食堂不好可以散嘛”。他前脚走，后头韶山的公社食堂就散了伙。但过了不到一个月，为了批判彭德怀，他将解散食堂的主张斥为“反社会主义”。(右图)

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凯帆是安徽无为县人。1959年7月初，他回到老家看食堂，发现老家已有不少人饿死。借着毛泽东“食堂不好可以散嘛”的指示，他责骂县委书记说：“你把人还给我！”应农民要求，他下令解散了无为县几千个食堂。结果，风云突变，张凯帆被毛泽东指责成“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说张“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用阴谋手段来达到其反动的目的”等等，并将张投入监狱。

紧跟毛泽东弹跳的《人民日报》，把公共食堂描画成仙境：“社员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干净卫生。”可是，河北张家口地区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在康保县山区视察时，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提着个瓦罐吃力地往山坡上走，瓦罐里是半罐子糠菜糊糊。孩子告诉他：“爹娘和妹妹病在家里，这是给他们领的饭。”问孩子：“你家不能做饭吗？”孩子答道：“不能，粮食都在食堂里，（家里的）锅也砸了炼钢铁了。”

被革职、在贵州劳动改造的中共中央工业交通部副部长高扬说：“我带着两个小儿女，爬过一道山梁，排了长队，才买回一小锅满是清水的豆腐脑……”

1960 年春，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在澜沧江山区，他看到一个老太婆挎着篮子，在风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浑身上下像在泥水里滚过一般。农民们告诉他：这位老人只爬两座山梁，十五里，不算远。最远的有三十里，每天骑上毛驴上食堂，一天就忙着吃两顿饭。阎红彦向县委提出，食堂“能办就办，不能办就散”，可县委书记不敢违抗中央指示，只好依旧让农民翻山越岭去喝粥。——能说这是“歪嘴和尚念错经”吗？这位有时敢说真话的“封疆大吏”阎书记，文革开始不久便被迫自杀身亡。

然而，在这种人为造成饥饿的严峻形势下，毛泽东还在坚守他的“社会主义阵地”。1960 年 11 月，中共中央根据毛的指示，还在向全国发命令：“公共食堂必须办好。”“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须坚持。”

一九六〇年前后死于饥馑的人数之所以空前，与盲目大搞水利建设密不可分。

例如，对于甘肃省搞的“引洮工程”，毛泽东说：“甘肃洮河引水上山，那么大的工程，就是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搞起来的。”该工程是毛泽东推行大跃进的样板工程，规模很大，几百里的渠道，沿线调集十万民工，从 1958 年一直干到 1961 年。结果，饿死、累死、打死了成百上千（另说上万）民工，工程整个报废，一滴水也没引上山，浪费的金钱难以计数。另有报导说，仅在一九六一年内，全国报废的工程就“折合人民币达一百五十亿元”。

一九六〇年前后死于饥馑的人数之所以空前，与超低标准口粮分配密不可分。

有人曾这样描写死亡：

在一九六〇年年初的一段时间里，我母亲住的那个村几乎天天有人饿死。饥荒最严重时，每个棒劳力每天的粮食定量是四两（笔者：一斤等于 16 两，每两 31.25 克），老人和孩子则是二两，还常常中断，或者被村干部截流贪污。

.....

外公的父亲已经快七十岁了，原本身体很硬朗，但每天饥肠辘辘，吃了棉籽后又经常一二十天解不出手来，很快就病卧而倒。没办法，外公只好用手帮他往外抠。挪到一九六〇年二月，老人就饿死了。

.....

饿死的人快死时的感觉，并非像我们平常人想象的那样充满痛苦。实际上，人要饿死时，初期感觉非常的饥饿，什么都想吃；几天后就进入第二期，人已经感觉麻木了，不太感觉到饿；死亡是突然来临的，那时就是有粮食放在面前，自己也往嘴里送不进去。因此，我们常常可以听说这类事情：某些人正在好好走着，突然倒下再也站不起来了。饿死人的感觉我母亲亲身经历，至今不能忘怀。

1961 年 1 月，在安徽凤阳县新县委召开的批判原县委书记的大会上，考城大队农民王家来这样控诉道：“我们大队原有五千多口人，现在只有三千二百口人了。日本鬼子来了我

们也没死这么多。那时我们还能跑，1960年我们哪儿都不能跑。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在文革中，王家来因“媚日”罪，被批斗后上吊自杀。

《乡村三十年》记载：安徽省凤阳县仅一九六〇年春就出现了人吃人的残酷事件六十三起，其中一对夫妇，将亲生的八岁男孩小青勒死煮着吃了。凤阳或许还不算最坏的，在大饥荒中饿死三分之一人口的甘肃省通渭县，吃人相当普遍。一个公社书记后来对来访的记者说：我家那个村里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妇女，把自己女儿的肉煮着吃了。她男人从新疆回来找女儿，村里人都替她打掩护，瞒过去了，因为村里吃过人肉的不少。那时人们饿急了，饿疯了，提着篮子出去，看看倒在路边的死尸上还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你们去看看公社门外蹲在那里晒太阳的人，他们中就有一些是吃过人肉的。

一九六〇年前后死于饥馑的人数之所以空前，与毛泽东的“志气”和“骨气”密切相关。

据报导：赫鲁晓夫听说中国发生大量饿死人的消息后，马上召开苏共政治局会议，决定立即援助中国 50 万吨食糖，300 万吨粮食。苏联驻中国大使向周恩来转达了赫鲁晓夫的决定。毛泽东闻讯后说：“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的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我们不但不要苏联的援助，而且还要把欠苏联的债还清。”又说：“我们凭啥吃赫鲁晓夫的嗟来之食？”周由此回绝了“苏联修正主义”的援助，展示了毛泽东和中共的“志气”！又据报导：在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中，美方代表转达了肯尼迪总统援助中国的方案：允许中方用硬通货向美国购买 500 万吨小麦；如果中国同意放弃它对邻国的军事政治压力，美方同意以长期和低息赊销的方式每年出售上千万吨小麦给中国；如果中方表示认可，美国将从人道主义立场给中国穷人送救济包。对此，王炳南大使转达了毛泽东的革命立场：“虽然中国受到了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但是，中国人民有信心战胜困难，赢得胜利，绝不会依靠别人施舍过日子，更不会拿原则做交易。”中方代表还以幽默的口吻传达了毛泽东的建议：“如果美方需要我们帮助，我们也愿意勒紧裤带援助一些大米和小麦。”幽默后，“美国代表顿现窘态，中国代表哈哈大笑。”中国大使的转达和中方代表的哈哈大笑，再一次展现了毛泽东和中共的“骨气”！——在“大救星”的“志气”、“骨气”下，数千万农民被他“救出苦海”，饿毙后，升入到“共产主义天堂”里！！

.....

（上面多处“据报导”没有注明出处，这是因为：一是这类的文字很多，网上、地摊、书店里很容易找到；二是当“揭示历史事实，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有人会质疑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和合理性，甚至认为你图谋不轨。”因此，如果你不信，即是注明出处你也不信，勿如干脆省点文字，信不信由你。）

1961年初春，笔者探亲路过开封。不大的火车站的广场上，有数百人在等待，在徘徊。他们中许多人好像不是在候车，像在寻找什么。在初春的寒风里，他们抄着手，三五成群地集在一起。他们的脸好像都是土黄色，眼窝深深的，颧骨高高的；他们所穿的褪色棉衣，似乎沾满了尘土，好像也是土黄色的；也许是豫东地区的黄沙土地，使车站广场的砖墙砖地上，都留下了薄薄的一层黄色尘土。寒风吹过来，卷起阵阵黄尘，与土黄色的衣，土黄色的脸，构成了一个土黄色的混沌世界。一个妇女坐在地上，双手捂着一块烤红薯吃，土黄色的人们，便不约而同地用眼光把她包围了起来，贼眼溜溜地盯住那块被双手紧紧捂着的红薯。广场的一角，一个老人睡着了。当人们翻动他时，僵硬的身躯证明他已永远“睡着”了。一个青年，

突然倒在地上，几经挣扎，爬不起来，人们把他抬进了候车室，后果未知。笔者到车站附近一家饭店里凭票证就餐，买了一碗干饭，一碟咸菜，一碗菜汤。刚吃了几口，在“出去！出去！”的驱赶声中，一个土黄色的中年人拉着一个土黄色的十岁上下的瘦弱小姐儿，双双跪到我的跟前：“救救她吧！”那土黄色的小姐儿眨巴着一双大眼看着我，分明也在哀求我。笔者童年丧母，父在缅甸中国抗日远征军中服役，杳无音信，迄今不知所终，凭亲友接济熬过童年，十二岁流落街头，饥肠辘辘之声早已根录于脑海之中。当见到土黄色的瘦弱小姐儿，仿佛听见了她腹中的辘辘肠鸣。我答应了。小姑娘站起来，端住饭碗便往嘴里扒米饭，大口大口地伸着脖子吞咽。还剩下两口留给她父亲；父亲没吃，让她吃完，父亲只喝了几口汤。当时的我，尽管也有些饿，显然比他们父女俩“阔气”得多。我无法知道他们的未来，只好暗暗祝福他们，这是我当时的唯一能力；而那土黄色的小姐儿和她吞咽的模样，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全国各地大都一样。1961年5月，笔者在黑龙江八五二农场当农工劳动期间，因三篇日记，获“污蔑党和社会主义”罪，被打成“极右”。遭残酷批斗后，身陷管押中，几遭灭顶之难！所幸，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那股短暂春风，“一风吹”把我吹出了囚笼。

在这里，笔者摘录当年获罪日记主要一篇里的几个片断：

59年9月12日

“大兵团作战”这个名词今天才搞清楚。但搞清楚之后，使我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不适。

曲阜县的支边青年们，向我讲述去年他们县“大兵团作战”。他们的一致结论是一团糟！

“第一个回合”是秋收战役。

金色的谷浪，黄澄澄的大豆，——一片丰产景象，要人们赶快收割。但“大兵团作战”的指挥员们，执行的是“集中兵力突出一点”的作战方针，结果大片大豆爆皮了，地瓜烂掉了，——结果58年丰产没丰收。



广大农村大炼钢铁中炼钢炉林立

“第二个回合”是大炼钢铁战役。（上图）

“大兵团作战”的指挥员们，开始调动大批“兵力”到炼钢战线上去。但小炼铁炉像草爬子一样，只吃不拉。【草爬子，昆虫，东北方言，未知学名，头钻进人皮下吸血到死。由于是东北土名，支边青年未必知道，便以此推定我“造谣污蔑”】而且煤炭渐渐不够用了，指挥员们便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风格，创造了一套大破坏的方法——住房被拆了，门窗被劈了，这一切都拿去当煤用。家里的大锅没用了（因整个县已经成立了大食堂），就被指定砸碎去炼铁。即使想了这么多办法，也未能完成上级给予的指标。

第二次战役失败了，人民公社威信扫地。（这种说法值得考虑）【这句被推定为“恶毒攻击”】

这二次战役实际上是一场紧张的、带有强制性的劳动。

人们每日劳动平均达 14 小时以上。由于不劳动不得食，人们只得披星戴月地干，干的正吃着饭就呼呼睡着了。可是饭罢，哨子一响，人们又拖着疲惫的身子上工。

参加劳动的由各式各样的人组成。有老人，有小孩，有孕妇，有抱着小孩子的母亲，有提着药罐子的病人（！），——真是劳动大解放！【这句被推定为“恶毒攻击”】

除以上以外，还有一些新措施：如夫妻二人只能星期六相处在一起，其他时间归集体；私人财产，如房屋、生产工具，都归属集体。

我听了以后，不禁一声长叹！

据上海《社会》杂志 1993 年第四、五合期刊载，《三年大饥荒资料死亡人数推测》的作者，用四种方法进行推测计算：1959 年到 1961 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在 2,791 万到 4,522 万人之间。其中，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人数约 1,126 万人，安徽省“非正常死亡”人数约 634 万人，河南省“非正常死亡”人数约 557 万人，山东省“非正常死亡”人数约 528 万人，湖南省“非正常死亡”人数约 378 万人，广西自治区“非正常死亡”人数约 226 万人。由于档案死不解密，又不允许体制外的人或团体组织调查，信阳事件和上面推测计算出来的数据是否准确，只有等到五十多年前的那些中共机密档案解密时，才能得到较准确的结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笔者再次紧急呼吁：每年的 8 月 29 日，即中共在 1958 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的那一天，理应成为“中国大饥荒纪念日”，年年铭记，岁岁不忘！）

这里，笔者之所以多次不厌其烦地斥责“档案死不解密”，是想引起读者注意：当今之所以对历史事件众说纷云，数据差别很大，盖因当局怕败露谎言拒绝解密档案之故。笔者希望以此能与读者共同呼吁当局：不要用政治玩弄历史，把历史当成任由权力打扮的小姑娘，要效法民主国家三十年解密的做法，让阳光代替暗箱，让人民知真情，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08-毛泽东的帝王意志：专断奢靡

帖子由 于松然 » 2024 年 1 月 6 日



图 01-1：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上

作者：于松然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本日成立了。**”（图 01-1）在国歌声中，毛泽东亲自按动电钮，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54 门礼炮齐鸣 28 响。毛泽东又宣读了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人民政府取代了国民政府，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毛泽东也彻底推翻了他几年前曾宣布过的“**无记名的选举**”、“**国家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承诺。10 月 21 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成立。数年后，人民民主专政改称为无产阶级专政。

什么叫人民民主专政？按毛泽东的说法，人民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具体地说，就是对四大朋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民主，对三大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实行专政。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人民民主专政便自动变成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

胜利前夕，毛泽东曾信誓旦旦地说，他“**决不当皇帝**”。他真不想当皇帝吗？尽管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皇帝，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王专制，但做皇帝的美梦，在中国大有人在，毛泽东便是其中之一。1914 年，袁世凯在北京称帝，1932 年，爱新觉罗·溥仪在沈阳即位……前者遭到全国强烈反对，蔡锷将军在云南首举反袁义旗，全国响应，很快就把刚刚登基四十多天的袁氏复辟闹剧送了终；后者虽当了十多年皇帝，但在日本鬼子的刺刀下战战兢兢，二战胜利的欢呼声，又把他送进了囚笼。天才的毛泽东发现，在中国，冠冕堂皇地当帝王已经不可能，但当不加冕的帝王呢？“世上无难事”，只要用心去干，在缺乏民主自由理念、信奉马列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国社会环境里，也并非不可能。

在陕北，毛泽东在与著名女作家丁玲调情时说：“你看现在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丁玲回答说：“不像。没有文武百官嘛！”“这还不简单呀！”毛泽东马上把毛笔和纸推到丁玲面前说：“来，你先开个名单，再由我来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接着又要丁来册封东宫、西宫。丁说：“那可不敢，这是贺子珍（笔者：当时的毛妻）的事。我要封了，贺子珍会有意见的。”接班人林彪是最了解毛泽东，他把毛泽东比喻为“马克思加秦始皇”。1957年反右中，毛泽东自比秦始皇说：“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1958年8月，毛泽东说他的统治“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1973年9月23日，毛泽东对埃及副总统沙菲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这就是毛泽东由来已久的未加冕的帝王欲念。

马列主义加封建专制主义，亦即无产阶级专政，给毛泽东实现帝王梦创造了必要条件。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按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无产阶级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这里所指：“无产阶级”是中共和他本人，“资产阶级”是反对中共和他本人的异己者和持不同政见者，“各个领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专政”就是镇压。在这种无产阶级专政体制下，毛的未加冕的帝王欲念就变成了现实。在“万岁”的呼喊和“东方红”的高歌中，这种未加冕的帝王欲念，挑起了埋在他心底的“大救星”欲火和权力拜物教的权力情结。

毛泽东未加冕的帝王欲念，使他急于把全国所有资源，都集中到共产党手里，变成中共的一党私产，从而使他有权支配国家的一切财富。1953年，刚刚从战争灾难中走出来的中国，本应休养生息，发展生产，但帝王欲念使他迫不及待地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全面实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笔杆子的欺骗和枪杆子的镇压下，毛泽东的目的达到了：仅仅三年，他便从农民手中夺走了包括土地在内的全部农业资源，从手工业者和工商业者手中，夺走了包括矿山、工厂、交通、商业、城镇在内的全部工商资源，并把它“改造”成为名义上的国有或集体所有，实现了对全国一切资源的垄断，从而使他变成了全国独一无二的雇主。

由于帝王欲念的胜利，毛泽东的“大救星”欲火燃烧起来。他是个蔑视牺牲、草菅人命的“大兵团作战”主义者，亦即人海战术主义者。他号召中国老百姓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为他的人海战术做出牺牲。因为，依靠这个主义，他战胜了国民党，依靠这个主义，他与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打了个平手，依靠这个主义，他又取得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到了1958年，他又依靠这个主义，掀起了一个“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显然，依靠这个主义，他的“大救星”欲火得到了满足，成就他名扬中外“千古一帝”的美梦。

“大救星”欲火又激发了他的权力情结，使他又发明了一个“便于领导”理论。1958年8月9日，他在山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于是，“便于领导”理论使“大兵团作战”思想大放光彩：在农村，农业合作社集体经济迅即变成了人民公社，变成了“一大二公”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在城市，工、商、文、卫等所有行政、企事业单位，统统变成了党和政府所有。自此，在“便于领导”理论指导下，六亿中国人都被捆绑在“大兵团作战”的大兵营中。在这个大兵营里，雇主和各级权贵们，在“舆论一律”的专政下，能高调地、理直气壮地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去挟迫人心，要老百姓为他们大规模的人海战术做出牺牲，从而为他们肆意侵犯

人权和财权、造就中国特有的**官僚特权阶级**，排除了障碍，扫清了道路。

这种“便于领导”的高度国有化、集体化的“大兵团作战”理论，同“群众运动”一样，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其实质是权力拜物教的**雇主权力情结**的张扬。这个理论使毛泽东和他的官员们，掌握了劳动者个人所得的分配权和国家、集体财产最终处分权，而这种没有制约的分配权和处分权，就是实质上的所有权。在这种体制下，毛泽东和他的中央政治局，名符其实地成了中国最大的“母”公司的董事会、董事长或曰雇主，各级地方党委和党政一把手，便理所当然地成了各个地方“子”公司的董事会、董事长或曰雇主代理。巨大的财富和绝对的权力，使毛泽东同他的各级雇主代理、权贵们，成了中国最富有、最有权的**官僚特权阶级**。在“大兵团作战”中，他和他们的富有和权力，在供给制、“一平二调”和支援世界革命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挥舞。历史反复证明，古往今来大奸大恶们，都善假至诚、至爱、至情、至理之名，弄权欺世，强奸民意，从而猖獗盖世，大行其道，诱迫黎元黔首俯首贴耳，唯命是从。在没有制约的分配权和处分权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中国广大工农群众沦为雇佣，变成了真正的无产者和奴隶，他们的衣食住行都得仰首乞求于各级官僚特权阶级的“恩赐”，不得不颂扬雇主为“亲爱的妈妈”，还要感谢官僚特权阶级为“党妈妈”：“你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

如果说中共以革命名义进行的土改是第一次掠夺，掠夺扼杀了中国人勤劳和智慧，那么，中共以共同富裕名义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第二次掠夺，掠夺造就了一批官僚特权阶级，而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的政府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则是中共以国家建设名义进行的第三次掠夺，掠夺使官僚特权阶级变成了亿万富翁。

封建帝王曾傲慢地宣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私有制的条件下，他们的傲慢并不证明他们的意志已全部实现：他们不得不允许人民拥有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自由。然而，毛泽东的帝王欲念，在“便于领导”的雇主权力拜物教理论指导下，却剥夺了人民拥有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权利，全部实现了封建帝王们无法实现的理想：

普天之下，莫非党土；率土之滨，莫非毛臣。通俗地说，就是“毛党天下。”

毛泽东说：“枪杆子里出政权！”当他用枪杆子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之后，又说：“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这是帝王欲念的宣言，是帝王权力情结的张狂。对此，权贵和御用精英们不忘拍马谄媚，他们无耻地“论证”说：**这是历史的选择！这是人民的选择！**

历史是人类活动留下的足迹，怎能选择？一百六七十年前，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他们在战后用选票选择了自由和民主。信奉自由主义的美国，一场整整进行了八年的独立战争，胜利结束后，领导这场抗击英军的总司令乔治·华盛顿，便辞去军职，告别了部队，**谢绝了要他当国王的动议**，将权力交还给了大陆议会。1783年4月19日，在告别仪式上，华盛顿发表一篇简短的讲话：“使我辞职的伟大事业终于发生了，我现在有幸向大陆会议致以真诚的祝贺，并要求他们收回对我的信任，允许我不再为国家服务……长期以来，我一直是按照这个庄严的机构的命令行事的。在向这个庄严的机构亲切告别之际，我在这里交出我的任职令，并结束公职生活中的一切工作。”面对昔日生死与共的战友，他激动不已，泪流满面地径直离去，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过上了平民的生活。他的离去，在一定程度上节制了人类的**无限权力欲和占有欲**，为结束“打天下，坐天下”的封建主义嫡传制和废除官员终身制树立了榜样。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诞生后，由于崇高威望和道德力量，平民生活六年之后

的他，即 1789 年 4 月 30 日，被人民用选票推上了美国第一任总统宝座。1797 年 3 月 3 日，当第二届总统任期届满后，他又回到他向往已久的家园弗吉尼亚山庄，再次过上了平民生活。他的隐退，又为美国总统任期不超过两届立下了先例，挫败了既得利益集团**永占利益**和专权分子**独霸江山**的谋图，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理想。美国人民高呼的不是“华盛顿万岁！”而是“自由万岁！”“民主万岁！”“平等万岁！”至今美国人民还享受着自由宪法给他们带来的硕果。显然，这不是历史的选择，而是人民的选择：人民用选票做出的选择。

在中国，“人民的选择”的毛党天下，是怎样让人民做出选择的呢？

为了效忠苏俄首领斯大林，毛泽东和他的政治局做主，先后派兵 130 多万，在“至理”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下，组成“志愿军”进入朝鲜，用 90~100 多万中华儿女的鲜血（其中 40~70 万遗骨他乡）和五十多亿美元，替苏俄打先锋，保卫和打造了北韩金家王朝。为了与苏俄新首领赫鲁晓夫争当世界导师和领袖，毛泽东的中共，还在“至理”的“**支援世界革命**”的光环下，无偿支援越南反美 200 多亿美元；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口号下，无偿支援人口仅 200 余万的反苏小国阿尔巴尼亚 90 多个亿；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口号下，支援朝鲜 200 多个亿；在“反对越南修正主义”口号下，支援反越小国杀人魔王波尔布特的红色柬埔寨 20 多个亿；非洲有个小国，因喊毛主席万岁，便无偿“奖给”700 万美元；一个拉丁美洲无赖，领走 50 万美元经费后，便同“革命”一起遁名匿迹，等等。在国民经济建设上，毛泽东的中共决定大炼钢铁。1958 年全民大炼钢铁中，“9,000 万人上山炼钢”，直接损失浪费高达 200 亿元以上。据知情人 1986 年披露，国家补贴费达 40 多个亿，财政拨款弥补小钢铁企业亏损达 110 亿元。对此，毛泽东在 1959 年 7 月 10 日的庐山会议上，毫无悔罪地“至情”地撒谎道：“关于全民炼钢，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人财物力，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但也是‘有失有得’的。”刘少奇在插话中，以谎传谎而“至诚”地说：“大办钢铁花了 20 多亿，全民学了，值得。”农业上，他们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搞“一平二调”的供给制、食堂制，大放高产“卫星”（其中广西环江县亩产 13 万多斤的中稻，最为“光彩夺目”），把五亿农民拖进了贫困、饥饿深渊，最终导致 1960 年前后三年间饿死了 3,000~4,500 万人。五十年代，每逢国庆，全国都要组织数百万人去游行示威或接受检阅，外宾来访，动辄组织数十万人去夹道欢迎，从不计停工停产的损失。一言蔽之：在**雇主**毛泽东和他的政治局的眼里，中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都是他们任意支配和挥霍的对象，广大中国人民，都是他们任意驱使和蹂躏的奴隶，哪里有点滴“人民的选择”？显然，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选择，这是毛泽东的个人选择，这与美国人民的选择、华盛顿的个人选择，有天壤之别。（由于怕慌言败露，中共档案**死不解密**，有时因政治需要作有限地、有选择地部分解密，或因政治需要任意再加密，因而流传事件的数据版本颇多；准确数据有待有良心的史学家们作公正调查、考证。）

穷奢极欲是帝王的共性，毛泽东也不例外。

在中共对新闻媒体和创作出版的全面监控和专政下，毛泽东是个和蔼可亲的长者，艰苦朴素的领袖，道貌岸然的君子。他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写道：“**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又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写道：“**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

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几篇说教文章，使他变成了高尚道德的化身。然而，当掀开神秘的宫帷幕墙，人们却发现了一个人格阴暗卑劣的毛泽东。

毛泽东所写的文章（包括诗）中，一部分是由他授意，秘书起草，然后冠上他的名字发表的；一部分文章虽然是他亲自起草，但经过中共集体讨论和修改，而后以官方名义发表的；配给他的秘书都是著名的理论家、作家和才子，如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周小舟、李锐等，因此，他的文章很多是官方的行政行为。这里须要特别指出的是：建国初期，由于政治上的需要，中共为出版四卷《毛泽东选集》，组织了十数名专家、学者和数十名党的工作者，连续数年，对过去以毛的名义发表的声明、命令、决定、谈话和文章，进行筛选、订正、修改、整理和勘误；同时，根据毛泽东本人的请求，苏俄党魁斯大林还指派理论家、科学院院士尤金为驻华大使，以马列主义高度来监视和审定四卷。因此，四卷的出版是名符其实的国家行政行为。然而，四卷稿费，毛泽东全部攫为己有。据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透露，毛泽东稿费收入，文革前已达百万元之多，毛泽东死前，更高达 7,500 多万元。这对当年月平均生活费才 10 元的城市居民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是当年中国天下第一豪富。

为了效忠毛泽东，各地“诸侯”纷纷用公款为毛泽东兴建行宫，少则数十万元，多则上亿。据报导，这种行宫多达十多处。仅上海一地，为毛建的别墅就圈地一千多亩，园林和房屋修建，包括数十名年轻美貌的女服务员在内，一百多人长年为其服务。为毛泽东兴建的行宫中，特别耀眼的当属湖南韶山滴水洞行宫（图 01-3）。1959 年 6 月 26 日毛泽东回乡时，对陪同他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小舟，你们……在这个山沟里，修几间茅屋子。省里开个会，其他领导同志来，休息一下也可以嘛！”周小舟倒台后，继任人张化平心领神会，在中华大地饿殍遍野的 1960 年，拨款 1.4 个亿（另说一个亿），在毛泽东曾祖父母、祖父墓地，建成了驰名中外的园林式滴水洞行宫。1960 年下半年启动，建筑面积共 3638.62 平方米，到 1962 年，一、二、三号主体工程连同滴水洞园林、通往韶山的公路，同时竣工。



图：滴水洞一号别墅近景

参照中南海毛泽东住房式样，吸取苏式建筑保暖防寒优点，设计出园林式滴水洞行宫中的一、二、三号主体工程。一号为别墅式平房，供毛泽东使用，双回廊，内设主房（卧室）、

副房（江青卧室）、办公室、会议厅、餐厅、娱乐室等，朴素、大方而实用。二号为两层楼客房，共 24 间，是陪同的中央负责同志休息处。一、二号建筑中间有走廊相连。三号楼距一、二号建筑有百米远，是随行警卫（8341 部队）和省委接待同志住宿地方。出于战备考虑，1970 年，又建了一间整体浇筑的防震室和一个防空洞。

此外，不顾彭德怀等人的坚决反对，毛泽东用公款在中南海住所，修建了一个数百平方米的室内游泳池，供他个人专用。他还以视察工作的名义，配有数十人为他一人服务的专列，经常傲游中华大地。在物资极度匮乏时期，“特供”使毛泽东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一切。例如，他爱吸上海“特供”的熊猫牌香烟和北京“特供”的大中华，从不缺货。六十年代，他开始热吸四川什邡烟厂手工卷制的大雪茄。于是，一个手工卷制大雪茄的特供生产小组为他而诞生了。不久，这个由五六个工人组成的生产小组，举家迁到了北京南长街 80 号，专门为“最高”手工精卷“132”大雪茄烟。然而，让人经常看到的却是，他身上穿的那件带补丁的旧睡衣，他那一副廉洁奉公的形象！

凡此种种，在权贵和御用精英们的眼里，这些挥霍和腐败，都可以戴上“人民的选择”的桂冠！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推翻了他的“无记名的选举”、“国家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承诺之后，戴着个人崇拜中制造出来的“大救星”光环，登上了未加冕帝王的宝座；而御用精英们所谓的“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都是向未加冕帝王献媚的赞歌，统统都是骗人的谎言！

09-毛泽东的帝王意志：寡人好色

帖子由 于松然 » 2024 年 1 月 6 日

作者：于松然

最能体现毛泽东帝王意志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好色**。

未加冕帝王毛泽东，没法设“三宫六院七十二妃”进行淫乐，但中共和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体制，给他玩女人提供了可靠保障。据传，毛泽东玩过的女人不下百人，他特别喜欢玩弄年轻无知的女孩子。难怪，他的妻子杨开慧曾对人说过，毛泽东是“生活流氓”。

李志绥在他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写道：

毛的私生活骇人听闻。外表上，他凝重端庄，而又和蔼可亲，俨然是一位忠厚长者。但是他一贯将女人作为玩物；特别到晚年，过的是糜烂透顶的生活。他没有别的娱乐，玩弄女人成了他唯一的乐趣。汪东兴说：“他是不是觉得要死了，所以要大捞一把。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兴趣，这么大的劲？”江青说过：“在政治上，无论苏联和中国党的领导人，没有哪一个能斗过他(毛泽东)的纵横捭阖的手段。在生活问题上，也没有谁能斗得过他，管得住他。”

五十年代，毛玩女人的事已在中共高级干部中传开。为了确保毛泽东和中共的“伟大、光荣、正确”形象，这些消息都被严密地封锁起来。从毛的秘书李锐所写的《庐山会议实录》中，我们看到了有些高干对毛帝王穷奢极欲荒淫无度的不满。例如，在中共八中全会上，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在揭批他的顶头上司彭德怀元帅时说：“他对各地修房子不满；反对唱《东方红》歌；对喊毛主席万岁不满；调文工团员，他骂萧华和罗瑞卿同志，说是‘选妃子’，实际是骂毛泽东同志。”黄说的话中：“修房子”指给毛盖行宫；“调文工团员”指选女孩子们供毛玩；“萧华”是总政主任、上将；“罗瑞卿”是公安部部长、大将。

给毛泽东“选妃子”玩的不光是萧华上将和罗瑞卿大将，还有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秘书室主任叶子龙，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林彪夫人叶群等。其中，叶子龙是“出类拔萃”者。此人文化程度不高，写材料需人代笔，但在选女孩子们供毛玩弄纵欲上，表现出别人少有的机警和敏锐，是“拉皮条”的高手，因而当年曾深得毛的信任。

在毛的内宫中，失宠前的叶子龙，兼毛的机要秘书并管毛的家务。叶从各种渠道挑选一些单纯、容易指挥和控制、政治上可靠的年轻女孩，介绍给毛做女友。许多女孩子以有与毛这种“特殊友谊”为荣。这些女孩子大多是贫农出身，或从小由政府养大，思想上非常崇拜毛，与毛的“特殊友谊”使她们感到莫大的荣光；宠幸后所得到的回报，也令她们欣慰。

当说到毛的女友时，不能不说说张玉凤、孟锦云、吴氏“姐妹花”和“秘密录音事件”。

张玉凤何许人也？官方记载，她是毛泽东最后一任机要“秘书”。在毛最后几年里，凡要求见毛的高级官员，甚至江青、李讷等至亲，都要经过她的首肯。据知情者披露，专横跋扈的江青，背后骂张“不过是一个陪睡的丫头”，当面却对她点头哈腰；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向毛请示工作，因正值张“秘书”午觉未醒，竟在外边坐等了三个小时……有学者研究了张玉凤的权势后，竟得出了这样一条惊人的结论：没有张玉凤，“四人帮”不会那么快垮台；有了张玉凤，中国避免了一次血腥内战。

张玉凤哪来的如此能量？她出生在东北牡丹江清贫之家，父亲是个小商人，家中有八个子女，张玉凤排行第四。1958年，年方十四岁的她，由于家中困难，无法供她上学，巧遇上铁路局招考列车员，便去试试看。她那双妩媚的大眼和白皙细嫩的皮肤，帮助她在面试中考中，成了一名客运列车上的列车员。1960年冬，铁道部要选调一批列车员到毛泽东专列上当服务员，十六岁的张玉凤被选中。这样，她被调进北京，并见到了“伟大领袖”。从小就崇拜毛泽东的她，能见到“伟大领袖”，感到无比的光荣和幸福。

她的命运转机，发生在毛泽东的笔尖上。1962年的一天，“伟大领袖”在练笔时，竟在一张纸上写了许多“张玉凤”。当时还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汪东兴见后，心领神会，立即把年方十八岁的她，调到毛的车厢里，进行“零距离服务”。零距离接触使她感到，毛不仅是一个宽厚的长者、父亲，而且是一个能善解人意、体贴入微的情人。崇拜与感情，使她无法拒绝服务的极限。从此，她得宠于毛，成了毛最后14年中最亲近的随侍（有人曾诵《长恨歌》暗喻毛张关系，但毛不是玄宗李隆基，而张也不是贵妃杨玉环。）。与“伟大领袖”的“友谊”，使她权势日隆，文革后期，一个初中没读完的她，成了中国最有权势人之一。有一天，“伟大领袖”对她发脾气，叫她“滚！”她公然回敬对骂道：“我要不滚，你就是狗！”后来，“伟大领袖”对人评，说她是“一触即跳”。她与“伟大领袖”的“私

交”，毛泽东的专职医生李志绥，在他所著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有详尽的记载。

孟锦云，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1968年被判13年徒刑（所幸没判处极刑），刑期到1981年。1973年冬天，刚坐了5年牢，25岁的她突然被释放了，连她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更让她迷惑不解的是，她是空政文工团的舞蹈演员，却被安排到空军某医院当护士。1975年春天，她恍然大悟：一纸调令，就把她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调入中南海心脏，成了“伟大领袖”一名“零距离护士”。原来，毛并没有忘记她。这“零距离护士”不过是当年“零距离服务”合乎逻辑的结果。在重重宫帷中，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她，甚至当人们在《人民日报》上看到给毛守灵人的名单上，赫然写着“孟锦云”名子时，人们还不知她是谁。

孟锦云是谁？她是个湖北姑娘，1948年出生，12岁就考入了空政文工团，成为了舞蹈演员。1963年4月，她还不满15岁，已经出落得楚楚动人，身材苗条，皮肤白皙，特别是双眼明澈如水，成了到中南海“出任务”（陪中央领导们跳舞）最佳人选。在“出任务”中，当她见到了中央首长和“伟大领袖”时，备感无比光荣，当“伟大领袖”频频邀他伴舞时，又使她涌出了令队友们没法相比的自豪感。与“伟大领袖”交谈中，她心不由衷的发现，“伟大领袖”比父亲更加宽厚，更加善良；看见“伟大领袖”那伟岸的身驱、瞥见“伟大领袖”时不时投过来的那束多情的目光，她仿佛遇到了梦中的情人。“伟大领袖”的青睐和赏识，使她身不由衷地、轻快地同他携手步入舞池、书房；当“伟大领袖”拉她进入了卧室时，在她无限崇拜的心目中，55岁的龄差已消失得无影无踪。1966年，也许是因文化大革命操心过度，“伟大领袖”竟把年方十八的她，遗忘到一边。这一遗忘，使她吃了不少苦头。她以为，“伟大领袖”早把她忘了。但时来运转，1973年，当“伟大领袖”从另一“零距离服务”的女友小丽口中知道了她的不幸遭遇后，大发无产阶级震怒，对汪东兴说：“**我就不信她是反革命！**”“伟大领袖”的一句“不信”，就否定了空军将领们和军事法庭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反革命分子孟锦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行动”。根据“最高指示”，汪东兴立即命令空军司令放人，于是，她“莫名其妙”地出狱了。见到“伟大领袖”，她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我是来找你平反的，你要给我平反。”不久，她的目的达到了。在“伟大领袖”最后的日子里，她成了毛的贴身护士。

“姐妹花”是卢弘对吴姓二姐三妹的称谓。卢弘何人？他是前外交部副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将军的女婿，1949年加入中共，曾任《解放军报》编辑，《炎黄春秋》主编。他在《一对姐妹花与毛泽东的一段情》文中写道：

我的比较密切的战友中，有两位吴姓姐妹。她们家共有姐弟六人，我相熟的主要是其二姐、三妹和一个兄弟，因为他们三个都是(或曾是)我的文艺战友，其余几位我也认识，只是交往相对少些，上述三位和其大姐是一母所生，他们的母亲是一位革命烈士，这姐、弟、妹四人都是在革命队伍中成长的，因此也与我结下了友谊，并且是不太一般的关系。

卢曾不情愿地当过一任三妹的“候补情人”，那是因为二姐是军长夫人，军长是他的首长；但三妹没二姐长得漂亮，他又不爱她，也从未敢碰过这个“小姑奶奶”。卢在文中写道：

有一次铁道兵文工团又奉命进中南海伴舞，其中就有三妹，正好赶上跟伟大领袖跳。她本来就会“来事”，如此天赐良机，当然乘机大显身手，竟一下引起了老人家的兴趣，由于她是单眼皮，已故“第一夫人”杨开慧也是单眼皮，老人家竟说她有点像杨开慧，杨的小名叫“霞姑”，伟大领袖就赐她以御名为“李霞”。他们在舞中闲聊时，老人家问她明天是星

期天，你们都去哪儿玩哪她说没有什么地方可去。老人家顺口道，到我这儿来嘛！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第二天三妹真的去了。中南海警卫室不让她进，她说是主席让我来的。警卫室打电话报告请示，又一直捅到伟大领袖处，老人家想了想道，我是说过这话，既然来了就让她进来吧！于是龙颜芳心一齐大悦：她成了毛主席的座上客，老人家也重见了又一活生生的“霞姑”。

卢文还写道，三妹“从此享受了‘圣上恩宠’，是个谁也惹不起的通‘天’人物。”文中披露，三妹因“伟大领袖”的“需要”，被调出铁道兵，安排到离中南海更近北京卫戍区任职，成了“伟大领袖”随叫随到身边不可或缺的人。到了文革，三妹从一个文工团演员跃升为“北京市革委会的文教组副组长，其官职和权力至少相当于省市的文化厅局长。”她还经常随侍“伟大领袖”出巡，不仅自己享受“宠幸”的荣华富贵，还拉自己二姐共享，二姐也因此得幸。卢弘说：“当时，正随‘驾’伺候的中办副主任汪东兴，指着三妹悄悄对李志绥医生说：‘她妈妈要在的话，她也会领来孝敬皇上。’”

1961年，由于毛的隐秘生活被秘书们疏忽大意而泄漏，发生了震惊高层的“秘密录音事件”。由于这个事件，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录音事的疏于检查作检讨并请处分。”中共中央书记处还批评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并决定给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以严重警告处分，给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以警告处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秘书都牵连进去，受到了相应处分。同年5月17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作出了关于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等五项规定。“秘密录音事件”引发的政治风暴还株连了中央和地方的一些单位的负责人，如徐子英、王诤中将等十四人。“拉皮条”高手叶子龙因而失宠，被逐出中南海，文革中又因此案被监护审查达七年之久。

“秘密录音事件”是个什么样的事件？从杨尚昆的日记注释和叶子龙的回忆录中看得出，对毛泽东的录音始于1958年11月。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准确、更完全地保存党中央会议和中央领导同志在会议上的讲话的历史文献资料。录音建议是叶子龙首倡的。作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和中办机要室主任，叶子龙觉得有责任利用现代化的记录手段，“尽量把毛泽东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为此，他曾多次向上司杨尚昆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过这个建议。事后披露，最高权力层面也接受和执行了这个建议的，毛泽东本人也认可了录音的做法。毛曾对叶子龙说“录音要搞个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但叶子龙为了“尽量把毛泽东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更准确地把握毛泽东思想，在请示了中央有关领导后，便背着毛泽东，在毛的专列上安了窃听装置。这一安，便捅出了个大马蜂窝。

李志绥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中写道：

一九六一年二月，也就是春节后不久，我们乘毛的专列前往广州。

汪东兴一上路似乎就有不好的预感。毛此行带了更多的女人。汪东兴出发后便跟我说：“两个女的赛过一面锣。”……离开杭州，去武汉，中经长沙，火车停在长沙郊外黑石铺机场。毛召集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和省委几个人到火车上谈话。毛与幼儿教师在他车厢内厮混很久后才姗姗出现。张平化和湖南省省委书记之一王延春在隔壁车厢里等了很久。王是河北人，保留着农村中蹲着谈话的习惯，一直蹲在沙发上。会谈开始后，我、幼儿教师、两位机要员到火车下面散步。机要室录音员刘凑过来，同我们一起走。大家正在说说笑笑地

走着。

刘对着幼儿教师说：“今天我可听见你说话了。”

她愕然问刘：“你听见我什么话？”

刘笑着说：“主席见张平化书记以前，在卧车里，你不是催他起来穿衣服吗？”

她又问：“还听到什么？”

刘嘻嘻地笑着说：“都听见了。”

这时不止是幼儿教师，两位机要员都呆住了。幼儿教师脸色大变，急忙走回火车上去。

张平化他们谈过话后，毛说休息一下就开车。幼儿教师马上去找毛。她向毛讲了火车上安装了录音设备。

随后毛把汪叫去他车厢谈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汪向毛讲，他调回来，这是第一次外出，不晓得谁让录音的。汪出来以后，专列便向武汉全速驶去。

这就是毛泽东同幼儿教师床上引发的“秘密录音事件”。如果在欧美国家，一定是个闹得满国风雨，甚至鸡飞狗跳墙；但在中国，老百姓有权知道的是“伟大、光荣、正确”，哪能允许你们知道这些不该你知道的“谣言”。

面对“谣言”，笔者曾察阅过一些批判李志绥的文章和回忆录。但在“主旋律”导向严格审查控制下因而诚信缺失的中国，这些批判文章和回忆录，究竟有多少是真实史料？究竟有多大“辟谣”价值？这里摘要介绍一篇《戚本禹批判李志绥的回忆录》文章，是九十年代，美国《达拉斯时报》编辑陆源采访戚本禹时的记录整理稿。戚本禹何许人也？他是文革初期趋附于毛泽东身边曾大红大紫过的秀才也。

采访中，戚本禹说：“李志绥对毛泽东玩弄女人的指控是谎言和捏造。”“李志绥写的那些黄色的、下流的东西，其实是从地摊上的黄色小报上改头换面抄袭来的。”因此，戚得出结论说：“作为一个留洋的医生”，“李志绥在政治观念上的无知与庸俗”。惟其如此，戚对李的政治、思想也做了全面否定。他说，李志绥“在哲学思想上，他很浅薄、极其浅薄”，“政治常识比较贫乏”，“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要求李志绥讲清楚这个问题，就他的水平和经历，也是不可能的。”对于文革，戚说：“可以说关于文化大革命深远的历史根源，关于它的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以及与此有关的种种历史奥秘的探索，李志绥连门槛还没有跨过。”对李的人格，戚说：“李志绥不过是个为了三十块银币而出卖自己导师的犹太。”

笔者无意评论李志绥和他写的书。看过上面这些文字后，笔者深深感到，由于怂恿红卫兵揪斗并打断彭德怀两根肋骨有功、成为毛和“四人帮”打手而坐狱十八年的戚本禹，还保持着四十年前那种“义正辞严”、“大义凛然”的品格。1967年4月1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的文章，首次公开攻

击国家主席刘少奇，从而轰动华夏，使他名扬天下。他在文章中这么说：

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笔者：指刘少奇），无视历史事实，无视毛主席的警告，仍然借着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美化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就是为了推翻人民的江山，破坏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使革命胜利的果实落在资产阶级的手里。

……江青同志，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几次在会议上提出要坚决批判《清宫秘史》。但是，陆定一、周扬、胡乔木等人却大唱对台戏……江青同志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义正词严地驳斥了他们这种反动的、荒谬的主张，坚持要批判这部影片。

……但是，被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歌颂的反动的、彻底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对义和团反帝的革命群众运动却抱着刻骨的阶级仇恨，竭尽诽谤污蔑之能事。

无限崇拜毛泽东的戚本禹，在文章中所使用的这类“无产阶级”式高亢激烈、暴戾乖张的言辞比比皆是，举不胜举。他四十年前的**文格**与九十年代的**说格**，有多少差别？一部揭露清宫权斗内幕的影片，竟被他斥为“卖国”，进而又把影片的称赞者断为“推翻江山”、“破坏专政”的罪犯。由此可见，他对“**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以及与此有关的种种历史奥秘的探索**”是多么深刻！！须要声明的是，笔者引用上述文章，不是想证明戚拿了谁家的“三十块银币”，也懒得说他曾经为虎作伥。

毛泽东荒淫无度，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他**上床纵淫欲，立地呈君子**。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说：“**党的教条越道德化，毛主席私生活越是资本主义化。**”为了维护毛泽东“伟大、光荣、正确”的光辉形象，中共把这种毫无廉耻的糜烂生活，列为党和国家高度机密，任何人胆敢泄露，都将受到严惩。例如，“拉皮条”高手叶子龙，因“秘密录音事件”失宠而离开中南海后，怨言颇多，曾多次宣扬毛的桃色新闻，终于祸从口出。刘少奇闻听大怒，立即下令：“这是污蔑我们党，把他抓起来枪毙！”要不是叶子龙曾有恩于周恩来、彭真等大人物，早没命了。在周、彭等人的斡旋下，叶算保全了性命。

还有一位空军女舞蹈演员，某部副参谋长的女儿，在毛死后，因生活不太如意，声言要写一部“中南海宫廷秘事”，将交给台湾出版。为防“党和国家高度机密”被她泄露出去，立即被安全部门“圈”了起来。“圈”在那里？直到今天，她父母也不知道：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只好听天由命。在同一世纪的两个不同国度里、又同与本国“**最高**”有染的两个不同女人，中国的她就没有**莱温斯基小姐**幸运。莱小姐与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被曝光后，立刻成了全世界耀眼的明星，一连串的聘约使她应接不暇，而总统克林顿则被检查官、媒体、国会搞得焦头烂额，无以对应，差一点被弹劾下台。**中美差别：天上地下！**

10-中共伦理共识，是帝王意志实现的保证

帖子由 于松然 » 2024 年 1 月 6 日

作者：于松然，文章内容谨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中共伦理共识，是帝王意志实现的保证

长期以来，在刘少奇的倡议下，在毛泽东的长期培植下，在陈伯达、胡乔木等高级权贵和御用精英才子们的长期鼓噪下，简而言之，在党的伦理哲学上，已经形成一个顽强共识：下级无条件服从上级，全党无条件服从中央，中央无条件服从毛泽东；维护毛泽东的伟大、光荣、正确，就是维护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反对毛泽东就是反党、分裂党；党员是党的驯服工具，党叫干啥就干啥；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要揭发、批判一切反对毛泽东的人和事；不允许对党有半点怀疑，等等。这种强调无条件服从的中共伦理共识，是封建“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翻版，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形成的封建独裁的赤文化。这种赤文化的特点是：为了目的，可以使不择手段的行为“高尚”化、“道德”化；而这种“高尚”化、“道德”化了的手段，可以随意颠覆仁义理智信的传统道德，任意践踏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普世价值。

为了迫使彭德怀就范，毛指派同其关系不错的聂荣臻、叶剑英元帅，去说服彭德怀低头认错。聂、叶见彭后，晓之以党要团结的大“理”：不能单从信的方面来看，即使有些批评完全合乎事实，也要从如何对全局有利上想；动之以数十年友谊至“情”：要用任劳任怨委曲求全的精神，从全局利益出发来检讨自己。聂、叶不辱使命，在他俩的“帮助”下，彭终于承认他写的信是“反党”，并做了检讨。这里，中共常说的实事求是的道德观，已被中共伦理共识所颠覆。

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彭德怀，终于上了毛泽东的圈套；聂、叶虽没有落井下石，却为虎作伥，当了一次助纣为虐的不光彩信使。

见到彭德怀的检讨后，毛泽东便多次严辞批判起彭来：

“你们要瓦解党，这回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从右面向正确路线进攻。”

“彭德怀讲什么‘自由、平等、博爱’，根本不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叫上层建筑，什么叫经济基础。他就是不懂，又装懂，发表长篇大论。”

“我们认为你是反中央，信是准备发表的，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

“就是说你这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

“搞彭氏宗祠，要实行民主，这回决定开中央委员会。华北座谈会操了 40 天娘；补足 20 天，这次也 40 天，满足操娘要求，操够。”

“现在庐山会议，这个时候，不是反‘左’的问题，而是反右倾，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的领导机关、向 6 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猖狂进攻的问题。”

“我看无非是你想挂帅，与其你挂帅，不如我挂帅。”

毛泽东在一封《给张闻天的信》中，正式提出“军事俱乐部”这个名称。信中说：“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里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真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

会上，在毛的指挥下，“大臣”和各地“诸侯”们，使用党内惯用的毛式批斗法纷纷落井下石，信口雌黄地对彭德怀及其支持者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展开全面围剿。下面根据《庐山会议实录》，摘录他们的部分批判彭德怀时的发言（多次会上发言，时间不分先后），供读者赏鉴：

刘少奇（中共中央常委排名第二，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文革中遭批斗，囚中断药，不治而亡）：

“（你）反对唱《东方红》。认为中国也有个人崇拜，中国很需要反个人崇拜。”——从“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到“人民的大救星”，马克思主义这种自相矛盾的发展，就是中国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我想我是积极搞个人崇拜的。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刘的“积极搞个人崇拜”，是为埋葬自己在“积极”挖掘坟墓！这就是代价。

“你拉李井泉（笔者：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说四川没放卫星好。”——一句“说四川没放卫星好”，便成了结党营私的罪证，可见刘少奇的逻辑已荒唐得即可笑又可悲！

“对我们的搞法，（你）总是不满意。”

“同彭这样的人，难搞成朋友。”——朋友不成就打倒，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同意主席讲的（你）有野心，（你）要按自己面貌改造党。根本问题在此。”——一封《意见信》就被斥为“有野心”，这对于倡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闻者足戒”的中共来说，不失是一个绝妙的讽刺！这是毛、刘、周、朱、陈、林、邓七大领袖的逻辑，是中共伦理共识的逻辑，当然根子是无产阶级专政。

周恩来（中共中央常委排名第三，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文革中是毛泽东的助手和总管，遭几次批判，险些被打倒，最后被内定的医疗制度拖死）：

“（你说）驯服就没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你的骨头是犯上。”——没有自我；周的后半生，是一个在毛泽东面前战战兢兢的驯服工具。

“华北（你）又闹独立自主。回延安三年格格不入。”——在中共党内，独立人格是大敌！

“方向是对总路线进攻，（你）站在右倾立场，信的锋芒指向总路线。”

朱德（中共中央常委排名第四，副主席，元帅，文革中遭到冲击和批判）：

“彭德怀的信虽然没有直接说出悲观失望，但是他把缺点错误说重了。”

“彭总有一股拗脾气，今后应该注意改掉。”

“彭总在生活方面注意节约，艰苦卓绝，谁也比不过他。”——这是少有的不同声音。在尊贵的高级官员们看来，朱有点“不识时务”！

“开始只当做一般文件看待，并未引起重视，听到主席讲话后，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对信的认识，有个变化过程。开初只觉得有些提法、词句不当，但精神是好的，没有意识到这是根本方向问题。”——朱德的发言，被毛泽东当面斥为“隔靴搔痒”。

林彪（中共中央常委排名第六，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元帅，文革中仓皇促逃，同老婆儿子摔死在蒙古国）：

“动机是（你）从个人野心出发，捞一笔。”

“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冯是与蒋介石分庭抗礼的军阀。

“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马屁拍得理直气壮，无耻之尤！

“论知识、精力、威望，只有毛主席有。（你）自负太大，刚愎自用。”——但在背地里却说毛批彭是“说绝了，做绝了，绝则错。”

彭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第一书记，市长，文革中遭批斗，扭断右臂）：

“你在西北小组讲：（错误）人人有责，包括毛主席。”——在他看来，毛泽东不会犯错误。当他被红卫兵扭断右臂时，是否还坚持他的看法？

“（你）说毛主席的话乱传一气，盲目服从。”

“首先是你的党性，同中央抢先。信是个纲领，一条路线，重点在后一部分，目标是毛主席。”——共产党的党性就是绝对服从中央和毛泽东，这种奴性就是中共伦理共识。

“（你）反对个人崇拜。”

“毛主席的路线已得到证明，基本上已证明总路线的正确，也应服从。”——在总路线制造的饥荒中，开始饿死人的消息已传入了中南海；但为了紧跟，他竟瞪着眼说瞎话。

贺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元帅，文革中遭批斗，囚室里药死）：

“（你）对主席成见深，信中有历史成见。”

“德怀同志的信，我认为是一个反党的纲领。他过去几次在紧要关头上发生动摇，对毛泽东同志是很不服气的，当了错误路线的帮手。这一次他迫不及待地拿出反党纲领，也完全是对着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信》就是“反党纲领”，贺老总也落井下石；最终也要为落井下石付出代价。

罗瑞卿（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大将，文革前遭批斗，跳楼自杀断腿残）：

“（彭德怀）所谓艰苦朴素，实际上很多都是装的。不要说他的生活、为人很多都是装的，即使是真的，可是总是反党，反对党的正确领导，反对总路线，这种所谓生活朴素又有什么用处？”

“遵义会议以后，一有机会，你还是反（毛主席），直到现在你还要反，这是为什么？”——反对毛主席就是反党，这是中共论理共识。可悲的共识！

陶铸（中央委员、中南局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文革初曾为中共中央常委，不久被打倒，囚死于合肥）：

“他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核心很不服，牢骚话不少，情绪不正常。这次会议上对毛泽东同志咬牙切齿。《意见书》不过是公开发的箭，在背后对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不知道放了多少更毒的冷箭。”——这是感觉推理。七年后，凭着这种推理，把他自己推到合肥囚毙。

“彭德怀同志说党中央没有民主，那是胡说。大家知道，毛泽东同志亲自制定了一系列党的生活原则，党内的民主有了充分的保证。”——当他在合肥囚毙前，还这么认为吗？

“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功则归己，过则归人，是彭德怀同志的一贯作风。”

黄永胜（中央委员、广州军区司令，上将，文革时任总参谋长，林彪集团要员，十五年徒刑中监毙）：

“（彭德怀）军阀主义、目中无人、个人主义。从历史上看，我对他能够彻底改正错误是没有信心的。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要带着花岗岩的脑袋进棺材。”

当年中共中央常委排名第五、第七的陈云和邓小平，他俩对批彭的态度？因无资料，无法书录于此。

在彭德怀孤立无援的时候，陶铸 8 月 5 日写信给黄克诚大将，“大义凛然”又十分“精彩”地劝说他“落井下石”。信中写道：“德怀同志的错误已明若观火，你为何不毅然站出来与之划清界线，帮助德怀同志挖掘思想，切实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我以为这种帮助即使你与德怀同志友谊决裂，也并不表示你对德怀同志‘落井下石’，而是‘君子爱人以德’，真正站在党的立场上给他以同志式的帮助。你我都读过一点所谓古圣贤之书，一个人立身于世，不讲求操守是很可悲的。尤其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否则便不能称为‘贞节’

之妇。”——最终被毛囚毙于合肥的陶铸，他所说的“君子爱人以德”、“操守”和“贞节”，就是不顾“君王”独裁权力造成饿殍遍野的苦难，也要维护这个“君王”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陶的信和他结局，不发人深省吗？

从以上摘录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些尊贵的大员们是怎样批判彭德怀的。在这种充满无产阶级“凛然正气”的批判中，他们说的是真话？良心话？还是假话？昧心话？那些是与人为善话？落井下石话？在一贯倡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闻者足戒”的“伟大领袖”面前，他们中那些是秉公者？正义者？那些是盲从拥戴者、争宠谄媚者和谎言制造者？法国作家、哲学家让·保罗·萨特的有句名言是：“搞政治一定会把手弄脏。通过原始而残酷斗争夺取政权的政治体系，不可能具有很高的道德水平。”他们的道德水平究竟有多高？是否已经把手弄脏？请读者自己判断。

此时的彭德怀元帅，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他多次做过这样无用的招架：

“我是直接写信对你（笔者：指毛泽东）讲的，没有搞非组织活动。”——在没有民主的党内，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你们这样推测，就难讲话了。”——有罪推定，是“人权首先是生存权”的逻辑！

“现在还难接受。”——在毛的中国，你只有接受批斗的自由！

“我没有律师辩护，你们像法庭审判。”——在中国，毛一言九鼎，谁敢替你辩护？这种“审判”司空见惯，历来如此，彭焉能例外？

“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了吧！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站出来报名吧！”——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有绝望的自由！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在8月2～16日的八届八中全会上，进一步开展了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最后全会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两个决议。

如果说在决议前，“保卫党的总路线”是为了保卫“崇高”的乌托邦理想，而在决议后，这种“保卫”已经变成捍卫独裁权力的手段。

值得一提的是，时任总参谋长的黄克诚大将自投罗网。他上庐山时，毛清除彭德怀的决心已定，且已明朗化。出人意料的是，这位黄大将军在读过彭德怀的“意见书”之后，当着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三巨头的面，毫不含糊地表示：“我同意这封信里的意见。”接着便与刘、周二人辩论。辩论话题无意间涉及到四平战役时的一件事，毛泽东插话说：“那是我决定的。”黄竟敢顶撞说：“你决定的也是错误的。”在中共伦理共识下，黄成了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对此，有人投书赞曰：“**壮哉！黄大将军！全党全军仅此一人！**”笔者认为，在现代文明社会里，黄大将这种言行属实话实说的常行，但在中国特色的环境里，的确值得赞美。然而不久，还是在那座山上，还是这位黄大将，竟跟着别人落井下石揭发起他的上司“骂毛泽东同志”来。是划清界线抑或效忠、谄媚？在没有或缺乏自由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权贵们的人格已经扭曲得令人看不清、摸不透！



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该决议1967年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题目略有修改。

图：两个决议

8月16日，毛泽东断言：“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10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这种无限上纲式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

9月17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命令：免去彭德怀兼任国防部部长和黄克诚总参谋长

的职务，任命林彪兼任国防部部长和罗瑞卿兼总参谋长。

随着彭德怀倒台，不少军事将领跟着遭殃。

1959年8月18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林彪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激烈批斗彭德怀的会议上，总参谋装备部部长**万毅**将军公然号召说：“直说了吧，现在有人尽做好梦，头脑发昏……全然不顾底下的老百姓吃苦受穷！我敢说，彭总的‘意见书’一点没错！……赞成彭总意见的请举手。”面对对彭的“揭发”，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将军，突然在台下大声喊道：“胡说！你们完全是无中生有，造谣惑众！”并大喊：“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已经宣布成立了，那就宣布我钟伟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吧！也拿我去枪毙吧！”他们两个的下场自然是被手铐铐出会场。看来，中共高级干部中，并非都是落井下石的无耻之徒。

接着，遭到清洗的还有：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沈阳军区政委**周桓**，铁道兵司令**滕代远**，国防部副部长**萧克**，原志愿军副司令员、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邓华**等上将。最为惨烈的是：江苏常州某局长**蔡铁根**，原是南京高等军事学院的训练部长，红军，大校军衔，1959年反右倾时被撤职。文革初被抄家，发现他的日记本里有为彭德怀鸣不平的话，旋即揪出，1970年3月11日被处决。

庐山会议后，全国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先后揪斗出高达200万（另说：高达1000万）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数千人自杀。借着大批“右倾机会主义”的风暴，掀起了“持续大跃进”的高潮，使“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荒谬政策恶性发展，使刚开始不到半年的饥饿，迅速扩大，很快演变成饿殍遍野的惨局。到了1961年中期，工农业全面跃进，导致**3,000-4,500万人饿死**。官方承认“非正常死亡”有3,767万人(4)。这就是毛泽东帝王权力一次大发威的惨烈后果。（由于中共档案死不解密，上述数据版本很多，尚须人们仔细考证。）

1959年的庐山会议表明，中共伦理共识——这种已“高尚”化、“道德”化了的“理性”，使国家利益屈从于党的利益，党的利益屈从于毛泽东的个人权力，而人类自由理性和道德价值已荡然无存。

如果说“一化三改造”和人民公社的社会主义，把中国人变成了物质权力的雇佣，而反自由、反人权等无休无止的阶级斗争即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则把中国人变成了精神权力的奴仆。

庐山会的重要性在于，在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陶铸和贺龙等在内的尊贵大员的支持、纵容和争宠谄媚下，毛泽东帝王权力进一步加强，为数年后打倒、斗死他们自己（刘、周、林、陶、贺）的文化大革命，打下了基础，埋下了祸根。

11-毛和刘、邓的不同反思

帖子由 于松然 » 2024年1月10日



作者于松然

毛泽东、刘少奇和邓小平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恶果，都有所反思，但反思的广度和深度相当不同。

毛泽东为他制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辩护，说“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有错，也是执行中的问题。之于饿死了几千万人，他告诫大员们不要看得过重。他曾对他的“御医”李志绥说：“我们有这么多人，死个一、两千万算得了什么？”会前他很乐观，他认为，国内困难形势已进入谷底，召开“七千人大会”，把过去的工作总结一下，各级领导干部承担一下责任，批一下分散主义，告诫大家要听中央指挥，就能打开一个新局面。他的乐观还表现在为“七千人大会”作准备的中央小型工作会议上，他热情地向与会者介绍他的新作《卜算子·咏梅》：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

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显然，他告诫与会者：在困难中要看到光明，对“三面红旗”不能动摇。不过，也有人这么解读他的诗词：“待到饿殍遍地时，他在丛中笑。”——显有解读过头之谬。

其实他的这首词，是为**安慰女友**所作。在这里，他拿了过来作政治拔高处理。对此，他的专职医生李志绥在其《回忆录》中有所描绘。

无独有偶，台湾著名作家**李敖**，也认为此词与女人有关。2005年9月21日，他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调弄“伟大领袖”说：

“看看主席的词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花都开了以后，我在花里面笑。可是我告诉你，毛主席的真相，他的第一次原稿不是这样的，……他的原稿是**他在旁边笑**。他是个旁观者变成在中间，大家知道什么境界呢？……以前女孩子穿的是玻璃丝袜，在大腿中间吊着，……她把袜子穿上去以后，所以她有了全世界最漂亮的大腿，袜子没有穿上以前，我有了全世界最漂亮的丝袜，你有了全世界最漂亮的腿，就是**他在旁边笑**，丝袜套上大腿，就是**他在丛中笑**。”

笔者在其演讲稿的旁批中，戏而和之曰：

哈哈！开涮“伟大领袖”。按照李敖大师的“诠释”，毛泽东那首词的下阕四句应改为：“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袜套大腿上，**x**着美腿笑。”这是笑话，读者自不必当真。

毛泽东向与会者还介绍了另外两首诗，其意图更加鲜明。那是钱昌照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两首小诗。钱诗对当时饿殍遍野的农村形势进行赞美：

《芦台农场》

麦苗肥壮谷登场，

谁信当年一片荒？

排灌齐全轮作好，

芦台今日是粮仓。

《藁城农村》

薯曝墙头菜挂檐，

棉田片片麦无边。

农村活跃歌声里，

绿女红男夕照前。

钱昌照何许人也？他是“民革”中央常委。在饿殍遍野的年代里，他所看到的竟是五谷丰登和莺歌燕舞，不承认“当年一片荒”。毛泽东需要这些“民主党派”的谄媚来点缀中共的民主，用谎言来证明“三面红旗”的正确。毛以安慰女友的诗词告诫大会主持者，以钱昌照的精神起草大会报告。

然而，与会者并没有领会他的意图，在起草大会报告里，多了些错误和缺点的描述。毛虽不满意，但大会的列车已经启动，他也只好随车相机行事。

在报告稿的推动下，大会偏离了毛泽东预定的方向，几乎成了控诉“三面红旗”大会；大会的主导权，正在向刘、邓手里转移。这一切好像是专跟毛作对，使他“憋了一肚子恶气”。

为了掌握大会的主导权，在党内的压力下，毛泽东被迫“自我批评”。他说

“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

这种空洞无物的“自我批评”，毫无诚意，但已伤及“伟大、光荣、正确”的光辉形象。

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还为他的罪责辩解说：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毛泽东的“缺乏经验论”，论理深奥，调门高超，充满训谕，毫无悔意。人们不会忘记：他的总路线政策实行伊始，苏共中央曾劝告他吸取 1932～1933 年代苏联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的教训⁽¹⁾，被他嗤之以鼻；彭德怀在《万言书》中，直言不讳地批评他的大跃进政策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使“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忠告他“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被他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陕西户县大队干部杨伟名等农民，上书《当前形势感怀》，向他发出正义呼声，指出他的人民公社政策已使“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遂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杨也被迫服毒自杀。然而，无上权力，却能使他把他的独断专行美化成“缺乏经验”和“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是可笑还是可憎？

不过，“充满训谕”的调子已经没有两年前的自信了。那时，1959 年 7 月 23 日，面对已经开始大范围的饥荒和饿殍，他轻松地说：“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他的“没有什么可紧张的”轻松，却使中国数千万农民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刘少奇的反思与毛大不相同：相对诚实得多。他说：

“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 这是因为 1959 年、1960 年、1961 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 1961 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 40%，或者还多一点。”——显然，这是难得一见的实事求是！

“这种困难的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 为什么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而且减少了呢 原因在哪里 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 1958 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主要的呢 ”

“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 有没有天灾 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天灾是一片，人祸是一国，要记取这个教训。”——“找死咧！”在毛泽东面前，他说这种真话太大胆了。果然，几年后，他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

当听到刘少奇讲“天灾是一片，人祸是一国”时，会上出现了异乎寻常的热烈反应，经久不息的掌声，使坐在正位上的毛泽东十分尴尬。

“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掌声使刘忘乎所以，忘记了“指头论”的发明人毛泽东，就坐在他的身边。

“……另一方面，我们不少领导同志又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

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同时，在党内和群众中，又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斗争，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话，也不让讲真话。这样，就严重地损害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使上下不能通气，使我们在工作中的许多错误长期不能发现，长期拖延不能改正。”——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因三篇日记获“恶攻罪”的笔者，才得以解脱。

在“三面红旗”问题上，刘少奇也说是“完全正确的”，但似乎是违心的。他在一些小型会议上曾袒露心扉说：“‘三面红旗’比较难说。”他甚至还说：“因为这是个历史事实，过了十年、八年，还可以总结的，五十年以后还要讲的。死了这样多人，生产力有这样大的破坏，受了这样一个挫折，历史上不写，省志上不写，不可能的。”——其实，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省志上不写也很有可能。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在中共党内并不少见。也许三年的饿殍枕藉，使疯狂追求毛式乌托邦的刘少奇，良心受到了强烈的谴责。他说这些话时，竟激动得忘乎所以，忘记了他所倡导的“溜须拍马不好，但为了革命工作，就是好的，就应该做”的哲学，忽视了毛泽东的尴尬，为文革中被打倒、被迫害致死，埋下了祸根。

邓小平反思与刘相近，远不同于毛。他了解毛的品性，他自始至终没有涉及“三面红旗”问题，也没有讲成绩和错误的比例，也没有讲天灾、人祸的关系，有意回避了毛的“1：9”的“指头论”，更没有像刘少奇那样慷慨激昂。他说：

“最近几年，我们党的领导，党的工作，是有严重缺点的。”

“党的实事求是、说老实话，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这三个方面的优良传统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削弱。”

“这几年运动中斗争过火，伤害了一大批党内外干部，因而在党内滋长了一种不如实反映情况，不讲老实话，怕讲老实话的坏风气。”

“我们党内一定要有充分的民主。党员对党，对工作，对问题，对领导人，都有权按组织原则，在党的范围内，提出批评和意见，并且有权保留自己的意见。”

“党的各级领导人（包括党委会的所有成员），应该有监督。”

也曾为毛式乌托邦疯狂过而今有所自省的邓小平，显得比刘少奇老练些，城府更深些。但他打着毛的旗号影射毛的作法是自作聪明，是逃脱不了毛泽东犀利目光的。

刘少奇和邓小平把反思的调子，放在表面的纠偏上，没敢涉及“三面红旗”本身，更不愿追本溯源到马列专政理论和体制上，因而纠偏调子没有毛泽东那么“高超”。但刘、邓在会上的有限反思，已使毛泽东有理由认为，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已“杀”入最高核心，令他惴惴不安的“赫鲁晓夫”，就睡在他的身旁。决不允许大权旁落的毛泽东，正在等待时机，扭转并主导大会方向。

附 1、苏联大饥荒

由于斯大林强行实行农业集体农庄和公社化，枪杀了 100 多万个反对集体化的“富农”，使苏联农业大幅度减产，从而引发 1932~1933 年的全国大饥荒，饿死了数千万人（由于俄罗斯不肯解密档案，史家众说纷纭，有饿死几百万、数千万和六千多万人之不同说法）。其中，有苏联“粮仓”美誉的乌克兰，就饿死了 700~1,000 万人（另说饿死 750 万）。对此，六十五年后的 1998 年，乌克兰总统下令把每年 11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设定为乌克兰大饥荒纪念日；八十二年后的 2015 年 4 月，乌克兰议会通过了“关于谴责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等集权主义影响和清除其标志的法案”，宣布宣传共产主义为非法！

12-毛泽东反击刘邓主动出击——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帖子由 于松然 » 2024 年 1 月 10 日

作者于松然

这是毛泽东反击刘邓的谋略之一。

首先，毛泽东要观察一下刘、周、陈、邓，看看他们能走多远；让他们继续在第一线主持工作，他可以在一边静观事态的发展。经在半年多的观察，他发现，刘、周、陈、邓等人的所作所为与他的想法背道而驰。他已无法容忍，决心重返一线，利用党主席的权力，进行干预。于是，他向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周、陈、邓等中央大员，挥舞起可以置他们于死地的大棒——**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专利。马克思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里，他把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斗争，简单而武断地归结为物资财产占有形式不同的两个阶层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而且是你死我活的。尽管他用财产占有形式来划分阶级，但他并不否认精神层面上的矛盾和斗争，如宗教、信仰和政见分歧等等。他说：“**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对此，恩格斯呼应道：“**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这样，马、恩两人在阶级斗争与政治斗争之间划了个等号。等号证明，他们所说的阶级斗争，并不局限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进而他们“证明”，一切宗教、信仰、政见、权力分配等政治上的分歧和斗争，都是两大阶级斗争的反映。——这就是他们的丛林法则逻辑。对于政治斗争，马克思认为可以不择手段。他宣布：“**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只是必须肯定，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历史记录证明，列宁是第一个“同魔鬼结盟”的实践者。普列汉诺夫曾批评他的学生列宁说：为了胜利，他“**甚至可以和魔鬼结盟**。”这样，马列主义的所谓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实际上已变成了赤裸裸的权力斗争。

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大都是聪明的怪物——天才。当他们打天下时，便同土匪、

痞子、流氓等魔鬼结盟，打着“解放”人民的旗号进行革命，美其名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他们夺得政权、正襟危坐于高堂之上时，他们便说“这是人民的选择”，美其名曰：“人民当家做主”；当他们宣布“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而对人民实行残酷迫害、屠杀时，却不忘往脸上贴金，自称是“为革命”、“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等等。他们的天才还在于，通过“舆论一律”和“主旋律”的洗脑术，用血腥的阶级斗争，洗掉恻隐、宽容、仁爱、理智的华夏文明和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使芸芸众生变成俯首贴耳、唯命是从的羔羊和奴隶。

没有有效监督的权力，必然是**官僚特权阶级**的权力。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的普选制、监督制、随时罢免制和兼管行政和立法的“议行合一”制。遗憾的是，所有掌权的共产党人，都拒绝实行巴黎公社的普选制、监督制和随时罢免制，而对兼管行政和立法的“议行合一”制，却情有独钟。因此，当共产党人通过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夺得统治权力后，就做起官、当起老爷来，变成了剥削人民大众、镇压不同政见者的**官僚特权阶级**——一百多年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就是一部把“人民公仆”变成“人民老爷”的历史。

毛泽东不愧为“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纯正”表现在：念念不忘高举阶级斗争的大棒。换句话说，就是为了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为了权力，敢同魔鬼结盟。

在井冈山，毛泽东与土匪**王佐**、**袁文才**结盟，拜把兄弟，落草为寇，并纳袁部“女战士”贺子珍为妾；后因共产国际不容，王、袁反叛，遭处决。毛闻后，疾首顿足，发誓报仇。不久，击毙袁文才者朱昌偕，被毛打成“AB团”成员，遂遭“错”杀；二十多年后，毛又将杀王者彭德怀，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囚毙在监所。毛利用权力，先后翦除了朱、彭，总算告慰了土匪王、袁的魔灵！

“七千人大会”后，“憋了一肚子恶气”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要出一出心头的恶气了。此刻，“七千人大会”后不到半年，威胁他的权力的主要敌人，已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也不是地主资本家，而是昔日与他南征北战中患难与共的战友，而是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倍受折磨的老百姓和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此刻，他在将自己封为无产阶级代表的同时。将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右派，定性为“**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将知识分子定性为**资产阶级**和**牛鬼蛇神**，他与他们之间的权力、权利斗争，也就变成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为了与党内右派“官僚主义者阶级”作斗争，他在十中全会前的北戴河会议上，为阶级斗争大造舆论。在那次会议上，他大反周恩来在广州科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批判周关于“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估判，将知识分子与地主、富农子弟摆在同等地位上。他说：“还没有及时对他们进行教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阴魂不散，动摇不定。”他斥责王稼祥“三和一少”的建议是修正主义。农业部部长**廖鲁言**曾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就没有搞好的。”又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到底对不对？如果对话，为什么闹成这个样子？”闻言后，他怒斥廖的讲话是“中国的修正主义典型言论”。宁夏回族自治区区委**葛曼**和甘肃第一书记**汪锋**，因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农业生产有了很大起色，但毛认为葛和汪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他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的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这是搞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搞资产阶级专政？”毛的批判，

导致文革中汪被批斗，葛自杀身亡。他还怒骂主张包产到户的邓子恢是“资本主义农业专家”。其间，彭德怀给毛和党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请求全面审查他的历史。对此，毛信口雌黄地指控彭：“不但里通苏联，还勾结了全世界包括美帝国主义在内的反动势力”。他下令中止全国的甄别平反工作。

接着，在紧握军权的林彪支持下，在 1962 年 9 月的中共十中全会上，他挥舞起**阶级斗争**的大棒，打向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右派集团，狠批他们的“**单干风**”（笔者指农业包产到户）、“**翻案风**”（笔者指刘、邓部署的甄别平反工作）和“**黑暗风**”（笔者指“七分人祸、三分天灾”的形势估判观点），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危言“**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告诫全党、全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规定各项工作要以“**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此时的毛泽东，已成了说一不二的独裁者；他的讲话，一锤定音，使“七千人大会”刚刚形成的有限民主的活跃气氛，迅速消失殆尽。

但他的倒行逆施还是受到了抵制。于是，他要破釜沉舟。1964 年 12 月 27 日，在林彪等大员参加他的生日宴会上，他借酒发飙、发出颠覆中共的狂言：“**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书记处都要排斥姓毛的。毛还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要逼我造反，我就造个天翻地乱！**”——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纯正”的阶级斗争观！

13-明修栈道——四清

帖子由 于松然 » 2024 年 1 月 10 日



“四清”中黑龙江省阿城县阿什河公社的批斗会 被浏览 967 次

作者于松然

历史已经表明，刘少奇等人的“三自一包”政策，是对农民的“让步”，缓解了“三面红旗”对农业生产的破坏，恢复了部分粮食生产的活力，至少挽救了一千万农民的生命。因此，在纠正“三面红旗”的巨大破坏问题上，刘少奇等人的功不可没。

资料表明，在北戴河会议上，刘、周、陈、邓并不同意毛的讲话。但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出于自我保护，他们都放弃了与毛争锋，而采取阳奉阴违的策略。

在建立绝对权力的道路上，毛泽东高高举起的阶级斗争大棒，首先打向官僚特权阶级中最弱的农村基层干部(右图)，然后自下而上，最后棒打高层。

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和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1963年5月，走火入魔的毛泽东，在杭州制定出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前十条》。他在文件中写道：“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党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把反革命气焰压下去。”他又煞有介事地说：“如果不抓阶级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甚至妄言：“总之，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于是，以农村基层干部为批斗对象的“四清”运动，即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的“四清”运动，便在全国开展起来。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农村搞“四清”呢？不少学者认为是为了防修反修。他们的证据之一是，毛曾说过：“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一种不可能。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但农村干部何须“收买”？当农村的党支部书记从一个贫穷的贫雇农变成雇主代理掌管了全村的土地、农具等全部生产资料并握有行政、人事大权时，在没有有效监督的体制下，必然会产生“地主”的占有渴望，无须收买，便会产生对账目、仓库、财物和工分的占有行为。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制造的“一大二公”高度集体化的必然结果。

考察一下毛泽东的历史，人们就会发现，毛泽东说的同他心里想的、说的同做的并不一致：有时看起是目的的，实际是手段，而有时看起来是手段的，恰恰是他的真正目的。“三面红旗”的失败和大量饿死人，毛都十分清楚。但他的性格是不承认失败，否则，他的“伟大、光荣，正确”的英明形象就会受到质疑，他的领袖地位就会因而发生动摇。这就是他的**大跃进**情结，或称“三面红旗”情结。这种情结，使他必须坚守住“三面红旗”的底线，并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问题**，统统算到阶级敌人破坏和歪嘴和尚念歪了经上来。显而易见，他反复高唱的防修反修的目的，实际上是保卫他个人权力的手段。这与大恶大奸没有什么二样。毛泽东这种随条件置换目的与手段的哲学，注定他是个毫无诚信的痞棍。

毛泽东拿农村基层干部开刀，可以达到一石三鸟的目的。

首先是转移怨恨。大跃进，使农民吃尽了苦头，埋藏在心底的只有对毛对党的怨恨。为了化解怨恨，四不清的干部就是最好的替罪羊；**其次**，警告他的宿敌地、富、反、坏、右，要他们老老实实，不得轻举妄动；**第三**，警告各级干部，特别是警告党内那些与他意见相左的右派集团干部，特别是刘邓等高级干部，要他们维护“三面红旗”，特别要维护“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

“四清”是个充满权力斗争的“四清”。对于毛泽东来说，“四清”是保卫权力的一个战略部署，对于刘少奇、邓小平来说，是自我保护和扩张权力的好机会。

对于“四清”，刘少奇说：“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现在就正式部

署一下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邓小平肯定也有说法，遗憾的是，笔者缺少这方面资料。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曾批评过阶级斗争，他说：“……在党内和群众中，又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斗争，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话，也不让讲真话。这样，就严重地损害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使上下不能通气，使我们在工作中的许多错误长期不能发现，长期拖延不能改正。”邓小平也批评过阶级斗争，他说：“这几年运动中斗争过火，伤害了一大批党内外干部，因而在党内滋长了一种不如实反映情况，不讲老实话，怕讲老实话的坏风气。”时间仅仅过去一年，他们已“忘记”了他们曾说过的话，大讲起阶级斗争来。

毫不奇怪，刘、周、陈、邓都是大搞阶级斗争的能手。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在镇反、暴力土改、反高饶、反胡风、肃反、反右、拔白旗、反彭德怀和大跃进、人民公社等运动中，他们都紧跟毛泽东，是毛的亲密助手，同毛一道，在中国制造了数千万人死亡的悲剧。庐山会议后，他们觉得毛越来越独断专行，觉得他们自己也越来越不安全，不仅怕当彭德怀第二、第三，更怕他们的党被毛一意孤行毁于一旦。因此，他们力图利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机会，逐渐架空毛泽东，使他成为一个名誉主席。但他们也知道，嗜权如命又聪明透顶的毛泽东，不会轻易陷入他们设计的圈套，于是，他们便“顺水推舟”来制造“紧跟”假象，借以麻痹对方。果然，他们在9月北京举行中共工作会议上，“顺”《前十条》的“水”，“推”出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的“舟”。《后十条》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更加严重的估计，对基层政权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第一次提出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概念，比《前十条》更左。《后十条》的出笼，使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

在刘少奇挂帅和亲自指挥下，“四清”运动以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在全国各地展开。全国各地实行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个县的办法。县以下由工作队统一领导，集中大量工作队员，开赴到各公社、大队、生产队，开展“四清”运动。据报导，江苏省组织了一支8万人左右的“四清”工作队，山东省参加运动的工作人员达5.4万人，浙江全省共抽调干部3.14万人搞“四清”，江西省则抽调干部2.92万人……“四清”运动本来就是权力斗争的产物，按后来的正统说法是“左”倾思潮的产物。由于自上而下不断反右倾，强调大兵团作战，热衷夺权，使运动充满火药味，血腥局面不断涌现。例如，陕西省长安县是全国典型。那里搞“四清”时，斗争手段以揭发批判为主，对其中所谓的“坏中之坏”、“霸中之霸”，大张旗鼓地进行公判，打击其“反动气焰”，对于那些久斗不服的“死顽固”、“牛皮筋”、“老狐狸”、“母老虎”、“老运动员”、“橡皮碉堡”等，狠批硬斗，甚至动手打耳光，碰头，有的当场被打得头破血流……在贵州，连邓小平的亲兄弟县委书记**邓蜀平**，也没躲过劫难，被迫自杀身亡。

1964~1965年，笔者在黑龙江省宁安县莲花一队搞过“四清”，担任工作组的材料员。运动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式进行，每个生产大队派工作队员30~60名不等。运动开始，首先大规模培训工作队队员。培训中，组织者把农村描绘成漆黑一团，许多生产大队或生产队已经烂掉，有三分之一的社队领导权不在共产党手里。工作队进村后，首先夺权，原干部一律靠边，等待审查。接着访贫问苦，开展忆苦思甜教育，通过扎根串连，重组阶级队伍，为重建农村政权做准备。对干部审查是，先“洗温水澡”，“解放”问题不大的干部，让他们

“轻装上阵”，“共同对敌”。对重点审查人物，发动群众揭批和斗争。在莲花一队，斗争会上也发生打人、捆人，一人自杀。

与此同时，刘少奇派夫人王光美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四清”蹲点，搞了个著名的《桃园经验》。她先搞“扎根串连”，然后搞“四清”，再搞血腥的对敌斗争；对待忠于中共和毛泽东的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多数都成了重点揭发和批斗对象；她强调“四不清”干部在上边都有根子，必然要用各种方法抵抗运动，不解决上边问题，“四清”就搞不彻底；她还强调“四清”的内容已经不止是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现在是要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等等。

应该说，刘少奇的做法和他的《桃园经验》，既符合毛“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形势评估，也符合毛关于防止基层“官僚主义者阶级”夺取政权的论断。然而，敏锐的毛泽东察觉：《桃园经验》与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大相径庭，特别是“七千人大会”后，一股对他不满的潜流正在全党上下广泛蔓延；刘少奇主持的纠偏工作，背离了他的方针，但其威望却与日俱增，已形成一山二虎之势。这不能不使毛泽东怀疑刘谋图：驾空不成，以极左面孔出现，力图把水搅混。

“四清”运动在刘少奇的直接指挥下，全国有 532.7 万多人接受审查和批判，在城市有 4,128 人致死，在农村有 73,432 人被打死或自杀，基层党员干部怨言很多。毛泽东趁机发泄对刘少奇的不满，指责其为“形左实右”。

有人论证说，毛、刘的分歧在于对“四清”的矛盾性质看法不同。刘少奇认为“四清”矛盾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毛泽东则坚持认为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有人还论证毛、刘分歧说，毛泽东的打击面小，但是打得狠，往死里打，当作敌人来打；刘少奇的打击面大，贪污百八十块钱的，占集体小便宜的，全面收拾一通，但是下手比较温和，整掉了毛病还是自己人。这都是表面看问题。事实上到 1964 年年底，在中共党内，“四清”政策上的分歧已经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察觉，刘甚至包括周、陈、邓等人，对他的权力已经构成了严重威胁。于是，他对刘主持的“四清”工作横挑鼻子竖挑眼，竟达到了出尔反尔的地步。

毛泽东说“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要“洗刷几百万”，刘少奇“顺”其思路，采取“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等方法去分清政权的敌我性质，此法被毛批准全国执行；但不久，毛批其为“神秘主义”，指责其为“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大兵团作战是毛的“杰作”，刘“顺”其思路，将大批干部集中到少数几个点上搞“四清”，此法被毛批准全国实施；但不久，又被毛斥责为“不相信群众”。风光一时的《桃园经验》，是毛批准向全国推广的；但不久，毛又反悔，竟批其为“大毒草”。一山岂容二虎？不论你怎样挖空心思顺水推舟，都是想占山为王，我岂能让你得逞！

1964 年 12 月 20 日下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刘在讨论“四清”性质问题时，发生冲突。刘少奇说：“这个主要矛盾怎么讲法？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毛泽东不屑地说：“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到了 26 日，毛泽东又当众指责刘少奇“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发泄了对《桃园经验》的不满。在扩大会上，毛对刘发泄的结果是怒出《二十三条》，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个结果，实际上剥夺了刘少奇主持“四清”运动的帅印。

此刻，聪明的刘少奇可能看出，毛发动“四清”的目的已不是整基层党员干部。因为，毛说要“**洗刷几百万**”，而他才整了几十万，怎么能说“**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呢？显然，毛是在借“四清”制造阶级斗争的舆论。当紧张氛围形成以后，毛就要用阶级斗争的大棒打他了。可惜，他觉悟得晚了。

据近来披露的《林彪日记》中记载：“1964年12月27日。好不寻常！我、伯达、康生，成了毛生日座上贵宾，还有婆娘（笔者：林彪私下对江青的称呼）。毛喝了一瓶白沙液（笔者：湖南第一酒），翻来覆去问：‘中央有人要抢班夺权，怎么办？要搞修正主义，怎么办？’又问：‘军队不会跟着搞修正主义吧！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书记处都要排斥姓毛的。毛还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要逼我造反，我就造个天翻地乱。’”“今天，毛来电吩咐说：‘今天我生日，心情舒畅，酒喝了过多，发了一通，不算数’，要我们不要传开。我想毛下一步要从北京市委、从计委、从中办、从文化部开刀。感到毛要整人了。”

《二十三条》制定和下达后，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的“四清”，从经济走上政治，突变成了**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和清思想**。为此，各地纠正了刘少奇一些更左的做法，解放了很多基层干部，受到基层干部的欢迎，上下关系、干群关系和城乡一度紧张的局面也有所缓和。但是，《二十三条》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矛头公开指向刘少奇所代表的党内右派集团。六年后，即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毫不忌讳地对美国记者斯诺说，《二十三条》就是要从政治上搞掉刘少奇。这表明，“七千人大会”后，毛、刘的第一个回合较量，以毛泽东胜利而告终。

毛泽东为什么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概念取代“官僚主义者阶级”概念呢？这是耐人寻味的。可能毛泽东发现，使用“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个概念推演下去，势必危及到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因此，使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概念，比较准确、安全。

但是，不管毛泽东把文字游戏玩得如何眼花缭乱，无法回避的是，不使用“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个概念，并不证明“官僚主义者阶级”不存在。二十世纪的历史证明，当垄断了全国一切资源的“三大改造”使毛泽东和中共变成全国唯一雇主后，便产生了一大批现代中国的**官僚特权阶级**。到了“改革开放”的八、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初，这个占有全国权力和资源的官僚特权阶级，在官商一体中，又大显身手，逐渐演变为官僚特权阶级与官僚垄断资本家相结合的**红色资产阶级**。如果说中国红色资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和富有，同中国广大工人、农民特别是其中的弱势群体相对贫困化，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主要成果，那么，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所孳生的官僚特权阶级，则是这个“主要成果”的执笔者。

14-毛泽东的两个批示——先拿弱敌问罪

帖子由 于松然 » 2024年1月10日

作者：于松然

人们都说，文痞姚文元是根棍子，军师张春桥是把刀子，戴着“约法三章【附1】”金

箍咒的毛夫人江青是个白骨精。棍子和刀子人们争议不大，唯白骨精尚须推敲。因白骨精有三变，而江青以不变应万变：咬人不变。她自己说，她是毛的“一条狗”，毛“叫我咬谁我就咬谁”，所以她是条狗子。棍子、刀子、狗子之所以厉害，完全是因为他的后台老板厉害。他们的后台老板就是毛泽东。为了整倒刘少奇、邓小平和以他俩为代表的党内右派“官僚主义者阶级”，毛在拿忠于他的农村广大基层干部开刀同时，没有忘记拿他的宿敌知识分子开刀；而知识分子中，他最讨厌的是文学艺术界的知识分子。这些人虽不持枪拿刀，但他们中有许多人的独立思考、独立人格等自由主义思想还未改造好，时不时用影射、旁敲侧击、借古讽今等笔法，攻击他的政策、路线和他本人，是刘、邓右派中的软实力。因此，对付他们，**棍子、刀子、狗子都要派上用场。**

1962年9月24日上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毛泽东制造舆论可以追溯到井冈山时期。“解放”后，他对制造舆论极为重视。他接二连三地批《武训传》、《清宫秘史》、《红楼梦研究》和胡风，就是制造社会主义革命舆论，或曰赤化革命舆论。为了推翻以刘、邓为代的党内外右派官僚特权阶级，他必须做好舆论准备：在大搞“四清”制造阶级斗争紧张氛围的基础上，拿文学艺术界的知识分子开刀，杀鸡给猴看。这是他做舆论准备的又一步阴棋。对此，有人称其为“阳谋”，是“不断革命”；但有人则管叫他为阴谋，是“层层剥笋”，先“剥”掉刘、邓右派的软实力。

此时的毛泽东，在刘、邓权势日隆的情况下，已倍感孤立。因无亲信可依，不得已，他派夫人江青打先锋。据原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回忆：“毛主席曾对乔木说过，**江青不会做什么工作，你们不要用她。**但是，后来主席改变看法了，曾对周扬说，**江青看问题很尖锐。**”被禁止干预朝政的紧箍咒箍得早已按捺不住的江青，受命后如释重负，决心不辱使命，她要大显身手了。

江青一出山，便拿着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向刘、周、邓刚刚制定并经中共中央批准下达的《文艺八条》开火。自称给毛当“文艺哨兵”的江青，曾“戴着大口罩罩到戏院看戏”进行调查。她“发现”文学艺术界“一塌糊涂”，就利用枕头风把这些情况吹给了毛，于是，按她的说法，“才有了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但明眼一看便知，这是毛在后台、江在前台表演的“双簧”。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给彭真、刘仁的一个文件上发出了第一个批示：

“此件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入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随后，根据这个批语，全国文学艺术界开始整风。此前的11月，毛泽东曾说：“《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把他们统统赶下去，不下去，不给他们发工资。”

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又在文艺界整风报告上发出了第二个批示：

（文艺界）“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毛泽东对文学艺术的偏执狂，已经到了变态的地步：1964年7月，他发出“关于取消盆花和庭院革命化的指示”：

“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的东西，这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架鸟的人玩的，那些吃了饭没事做的人，才有闲工夫养花摆花。全国解放已经十几年了，盆花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比过去发展了，现在要改变。我不喜欢房子里摆花，白天好像还有点好处，晚上还要有坏处。我的房子里的花早就让他们搬了，以后叫他们把院子里的花也搬了。你们在院子里种了一些树不是满好吗？还可以再种。你们的花窖要取消，大部分花工要减掉，留少数人管理庭院。今后庭院还要多种树木、多种果树，还可以种点粮食、蔬菜、油料作物。北京市的中山公园、香山要多改种些果树和油料作物。这样既好看，又实惠，对子孙后代有好处。”

花鸟也在制造阶级敌人，真真一个草木皆兵！

1964年7月，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成立了“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如果说江青抛出的《“有鬼无害”论》是文化革命的第一炮(见下)，“五人领导小组”的成立，则是毛泽东文化革命的组织保障。虽然那时还没有形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概念，但按毛泽东的部署，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已经开始。天才谋略家毛泽东，用“欲擒故纵”的策略，任命彭真为“五人领导小组”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并以组员康生为耳目。

毛的两个批示，推翻了1962年4月30日他批准下达的《文艺八条》。《文艺八条》要求文学艺术界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确开展文艺批评，批判地继承民族遗产，吸收外国文化和加强文艺界的团结，等等。

毛泽东为什么要推翻他领导下的中共中央批准下达的《文艺八条》呢？

作家涂光群在他的《中国“作协”“文化大革命”的历程》一文中说，著名文艺评论家冯牧听了批示后，在极度的惊诧中脱口而出：“这些话要不是毛主席说的，我还真以为是右派言论呢！”笔者认为，冯牧的惊诧，代表了文学艺术界权贵和御用文艺精英们的困惑。

长期以来，文学艺术界御用权贵和文艺精英们，在政治伦理上已经认同并紧跟了毛在政策上的出尔反尔：“**为政治服务**”就可以**不择手段**。这种马基雅维里式【附2】的“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和“为了统治不计道德”的君主政治信条，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解放”后，为了加速赤化革命进程，毛泽东推翻了他的“**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的民主承诺，接二连三地发动了对《武训传》、《清宫秘史》、《红楼梦研究》和“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整肃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而在批判和整肃中，文学艺术界的御用权贵和精英们，都是毛的鼓手、棍子或抢手，是毛泽东的依靠力量。在反右中，毛推翻了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文学艺术界的御用

权贵和精英们，便紧紧跟上，跟着毛的指挥棒大打出手，使一大批文学艺术工作者沦为右派分子。如今，毛又推翻了他“七千人大会”上保证“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的“三不主义”，又抡起了棍子。然而，令文学艺术界的御用权贵和精英们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这次抡起的棍子，不仅要打一般文学艺术工作者，更要打他们，怎不叫他们惊诧？



毛泽东、周扬、茅盾、郭沫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

毛泽东、周扬、茅盾、郭沫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jpg (15.57 KiB)
被浏览 908 次

毛泽东、周扬、茅盾、郭沫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艺术界的御用权贵和精英们，诸如**周扬、林默涵、刘白羽、邵荃麟、齐燕铭、夏衍、陈荒煤**，等等，大都是中共党和毛泽东的功臣。他们在他们领导下的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各个领域里，按照毛泽东的规定，制作和出版了大量歌颂党、毛泽东和社会主义、讴歌工农兵形象的作品。他们还按照毛泽东的决定，把**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的文艺思想，打成反革命思想，**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等著名作家也纷纷落井下石，最终把胡风送进监狱，判无期徒刑。可以这么说，他们为推行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阐明的文艺方针和政策、批判一切与此相左的文艺思想，立下了汗马大功。(右图：毛泽东与文学界的功臣们)

大跃进失败后，文学艺术界的御用权贵和精英们，也进行了反思。反思中，他们渐渐与毛的党内左派奴性教条疏远，向刘、邓的党内右派靠近，于是，产生了《文艺八条》。

《文艺八条》是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僵硬教条的缓释。

善于权谋的毛泽东并不认同《文艺八条》，他批准下发《文艺八条》只是缓兵之计；在《文艺八条》下达后不久，他已经察觉，以周扬为代表的文学艺术界的御用权贵和精英们，已经背离了他，成了刘、邓手下的党内右派“官僚主义者阶级”。因此，江青一出山，便踢开《文艺八条》，打着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旌麾，向以周扬为代表的文学艺术界党内右派集团兴师问罪。

附 1、“约法三章”

据传：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与江青的婚事，同意了毛泽东要同江青结婚的意愿；但同时对江青作出了限制性的规定：“江青只能以一个家庭主妇和事务助手的身份，负责照

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与健康，将不在党内机关担任职务，或干涉政治。”以后又出现了“约法三章”的多个版本。但史学家们认为，在多个版本中比较可信的是当年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的版本。王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对江的“约法三章”：

“第一，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

“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

“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附 2、马基雅维里主义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Niccolò Machiavelli）意大利佛罗伦萨人，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是《君主论》和《论李维》。

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里鼓吹君主制，他教导君主如何不择手段地获得权力，明确主张：“**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正确**”，只要目的实现，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保证事业成功才是君主头等大事。他认为“一个君主如果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不良的事情”。告诫君主们应具有像狮子般的勇猛和像狐狸一样的狡猾，不必重视遵守诺言，而且要懂得运用阴谋诡计，并且最终征服那些盲目守信的。他推崇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总是找到了上当受骗的货色。”

由于马基雅维里鼓吹的“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正确”的观点，亦即手段可以超越正常的道德规范约束或叫做“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观点，被后人称之为“政治恶魔”、“罪恶的导师”、“邪恶的教唆犯”、“吹捧暴君的无耻之徒”；他的《君主论》亦被称为“邪恶的圣经”、“马基雅维里主义”。马基雅维里主义和马基雅维里式的人物也成了阴险狡诈、厚颜无耻的同义语。

15-江青第一炮：批《有鬼无害论》

帖子由 于松然 » 2024 年 1 月 10 日

作者：于松然

江青出山后的第一炮，就轰向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



《李慧娘》剧照

《李慧娘》剧照.jpg (9.59 KiB) 被浏览 884 次

《有鬼无害论》是《北京晚报》编辑在得知廖看了昆剧《李慧娘》后，电话约他写的一篇剧评。1961年8月31日，《北京晚报》刊出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一文，署名“繁星”。

1961年夏天，由江青同乡好友孟起改编的昆剧《李慧娘》在北京上演（右图）。戏中描写李慧娘死后报仇并援救裴舜卿的故事：李与太学生裴舜卿的相爱为贾似道所忌，终为贾杀害。《李慧娘》揭露了南宋末年奸臣贾似道的荒淫残暴，歌颂了被贾杀死的李慧娘化成厉鬼也要与仇人拼到底的死而不已的斗争精神，是一出富有人民性的好戏，因而受到了好评。廖在《有鬼无害论》一文中写道：“我们对文学遗产所要继承的，当然不是它的迷信思想，而是它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我们要查问的，不是李慧娘是人是鬼，而是她代表谁和反抗谁。用一句孩子们看戏通常所要问的话：她是个好鬼，还是个坏鬼。如果是个好鬼，能鼓舞人们的斗志，在戏台上多出现几次，那又有什么妨害呢？”这与毛泽东对他侄孙女王海容说的“《聊斋》可以读，写得好。《聊斋》写的那些狐狸精可善良啦！帮助人可主动啦！”有什么区别？

区别有。区别的关键是：昆剧《李慧娘》是文学艺术界的御用权贵和精英们力荐的大作，《有鬼无害论》作者则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手下的一员大将，他们都是毛泽东正在设法清除的人。矛头所向，显然是毛、江床上早已议定了的。一九六二年冬，刚刚“批判”了“反党小说”《刘志丹》的康生，听说江青要批鬼戏，原本说《李慧娘》“不出鬼魂就不看”的他，旋即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狠狠批评中宣部、文化部“右倾”，要追查“鬼戏泛滥”的责任，迫使文化部党组向中共宣传部写了《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并点了《有鬼无害论》的名。1963年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自此，全国各地，不论城乡，“鬼戏”一律禁止演出。

江青看了这份报告不太满意，说道：“点了‘有鬼无害论’，为什么不点出文章作者‘繁星’？不点‘繁星’的真名实姓廖沫沙？”江青觉得不解气，认为文化部党组的报告不过是“官样文章”，她要“冲破封锁”。人们已从江青“不满意”和“不解气”中，看到了她背后的身影及其清除异己的政治计谋。于是，一篇点名批判孟超剧本《李慧娘》和廖沫沙剧评《有鬼无害论》署名梁壁辉的文章《“有鬼无害”论》，便在1963年5月6日上海《文汇报》上发表。“梁壁辉”为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俞铭璜也。

原来，江青没有批“有鬼无害”的文才，她便跑到上海求助于提倡“大演十三年”的中

共第八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此时正欲更上一层楼的柯庆施，欣然领命，便找来了由“苏中才子”之称的华东局宣传部长俞铭璜。据柯庆施死后的继任者陈丕显回忆：“对俞铭璜同志，我在战争年代就和他很熟悉。他长期在我任区党委书记的苏中根据地负责宣传工作，是江苏有名的‘秀才’。据我所知，他对批‘有鬼无害’是有顾忌的。毛主席曾提倡过写些‘不怕鬼’的故事，而《有鬼无害论》这篇文章又是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同志写的，所以这篇批判文章很难写。无奈，这是柯庆施直接压下来的‘政治任务’，俞铭璜只好关起门来搜肠刮肚。这种心境下写出的文章自然难以令柯庆施满意，于是柯又让张春桥大加修改后才发表。因此文章见报时署名‘梁璧辉’——取‘两笔挥’之谐音，意即两人合写。”当年上海《文汇报》文艺部主任唐振常，得知这篇稿子“来头不小”，便“奉命照登”。这就是数年后江青所说的“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的内幕。

《“有鬼无害”论》炮制出笼，预示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

《“有鬼无害”论》像颗重磅炸弹，把文化部炸得晕头转向，并使刘、邓得力干将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倍感紧张。廖沫沙的文章连同剧本《李慧娘》一起受到了围剿和批判。据说，有人作过统计，在半年的时间里，在中央和省市主要报刊上，批判孟超改编的昆剧《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不下 500 篇。

在康生和江青的压力下，中宣部主管文艺界的领导周扬、林默涵等人，采用“舍车保帅”的策略，先抛出“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文学家邵荃麟当活靶，批判他的“中间人物论”。但江青和康生不买他们的账。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江、康在全国上下，展开了对文学艺术界的全面清剿。

电影《北国江南》、《林家铺子》、《早春二月》、《不夜城》、《舞台姐妹》、《桃花扇》、《阿诗玛》、《逆风千里》等，以及田汉的京剧《谢瑶环》受到了批判；马烽的《三年早知道》，西戎的《赖大嫂》，张庆田的《“老坚决”外传》和《对手》，刘澍德的《老牛筋》，欧阳山的《在软席卧车里》，舒群的《在厂史以外》，菡子的《父子》，陈翔鹤的《广陵散》等短篇小说，也先后受到了批判；刘澍德的《归家》，汉水的《勇往直前》，欧阳山的《三家巷》、《苦斗》，羽山和徐昌霖的《东风化雨》等中、长篇小说，以及黄秋耘的杂文《破水瓢的启示》和《人尽其才》，孟超的《剧苑管窥录》，等等，也没有逃脱被批判的命运；其中，有的被批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

到了 1965 年，中国的报纸刊物，更充满着火药味儿：

一月，《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开始批判历史小说《柳宗元被贬》。柳宗元“被贬”，被“索隐”为彭德怀“被贬”。《文艺报》开始批判康濯的短篇小说《代理人》和长篇小说《水滴石穿》。

二月，《电影文学》批判“一部散发着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思想毒素”的电影剧本《亲人》。《文艺报》则批判陈翔鹤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

三月，《人民日报》发表齐向群的《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的文章。此时的《李慧娘》被定性为“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张春桥更认为是“借厉鬼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

五月，《光明日报》发表《夏衍同志改编的影片〈林家铺子〉必须批判》。

六月，《工人日报》发表《〈不夜城〉必须彻底批判》。

被批判为“大毒草”和“有严重错误”的影片，到了文革，已攀升到四百部（1）以上。

就在这样的“必须批判”、“彻底批判”声浪之中，中共中央在四月七日作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免去了齐燕铭、夏衍在文化部的领导职务，砍掉了周扬的左右手。电影界开始批判所谓“夏陈路线”，亦即“夏衍、陈荒煤路线”。

在这样的“必须批判”、“彻底批判”声浪之中，毛泽东在春节谈话中又对文艺工作者作了更加严厉的命令：“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分期分批下放到农村、工厂……你下不去就不开饭，下去就开饭。”在“便于领导”的高度国有化和集体化了的中国，“吃饭权”这个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权，已牢牢地掌握在雇主毛泽东和他的党臣手中。“吃饭权”原则也从“不劳动不得食”发展为“不服从不得食”——这个在任何社会里，他们的帝王或总统都无法办到的事，在社会主义中国，通过掠夺而垄断了全国全部资源成了唯一雇主毛泽东，他办到了！

其时的毛泽东，已经不是七年前的毛泽东。七年前，1957年3月8日，他同文艺界代表谈话时说：“解决思想问题，不能用专制、武断、压制的办法，要人服，就要说服，而不能压服。”

此时的文学艺术部门，已经是“洪洞县里无好人”。文化部大改组后，一位新上任文化部主持工作的“新文化部”第一副部长肖望东，在起草的一份正式文件中说，要对文化部门“犁庭扫院”、“彻底清洗”。如果这个文件起草在1957年6月，他铁定是一个极右的右派分子，然而，紧跟毛泽东的“为政治服务”，却使他飞黄腾达，成了革命左派。真乃此一时，彼一时也。

然而，“新文化部”的命运并不比“老文化部”好。1967年1月19日，随同全国夺权的浪潮，造反派宣布夺取了“新文化部”的领导权，领导干部全部靠边站。3月，戚本禹到文化部当众宣布，由金敬迈(笔者：小说《欧阳海之歌》的作者)负责文化部的工作。这个成立不到两年的“新文化部”，就在这种不明不白中宣告结束，它的主人代理部长肖望东将军，也被打倒，关押北京西郊监狱达9年，故人称其为“短命部长”。

附1、《毒草及有严重错误影片四百部》，

其中有：《清宫秘史》等故事片200部，《万象更新》等新闻记录片30部，《桂林山水》等科教片30部，《大闹天宫》等美术片20部，《马路天使》等三十年代与香港影片20部，包括前苏联在内等外国翻译故事片100部。

16-江青第二炮：批《海瑞罢官》

帖子由 于松然 » 2024年1月10日

作者：于松然

就在“必须批判”、“彻底批判”声浪之中，江青在1965年11月10日的上海《文汇报》上，向刘、邓右派集团投出了第二颗重磅炸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下图)。署名作者是浑号叫“棍子”的姚文元。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jpg

据江青说，早在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她看了北京京剧团演出的《海瑞罢官》之后，就认定这是一株“大毒草”。一个多月以后，她在和中宣部、文化部四个正副部长谈话时，提出了批判《海瑞罢官》。无奈，部长们充耳不闻，这使她极为生气。

为什么“中宣部、文化部四个正副部长”对她的话“充耳不闻”呢？其一是，她当时仅是中宣部下属一个文艺处的副处长；其二，四位都知道，毛泽东对她的评价：“江青不会做什么工作，你们也不要任用她”；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对《海瑞罢官》持肯定态度。

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陈丕显，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海瑞罢官》这出戏成于北京，却是源于上海。1959年4月，中央在上海召开工作会议。作为会议的东道主，我们自然安排了一些文艺活动，白天开会，晚上看戏。毛主席是湖南人，爱看湖南戏。一天，他看了湘剧《生死牌》，戏中海瑞这个人物引起了他的兴趣。第二天，他专门打电话要我们为他找来《明史》，仔细阅读了其中的《海瑞传》。

“针对当时干部不敢讲真话的问题，为了纠正‘高指标’等‘左’倾问题，毛主席有感而发，在工作会上盛赞海瑞，号召大家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学习海瑞精神，敢于批评嘉靖皇帝。毛主席说：明朝皇帝对下臣严酷，不少大臣被廷杖致死，但还是堵塞不了言路。对嘉靖皇帝忠心耿耿的海瑞，为了大明江山，不惜冒着杀头的危险上疏批评皇帝。海瑞对嘉靖皇帝骂得很厉害，骂嘉靖是‘家家(‘嘉’谐音)皆净(‘靖’谐音)’。他要大家习海瑞刚正不阿、敢于批评的品格，并提出了著名的‘五不怕’精神，即‘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毛主席指示中央主管宣传的胡乔木同志要‘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从什么角度，用什么方法做宣传工作。’”

毛主席的话给大家很大的鼓舞和教育，讲话精神一传出，各地争先恐后演出海瑞戏。光上海，周信芳就上演了《海瑞上疏》、《海瑞背纤》。胡乔木约了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

吴晗写文章，吴晗欣然同意，他很快写出了《海瑞骂皇帝》一文，用刘勉之的笔名，发表在1959年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



主演海瑞的马连良

主演海瑞的马连良.jpg (13.75 KiB) 被浏览 890 次

陈丕显继续写道：

“1961年剧本发表并正式上演时，定名为《海瑞罢官》。这出戏正式演出后，毛主席很高兴，并在家请主演海瑞的马连良吃了饭，对他的演出大加赞扬(右图)，毛主席说：‘戏好！海瑞是好人。’马连良十分感动，回来告诉吴晗说：‘毛主席真伟大，礼贤下士，接近群众。’吴晗听了自然是喜出望外。能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赞扬，说明这出戏是成功的，吴晗也感到无比欣喜。”

如此说来，江青忤逆毛泽东了吗？否！恰恰相反，忤逆毛泽东的却是吴晗、周信芳、马连良等为代表的广大知识分子。这些尊贵令人向往的高级学者和艺术家们，竟然都是健忘的蠢人：刚刚过去四年，他们竟然忘记了1957年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引蛇出洞”的“阳谋”，忘记了毛泽东在历史上曾多表演过的“理无常是”的“一分为二”哲学。

从历史上看，毛泽东是个政治意志坚定的人；但为了实现他的某个政治目的，又是一个不择手段出尔反尔的马基雅维里主义者。例如：

1945年9月，毛泽东在书面答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提问的“中共对‘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概念及解说为何”时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通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又说：“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还是国家民主化。”但到1949年10月夺得权力后，他彻底推翻了“无记名的选举”、“国家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承诺。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

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是……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但到 1957 年 7 月 7 日，他在回答罗稷南向他提的“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时，他不加思索地说：“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毛泽东经常告诫党员干部说：“要团结，不要分裂。”但在 1964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因两人发生争论，毛泽东怒骂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两年后，果真把刘打倒了。

毛泽东在不同场合曾多次说过：“要讲真话。”“要实事求是。”但在 1959 年 7 月 23 日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里写道：“我们这个队伍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但在 1957 年的莫斯科演讲中，毛泽东说：“（原子弹打下来）无非是死几个人，即使死一半，还有一半继续革命。”

毛泽东在 1963 年 3 月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但到 1964 年 12 月，在中央工作座谈会上，毛泽东说：“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

人们都知道：

毛泽东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闻者足戒”的民主作风倡导者；

毛泽东是“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的“三不主义”方针的提出者；

毛泽东是王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极左政策多次抨击者；

毛泽东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即“团结——批评——团结”公式的发明者；

毛泽东是：“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民主政治论述者。

.....

话说得多么动听、多么感人啊！

但做的呢？远的延安“抢救”不说，翻开“建国”后的历史看看，在他当权的二十七年中，从镇反开始，到土改、三反五反、“一化三改造”、反高饶、反胡风、肃反、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拔白旗、反彭、民主补课、“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在他的打棍子、扣帽子、抓辫子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下，多少人被整、被斗？多少人自杀、被杀？多少个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保守估计，被枪杀、自杀、饿死者，不下五千万！

例子太多，不胜枚举。总之，毛泽东**诡谲狡诈，言而无信**。

《荀子·大略》云：“**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毛泽东真乃一国妖也。

当时文化部负责人林默涵写道：“毛主席曾对乔木说过，江青不会做什么工作，你们也不要**用她**。但是，后来主席改变看法了，曾对周扬说，江青看问题很尖锐。”

“主席改变看法了”是因为毛泽东的政治任务变了：现在要倒刘整邓，就要首先清除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清除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就要先拿彭真手下的大将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所写的《海瑞罢官》开刀。于是，他改变了称赞《海瑞罢官》的态度。

为了完成毛泽东交给的这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江青到上海得到了柯庆施的支持。柯将任务交给了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张找来了时任上海《解放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的“棍子”姚文元。在柯庆施去世之后，以江青为帅、张春桥为军师、姚文元为“笔杆子”的三人组合，上瞒中宣部、中央政治局，下瞒上海市委、华东局，秘密炮制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经过八个多月的十多次修改，署名姚文元（实际应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人）的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终于在**1965年11月10日**，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陡然在全国卷起一阵狂澜，开始了围歼北京市委的外围战。

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时，“吹”出了她去上海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阴暗内幕。她说：

“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扼杀这篇文章了。”

这显然是非组织的阴谋活动。在“中共伦理共识”的词典里，凡毛泽东暗中搞的活动，都叫光明正大，别人这么搞就是阴谋。例如，在庐山会议上，彭、黄、张、周仅仅看法相近，分别交换过意见，便被视作阴谋分裂活动，终被打成反党集团。

1965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发表谈话，改变了要“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支持姚文元。毛泽东说姚文元的文章很好，但“**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泽东的表态，使批判更加火爆，吴晗和北京市委成了众矢之的。到了文革，主演海瑞的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终遭迫害致死；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被捕入狱后，头发被拔光，不堪凌辱而自杀殒命。



吴晗.JPG (6.13 KiB) 被浏览 890 次

17-毛泽东的憎恶知识分子情结

帖子由 于松然 » 2024 年 1 月 10 日

作者于松然

有人认为，毛泽东对文化艺术界知识分子有偏见。其实，何止文化艺术界？翻开他的历史看看，可以这么说，他对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存在着很大的偏见，甚至敌视，存在着挥之不去的**憎恶知识分子情结**。

当提出毛泽东有憎恶知识分子情结时，权贵和御用精英们就会加以反驳。例如：

毛泽东曾说过：“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又说：“当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迅速向前发展的时候，我们需要大批的知识分子来领导，需要大批的精练的先锋队来开辟道路”。“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阶级和基础力量。”还说：“我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对于知识分子觉得特别宝贵。……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据此，权贵和御用精英们便著书说：“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的奠基者和倡导者。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感召和激励广大知识分子，以饱满的爱国主义热情积极投身于革命和建设的洪流之中，充分发挥聪明和才智，作出无愧于时代的历史性贡献。”“毛泽东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每个重大关头，都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

毛泽东说：“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单靠老粗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据此，权贵和御用精英们便著书论证说：“在高科技领域取得“两弹一星”的辉煌成果，证明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从理论到实践均获得巨大成功。”

不过，权贵和御用精英们也承认：“令人惋惜的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左”的错误，其中，包括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对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严重损失。”但对造成“‘左’的错误”的原因，他们往往归结为毛的错误被林彪、江青、康生等野心家所利用，着意回避体制和毛个人品质上的原因。

在中共党内，权贵和御用精英们本身大都是知识分子，但对知识分子也存在轻视和偏见。例如，毛泽东的秘书被称为党内理论家的胡乔木也说：“在革命战争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中国农民的直接贡献确实比知识分子大得多，大多数知识分子当时被认为是站在资产阶级和地主方面。”当周恩来等人提出给知识分子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时，时任中共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文革中遭批斗、打倒）说：“**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变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不能摘。**”他们甚至还把中共革命过程中的一些失利，都归罪到知识分子身上。

中国有句谚语叫“**听其言，观其行。**”人们从毛泽东五十多年革命史中，又悟出了一条经验：**要搞清毛私下说的、具体做的，不可轻信毛书里写的、公开讲的。**

人们在聆听毛泽东“**要尊重知识分子**”的教诲时会发现，毛泽东做的与他说的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完全相反。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来棣研究员在《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政策》书中披露，上世纪二十年代，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把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看作“**半反革命**”和“**极端的反革命派**”，统称为“**反动派知识阶级**”。但为了掩人耳目，“1951年毛泽东将此文收入《毛选》时，却把将近原文一半的篇幅尽数删去，他所删去的是敌视知识分子的观点。”

毛泽东敌视知识分子是有“理论”根据的，这个根据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创造世界**”说。从广义上来说，包涵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劳动创造世界”说，没有什么错；但当马列毛主义者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割裂并对立起来时，以知识分子为主构成的白领管理层、决策层和文、教、卫阶层，都成了与工农兵劳动阶级相对立的剥削阶级（或曰准剥削阶级），因而成了工农兵阶级的敌人和革命对象（或曰准敌人和革命对象）。于是，只承认体力劳动是“劳动创造世界”主体的马列毛主义劳动说，便成了改造、镇压知识分子的“理论”根据。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知识分子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工农兵要领导学校”和“工农兵要占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等系列“最高指示”，便应劫而生，“理直气壮”地风行全国一二十年。

1942年，中共中央研究院任特别研究员的王实味，初到延安不知就里，天真地响应中共“向党组织和各级领导人提意见”的号召，写了几篇《野百合花》等杂文，批评了中共干部生活待遇上“**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在延安整风中，王的批评被毛发现，旋以“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罪名遭批斗、逮捕。1947年7月1日凌晨，王终被砍头残杀于枯井中，造成了中共有记载以来的第一个文字狱：“王实味冤案”。然而，在平反“王实味冤案”时，权贵和御用精英们，却把制造这起冤案的罪责扣到执行者康生的头上，有意放过主谋毛泽东和刽子手贺龙。据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回忆，除“王实味冤案”外，整风、“抢救”运动中，“**延安80%的知识分子上台‘坦白’，被‘抢救’成特务，结果这些人中，一个特务也没有。**”毛泽东“延安抢救”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残酷批斗，是继“打土豪，分田地”后，又一次对真、善、美中国传统文化的颠覆。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知识分子是敌对势力，不能改造，就应打倒。1951年5月，他发动的批判电影“武训传”，拉开了“改造”知识分子运动的序幕。

《武训传》是部描写清末贫苦农民武训用磕头讨钱的方式兴办学校的故事影片。作者有意告诫主政者，富民强国当以教育为先。这对急于搞无产阶级专政的毛泽东来说，不啻是个“严重的挑战”。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批判文章，号召“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他认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因为它“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承认或者容忍对武训的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是向“反动思想投降”，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接着，他用他的权力和他惯用的无限上纲式的批判手段，把评价电影《武训传》的所谓“讨论”，变成了一场政治批判运动。在以枪杆子为后盾的“讨论”运动中，电影《武训传》的编导、主要演员和48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及其作者，都遭到了无情批判。毛泽东批《武训传》的胜利，实质上开始了以阶级斗争即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代表的西式**马列独裁文化的赤化革命**。这个赤化革命，是以批判、丑化、最后颠覆以真、善、美为代表的儒释道文化和以自由、民主和人权为代表的普世文化为目的的。

批判《武训传》的硝烟未散，毛泽东又发动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1951年10月23日，他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说：“**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一方面他公开说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所谓的“思想改造运动”，另一方面他又发出内部文件，通知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在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开展“思想改造工作”，要他们“**忠诚老实交清历史**”，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使全国学校完全被党掌控。这种外称“**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的“思想改造”而内行“**清理反革命**”两面作法，被毛泽东称为“**内外有别**”。这是中共以谎言为主旨的**赤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于是，全国各地学校开展了大规模的清查反革命为目的的“**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运动”。

在“脱胎换骨”中，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在高压下，都纷纷批判、丑化自己，一个接一个地“脱”掉了个人尊严、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铮“胎”**，“换”成了阿谀争宠的**媚“骨”**和逆来顺受的**软“骨”**。例如，曾在20世纪30年代主持建造杭州钱塘江大桥而闻名于世的著名桥梁专家、铁道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茅以升**，往自己脸上泼粪说：“我于1920年初返国，自此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对于反动统治下的所谓建设，但求能参加促成，而不惜阿附其权势”。他甚至根据马列毛“劳动创造世界”说，给自己戴上了个“剥削者”的帽子。他说：“这种剥削手段，最集中地表现在钱塘江桥工程上，那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我因此而得名。”著名物理学家、清华大学教务长**周培源**，曾在美国参加过军事科学研究，在“脱胎换骨”时咒骂自己说，他在美国从事研究“是我一生历史上最可耻的一页”，“我要控诉我自己，控诉我这个丧失人民立场，甘心为美国刽子手作帮凶的所谓科学工作者。”著名建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发表文章斥责自己说：“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罗常培**，发文质问自己：“我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为谁服务？”著名文学史家、北京大学教授**游国恩**发文坦白：“我在解放前走的是怎样一条道路。”《黄河大合唱》歌词作者、中央戏剧学院教育长**光未然**，发文则要求自己，要“正视自己的错误。”等等。

1955年，毛泽东一手制造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曾被中共认作是反对国民党的“党外进步作家”胡风，自作多情地向中共提出了洋洋30万言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阐明自己的文艺观点，希望中共能采纳他的意见。由于《报告》里有些观点如“主观战斗精神”等，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观点相左，毛泽东看后勃然大怒，

遂脱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闻者足戒”的伪装，罗织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用他惯用的无限上纲置人于死地的抨击手段，在《人民日报》上杀气腾腾地写道：“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是以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反动军官、共产党的叛徒为骨干组成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胡风夫妇于 1955 年 5 月 17 日被捕，其他“胡风分子”也陆续锒铛入狱，冤案涉及作家等知识分子 2,100 多人。当年年轻幼稚的笔者（19 岁），不经意说路翎(胡风集团成员)的小说《洼地上的战役》写得不错而惨遭批斗。胡风被判无期徒刑，毛死后才被彻底平反。

为了驯服知识分子，使他们俯首帖耳，彻底趴下，1957 年，毛泽东运用“引蛇出洞”的“阳谋”，发动了整肃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

为了“引蛇出洞”，他设计了“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圈套，并在圈套上镶嵌了金色的光环。他像骗子那样，信誓旦旦地保证共产党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声称“双百方针”“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号召“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向共产党提批评意见。4 月 30 日，他甚至对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说：“大学里如果对党委制有意见，可以考虑取消；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以天下为己任”传统的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终于为毛泽东的“诚意”所感动，纷纷在鸣放座谈会上开怀畅言，“大鸣大放”，向共产党进言。《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指出“党天下”的弊端，交通部部长章伯钧提出“政治设计院”的构想……5 月 15 日，毛泽东突然变脸，写了一篇供党内干部阅读的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把“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赞成民主”的人，统统称为“右派”。6 月 8 日，他用“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在全国开展了所谓的“反右派斗争”。全国有 55 万在“大鸣大放”中直言敢谏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近百万人被内定为中右和异己分子，数十万有不满言论的工人、农民被打成坏分子，数万人在运动中被打死、自杀，或在劳改中死亡，数不清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一千多万人受株连。笔者时在长沙高级工程兵学校（今国防科大）战术系任炮兵教员，五十多人被打成右派，两人自杀，数十人被结论为“中右”、“阶级异己分子”，记录在档案中，发配到北大荒劳动。笔者为后者其中之一。

反右中，有人指责毛借整风之名来反右是阴谋，毛泽东对答说：“这是阳谋。”有人指责毛是“秦始皇”，毛泽东对答说：“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一年后的 4 月 6 日，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有声有色地说：“蛇不让他出来怎么能捉它？我们要叫那些王八蛋出来唱戏，在报纸上放屁，长长他们的志气。”“我们是一逼一捉，一斗一捉，城里捉，乡里斗，好办事。”前者是否画出了一个帝王独裁者嘴脸？后者是否又画出了个无赖痞子的丑态？请读者自断。

更令人惊讶的是，毛泽东彻底否定了他曾热情颂扬过的鲁迅。人们不会忘记，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得那些无法超高的赞美辞：“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是……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然而，到了他掌握最高权力之后，便不需鲁迅的硬骨和傲骨，更不需要知识分子的个人尊严、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他需要的是俯首帖耳的媚骨和逆来顺受的软骨。著名作家、演员黄宗英以当事人的身份，在《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一文中写道：

“1957年7月7日，忽传毛主席晚上要见我们。我们被领进一间不大的会场，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如果不是三十年代曾有恩于毛泽东，伟岸不群的大翻译家罗稷南敢这么问吗？**值得庆幸的是鲁迅，他只活了55岁。**如果能活到76岁以上，他可能是大右派“章伯均”，抑或是大媚骨“郭沫若”；假如再“聪明”些抑或幸运些，也许能关住门窗，与钱钟书一起，在故纸堆里游弋！

蔑视知识分子莫过于他对外国人说的那句话了。1967年5月，毛泽东同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谈话时说：“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此时，他已经推翻了他先前说的那样：知识分子“是这个专政的领导阶级和基础力量。”

18-毛泽东“书读得越多越蠢”论及其他

帖子由 于松然 » 2024年1月12日

作者 于松然

毛泽东的憎恶知识分子情结，也殃及教育界、卫生界和学术界。

毛泽东憎恶知识分子的“名言”是：“**书读得越多越蠢。**”

也许是国内革命战争经验和五十年代的教训，使毛泽东有“理由”认为：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工人、农民，容易蒙哄，因而“**便于领导**”，而知识分子往往有自己的想法，不愿盲目跟随，有些甚至向毛挑战，分庭抗礼，不“**便于领导**”。因此，他毫无遮掩地提出了“**书读得越多越蠢**”论，借以弹压知识分子；而这句“名言”也成了文革中驱赶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伏笔。在此期间，二战后与中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日本，在缺乏资源的情况下，用比中国多十数倍（GDP比例）的教育投入，去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为六、七十年代的腾飞打下了基础。

从1941年到196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始终同时任毛泽东秘书和中央政治局秘书被誉为“党内第一枝笔”的胡乔木著书说，毛泽东“他确实说过：**书读得越多越蠢。**”其实，不用胡乔木证明，翻翻文献，就能找出许多毛泽东说过的这类话：

1964年2月13日（农历正月初一）下午三点，他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召开的座谈会上说：“**我看书要读，读多了，害死人。**”

1964年3月28日，他在邯郸“四清”工作座谈会上插话说：“**知识分子其实是最没有**

知识的，现在他们认输了。教授不如学生，学生不如农民。”

1964年12月21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说：“像大学里那些书，越读越蠢。”

1965年1月3日，他在关于四清运动的一次讲话中说：“我对孩子讲，你读十几年书越读越蠢，什么也不懂。”

1965年1月5日下午，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的娃娃在那里搞四清，讲教授比助教差一点，助教比学生差一点。读书越多越蠢。”

.....

为了给“书读得越多越蠢”立论，毛泽东煞费苦心地找出了许多“证据”。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谈话时说：“历来的状元就很少有真正好学问的。唐朝第一流诗人李白、杜甫，都不是状元，既非进士，又非翰林。韩愈、杜牧、柳宗元是进士出身，但只能算是第二等的。王实甫、关汉卿、施耐庵、罗贯中、蒲松龄都不是状元、进士和翰林。曹雪芹、蒲松龄只是清朝的拔贡。凡是当了进士、翰林的都是不成功的。明朝的皇帝，搞得好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明太祖朱元璋，皇帝做得最好，他一字不识，是个文盲。一个是明成祖，皇帝也做得不错，是一个半文盲，识字也不多。但以后万历、嘉靖等都读了很多书，成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专政，反而不行，国家就管不好了。六朝的梁武帝，能文能武，能说会写，最后困死台城。宋徽宗能诗会画，字写得很好，做了俘虏。他们都是‘只专不红’，亡了国。可见书念多了要害死人。刘秀是个大学士，比较蹩脚。刘邦是个草包，也没有什么文化。我看书要读，读多了，害死人。”

当日毛泽东又说：“高尔基只读过二年小学，学问完全是自学。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卖报出身，发明了电，瓦特是工人，发明了蒸汽机。在古今中外许多科学家都是在实践中自修成的。”

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的插话：“可不要看不起老粗。全国人代会开会时，我的一个同学xxx(笔者：转引的原文如此——下同)，现任湖南省副省长，他要跟我谈一谈。他说，现在了解到了，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没有知识的。历史上当皇帝的，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成吉思汗，是一个不识字的老粗。刘邦，也不认识几个字，是老粗。朱元璋也不认识字，是个放牛的。我们军队内，也是老粗多，知识分子少。许世友念过几天书！xxx没有念过书，韩先楚、陈锡联也没有念过书，xx念过高小，刘亚楼也是念过高小。当然，没有几个知识分子也不行。林彪、徐向前、xxx、xxx、……，我们算是中等知识分子。结论是老粗打败黄埔生。”

1965年6月26日，他在关于卫生工作的谈话中说：“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书读得越多越蠢。”

这是毛泽东“解剖麻雀”哲学：以少代多，以偏概全，以个别概括全局。

这是毛泽东偷换概念式造假：以“自学”“自修”等同于老粗，为“书读得越多越蠢”立论。

由于憎恶知识分子情结作祟，毛对各界知名人士横加指责，对学校教学秩序横加干涉，并鼓动学生造反。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谈话中说：“交头接耳、冒名顶替，过去不公开，现在让它公开。这无非是你会我不会，你写了我再抄一遍，也可以，抄会了也是一次学习。”

——这同“自学”“自修”一样，等于说学校可以停办。今日中国教育落后，投资奇少，居世界倒数前列，国民整体素质低下，不能不说这与毛泽东和他的继承人无视教育的思想有密切关联。

1964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周信芳（笔者：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一个月一千七百元工资，不演多少戏，还存钱在香港。有的青年演员就作‘十年计划’，要赶上周信芳。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按政策必要时可以收买。对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收买？钱多了一定要腐化自己，腐化一家人和周围的人。苏联的高薪阶层，先出在文艺界。”

——从“赎买”到“收买”，露出了毛泽东思想“诚实”的一面。但也有不够诚实的另一面。《党史博采》第9期《毛泽东私人财产》一文，披露了毛的存款和开销：毛曾用他自己的存款“犒赏”过一些知己。读后，人们有理由认为：他给1920年曾资助过他2万银元的章士钊10万元，叫“借钱还债”；他给斡旋十年、最终促成国民党前代总统李宗仁反蒋归顺的无党派人士程思远10万元，叫“犒劳功勋”；他前后给贴身“秘书”张玉凤15万元，叫“结情联谊”；他给“大总管”汪东兴4万元，叫“修膳房屋”；他先后给夫人江青38万元和2万美金，叫“亲情使然”；而他那笔相当于周信芳49年工资总和的百万元存款（文革中存款高达7,582万元），当然叫“正常收入”了。这对当时人均年收入不足150元的中国人来说，是个什么概念？笔者算了笔小帐：中国普通工农家庭，按一家四口平均年总收入600元计，挣汪东兴的4万元须67年，挣章士钊和程思远的10万须167年，挣张玉凤的15万元须250年，挣江青的38万元须633年，挣他毛泽东在文革前的存款须1,667年，挣他在文革中的存款（那是个天文数字）须12.64万年，而挣周信芳的年工资2.04万元，只须34年。青年演员想“要赶上周信芳”，何腐之有？

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上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是修正主义。”

——这是毛泽东的权力哲学：学术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就是复辟问题，甚至是人头落地问题。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1961年前为校长），不知天高地厚，竟敢以“伟大领袖”的“一分为二”观点进行逆向逻辑思惟，提出了“合二而一”的概念。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被发现后，遂被毛钦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受到了围攻和批判。1965年9月，杨被罢掉中央党校一切职务，逐出校门，文革中又遭残酷批斗，差点毙命，真是“罪”有应得。其实，“一分为二”即不神奇，也不新鲜，它源于春秋时代老子的“道生一，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据此，隋代杨上善在注《黄帝内经·太素·知针石》中，首次明确用了“一分为二”这个词，说“从道生一，谓之朴也，一分为二，谓天地也。”南宋朱熹又认为“一分为二，节节如此”。所不同的是，毛在“一分为二”中加进了“对立面的统一与斗争”，即列宁所说的“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并利用权力，把它打扮成唯一的绝对真理。其实，“合二而一”并不是“一分为二”的反叛，而是“一分为二”的补充和完善，也符合列宁的说教。“一分为二”突出对立面的“分”，强调其斗争性；“合二而一”突出对立面的“合”，强调其统一性。“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也可看作是事物分析与综合发展的表现形式。例如，化学中的分解与化合就是这种表现形式。在宏观宇宙中，一定区域内黑洞大爆炸是一种分裂，一定区域内收缩为黑洞则是一种组合，这是一生万物与万物归一现象的最典型的表现，也是分析与综合规律存在于自然历史中的根据。因此，作为认识事物方法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都有其存在的科学性、合理性，尽管“一分为二”在表达辩证法上不够准确。为什么这个明显的学术问题变成尖锐的政治问题呢？盖因事“圣君”者，有听从，无谏争也。毛泽东的理论是“顶峰”，凡人不可并列，岂可超越？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说：“哲学家们应当下乡去。今冬明春就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身体不好也去，下去也死不了人，无非是感冒，多穿几件衣服就行了。”又说：“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不行。书本里怎么能出哲学？”

——为了权力斗争，毛泽东竟发明了“下乡出哲学”和“阶级斗争出哲学”的荒谬理论。诚然，毛在农村搞了二十多年的阶级斗争，有丰富的权力斗争经验，在哲学上也有些许著作，如此而已。毛死后传出，毛的那两篇《实践论》和《矛盾论》哲学著作，出自于他的理论家秘书陈伯达和胡乔木之手。如果这个“传说”不足为信的话，我们还可从历史观点来反诘：古今中外的大哲人、大思想家，如中国孔、孟、老、庄等，外国的伯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和康德，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等，有几人产生于农业劳动？有几个是权力中心的帝王？历史毫不夸张地证明，大哲学家、大思想家，绝大多数出自于学识渊博、卓有成效的专家、学者和教授之中；毛的“下乡出哲学”和“阶级斗争出哲学”论，是权力哲学的演绎，是憎恶知识分子情结派生出来的谬种：既是迫害知识分子的政治手段，也是动员和“收买”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工农兵的政治招数。

1964年8月18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还下令：“文学大学生今冬明春都下去。理工科不动，动一些也可以。其他统统下去。所有学文科的、学历史的、学政治经济学的、学文学的、学法学的，统统都去。教授、助教、行政工作人员、学生统统下去，去五个月，有始有终。农村去五个月，工厂去五个月，得到点感性知识。马、牛、羊、鸡、犬、豕、稻、粱、菽、麦、黍、稷，都看一看。”

——这是毛泽东憎恶知识分子情结派生出来的又一个谬论。这无疑是要让学欧洲史的学生，从“马、牛、羊”身上找到文艺复兴时代的社会特征；让学文学的学生，从鸡鸣、狗叫和豕睡中去发掘真善美；让学语言学的学生，从“稻、粱、菽”的生长中去厘清“主谓宾定状补”；让学法学的学生，从“麦、黍、稷”的结实中学会逻辑与断案，……政治手段之可笑、可鄙、可恶，可谓世界之最！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在召见首都红代会红卫兵“五大领袖”时说：“学问才不是

靠学校里学来的。从前我在学校里是不守规矩的，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的。考试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为准。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又说：“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出来的吗？又没有作过工人、农民就学哲学，那么哲学叫作‘窄学’。学问不是学校里学出来的。”

——有人说毛泽东仇恨学校，仇恨教师，这话似有偏激，但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例如，毛曾大骂学校是“庙小神通大，池浅王八多！”为了他的“教育革命”，使中学停课三年，大学关闭七年，迫使适龄青、少年辍学上山下乡当农民。他的“教育革命”的目的是抑制多元、镇压自由、革掉知识分子的个人尊严、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于是，他利用红卫兵在“横扫”中，把数十万教师打成牛鬼蛇神，其中许多人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1964～1965年，毛泽东先后与表侄孙女王海容(文革后期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做了四次谈话，鼓励学生造学校的反。他说：

“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瞌睡。”

“什么制度不制度，管他那一套，就是不回去，你说：我就是破坏学校制度。”

“你怕人家说你破坏制度，又怕挨批评，又怕记过，又怕开除，又怕入不了党。有什么好怕的，最多就是开除。学校应该允许学生造反。回去带头造反！”

“搞五分累死人。不要学那么多东西，学多了要害死人。”

毛泽东棒打知识界，与把矛头指向在一线工作的刘、邓是一致的。因为，在毛泽东看来，知识分子是刘、邓党内右派集团的社会基础；为了向刘、邓夺权，先要打掉知识分子的清高和尊严。

19-毛泽东曾意图问鼎诺贝尔奖金

帖子由 于松然 » 2024年1月12日

作者 于松然

当毛泽东大力宣扬“**书读得越多越蠢**”，极力贬低专家、教授等知识分子时，千万不要以为他憎恶所有知识：他在贬低别人知识的同时，意在抬高自己的知识身价。培植知识上的个人崇拜，也是他棒打知识界和倒刘、整邓的重要谋略。他的言行都力图证明，他不仅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和诗人，而且自然科学上也有很深的造诣：为了树立他的“一分为二”哲学思想为中外绝对权威思想，他利用权力，雄心勃勃地率领中国一些科学家**问鼎诺贝尔奖金**。

物理学家王德奎在《中国层子模型四十年历程》中写道：“由于国际形势的需要，我国

1955 年开始酝酿生产核武技术。这年 1 月 15 日，在毛主席亲自召开研究我国原子能科学发展的会议上，毛主席问钱三强：‘质子、中子是由什么组成的？’钱三强回答说：‘这个问题还没有新的认识。’毛主席却说：‘我看不见得。质子、中子、电子还应该是可分的。从哲学的观点来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原子、中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半年后，美国第一次发现了反质子；一年后，又发现了反中子，证实了毛主席的预言。对此，钱三强等我国科学家还说，毛主席比我们这些搞专业的物理学家还行！”

受到当年中国一流科学家们“还行”的赞誉后，毛泽东在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刚刚恢复，便拨巨款邀请各国科学家来北京聚会，讨论他的“一分为二”和“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充满信心地向世界自然科学高端进军。



1964 年北京科学讨论会会场.jpg (9.37 KiB) 被浏览 1396 次

1964 年 8 月 21 日至 31 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的 44 个国家和地区的 367 名科学家云集中国首都，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右图)。开会期间，毛泽东亲自接见了参加会议的日本代表团团长坂田昌一，当面称赞说“你的文章写得好”，使坂田一下子成为中国科学家们心目中的耀眼明星。

坂田写了什么文章，令毛泽东称赞呢？

原来，在中学和大学时代曾研读过列宁和恩格斯著作、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日本科学家坂田昌一，对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的构成物质终极单元的“基本粒子”理念提出了挑战，构建了基本粒子不是物质微观结构最后一个层次的坂田模型。这个模型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毛泽东“物质无限可分”和“一分为二”的哲学观点，受到毛的注意。1961 年 4 月，坂田昌一又发表了《新基本粒子观对话》，再次极大地支持了毛的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本来对自然科学陌生又缺乏热情的毛泽东，因坂田昌一文章而倍受鼓舞，突发异想，决定拨重金在北京召开国际科学讨论会，使“一分为二”的哲学思想享誉世界，并创造条件问鼎诺奖。

“一分为二”已经成为今日中国人的口头禅。作为方法论，研究物质内部“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认识世界的重要方法之一，其科学性毋庸置疑。把“对立统一规律”归结为“一分为二”是借代，即不准确，也不严谨，易引歧义。例如，五彩缤纷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是多元的。拿“一分为二”来说，难道不能“一分为三”、“一分为四”即“一分为多”了吗？研究人们的思想，为什么不能分成左、中、右？研究数学，为什么不可以分成正数、负数和零数？如是，核子物理学中的电子、质子和中子，电子学中的正电、负电和绝缘体，等等。这些都是“一分为二”定义不准确、不严谨所引发出来的“一分为多”的歧义。任何思想，如果把他描绘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就会陷入“真理前进一步就是谬误”的困境。“一分为二”不能例外。毛泽东的“一分为二”，实际上是他把辩证法“对立面的

统一和斗争”与《庄子》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即物质无限可分思想进行无理组合。之所以叫无理组合，是因为，如果承认“物质无限可分”是真理，那么，就会产生二律悖反：与“物质无限可分”真理存在的同时，也应存在着一个与之相对立的“物质不能无限可分”的真理。这种对物质可分性理论的“一分为二”，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自我否定。在中国，毛泽东的“一分为二”已经把五彩缤纷的世界庸俗化简单化了，庸俗简单到就像小孩子看电影能分清好人、坏人就算绝顶聪明那样缺乏理性的“小儿科”。

8月24日，毛泽东召见参加科学讨论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物理学家周培源和经济学家于光远等人，就坂田文章约谈。他说：

“今天我找你们来就是想研究一下坂田的文章。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的。他们这样说，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

这是“立场决定论”！接着，毛泽东在科学家面前畅谈起自然科学来。

他从陨石说到阳光，说到人造卫星，说到冰川时期。他指出：“氢和氧化合成水要经过几百万年”，“人胎有一个发展阶段就象鱼”，“细胞有细胞核、细胞质和细胞膜”。他还指出：“使发电机的转子旋转，这是机械运动，最后在铜线沿线发出电来”。他论证说：“世界上一切都在变，物理学也在变，牛顿力学也在变，什么东西都是既守恒又不守恒”。他还论及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等等。他的结论是：“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以分，原子核可以分，基本粒子也可以分。”

在毛泽东面前毕恭毕敬的科学家们，对“伟大领袖”这种科普性的说教和感觉哲学，竟谄为“科学知识渊博”，“见解精辟”，并佩服得五体投地。

尽管“伟大领袖”“科学知识渊博”，“见解精辟”，但科学讨论会并没有达到会议主人期望的目的。

“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家都能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我们呢？”1965年，中国社会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海瑞罢官》被批判，罗总长被罢黜，文化部被改组，科学家们安敢忘记“伟大领袖”的这条伟大批评中蕴涵的“殷切期望”？

于是，在这一年，在国家财政巨额拨款的支持下，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单位，组成了由朱洪元、何祚庥等39名学者参加的合作组进行攻关。合作组不辱使命，他们很快用毛泽东“一分为二”和“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创立了与美国科学家盖尔曼“夸克模型”相对抗的“层子模型”，向世界最高物理奖——诺贝尔奖金发起冲刺。据“层子模型”参与者回忆，当时的学术带头人认为，“最重要的事乃是确定基本粒子内部是否有结构，是否符合‘一分为二’的思想，因而把主要精力用来求强子的波函数。”（笔者：遗憾的是他没有指出带头人是哪位科学家）在短短九个月里，层子学者们以“大跃进”的速度发表了四五十篇论证层子存在的论文。有些论文还指出，“‘夸克模型’有数学唯心主义错误，而层子是真实存在的亚强子粒子，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另据传说，“层子模型”不仅证明了层子存在，“层子也是无限可分的”，而且也证明了层子下面有“亚层子”，“亚层子”下面有“无子”，“无子”下面有“前子”，“前子”下面有“毛子”，等等。所谓“无子”即无产阶级子，“前子”即前进子，“毛子”即

毛泽东子。如果这个传说是真的话，应当说，每个“子”都闪烁着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光辉。毛泽东和层子学者们，满怀信心地认为，“层子模型”比“夸克模型”更有条件、更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金。

令人遗憾的是，“层子模型”在国外受到冷遇，甚至被称为伪科学，连获得过诺贝尔奖金的华裔科学家丁肇中、杨振宁和李政道等人，都有意回避推荐“层子模型”问诺。“层子模型”虽在国际上冲刺诺奖失利，但在国内，却获得了巨大成功：先后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和“国家自然科学奖”，“层子模型”的积极创建者**朱洪元**、**何祚庥**等多人，都获得了巨额奖金。这有力证明了毛泽东“一分为二”和“物质无限可分”思想的“伟大、光荣、正确！”

在“层子模型”耀眼光环笼罩下，中国科技大学才华横溢的物理学家**刘耀阳**，与诺贝尔奖金擦肩而过。

物理学家刘耀阳，以坚持物质“不是无限可分”的观点被选入 39 人合作组，如同持不同政见的王明被选入中共中央委员会那样，成了合作组里的唯一异议派。据《科技日报》报导，年轻教师刘耀阳，在 1964 年，在研究物质“不是无限可分”上，创立了带“色”夸克模型，取得了与美国科学家盖尔曼“夸克模型”相似的成果，发表了他的《一个可能的基本粒子模型》论文。由于他的观点与“层子模型”相左，他的论文只能象征性地作为对“物质无限可分说”的争鸣，摘要发表在国内一份刊物的末尾。对此，刘耀阳教授回忆说：1966 年暑期，“当年有一个重要的北京科学讨论会(笔者：有 33 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多人参加)，完全可以想象得出，有的人一心要在这次会上利用层子模型宣传毛泽东思想。我被拒之门外，会议上当然也不会提到我的工作。这事充分反映出(我的)文章的遭遇。”

毛泽东死后，有人发现，1969 年获诺贝尔奖金的盖尔曼，他的夸克模型有“抄袭”、“仿造”刘耀阳科研成果之嫌，因刘耀阳的科研成果比盖尔曼得奖的成果要早。但也有人认为：如果说盖尔曼“抄袭”、“仿造”了刘耀阳的科研成果，那是天大的冤枉，因为，当时的盖尔曼只知中国有一个令他不屑一顾的层子论，根本不知道中国还有个研究带“色”夸克的刘耀阳，更没有听说过刘耀阳的那篇被“摘要”发表过的论文。

总之，在毛泽东督导监制的“层子模型”向诺奖冲刺中，刘耀阳与诺贝尔奖金擦肩而过的可能性很大。这或许是刘教授的终生遗憾，因而也或许是中国永远的遗憾！

这是谁人之过？

笔者只好借用“层子模型”的得奖人、当代中国大出风头的科学院院士、物理学家兼哲学家、北大教授**何祚庥**（下图）的“旷世名言”来回答：



何祚麻院士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说：“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jpg (15.42 KiB) 被浏览 1396 次

何祚麻院士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说：“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

20-毛泽东和学雷锋运动

帖子由 于松然 » 2024 年 1 月 14 日

作者 于松然

（引子：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被迫退居二线；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采取的调整举措，在党内外颇得人心，赢得了不少政治资本，声望与日俱增，大有架空毛泽东或取而代之之势。迷恋权力的毛泽东，对大权旁落极为敏感，3,000~4,500 万的饿殍、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鞭尸的阴影，还紧紧困扰着他，又使他处于极度恐惧和痛苦之中。

对此，他发过牢骚。在 1964 年 11 月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在小范围的会议上发火说：“还是少奇挂帅，……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不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

为此，他还骂过娘。在 1964 年 12 月 26 日他 71 岁生日那天，他难得的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设下宴席，请中央领导和一些劳模出席。事先，他就准备在这个宴会上给刘少奇等一个突然袭击。他对其女儿说：“你今天不能去，爸爸我要骂娘。”果然在宴会上，他严厉斥责中央领导同志，让与会者个个如坐针毡。1964 年末，他又当着其它领导人的面，训斥刘少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对于毛“骂娘”，林彪在日记这样记载：“毛喝了一瓶白沙液，翻来覆去问：‘中央有人要抢班夺权，怎么办？要搞修正主义，怎么办？’又问：‘军队不会跟着搞修正主义吧！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书记处都要排斥姓毛的。毛还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要逼我造反，我就造个天翻地乱。’”

毛泽东不愧是天才的权谋家，牢骚、骂娘不过是巧妙示弱，是麻痹对手的手段；为了把权力从刘、邓为首的党内右派集团手中夺回来，他必须树立他的绝对权威。权力拜物教的权

力情结，使他本能地意识到，利用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去培植对他的个人崇拜（或称个人迷信），是树立绝对权力的最佳途径。为了自我塑造绝对权威“人皇大帝”形象，在“骂娘”前，他一口气捏出了五个大金刚，亦即**学雷锋、学大庆、学大寨、学解放军和学《毛主席语录》**。**五大金刚**的出现，凸现他做为绝对权威“人皇大帝”的伟大、光荣、正确。由此，他开始了颠覆“**民为贵，君为轻**”和“**仁义礼智信**”等传统价值观的革命进程。1970年12月18日，他对美国记者斯诺承认，五大金刚是造神，目的是夺权。他说：“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以下为正文：

“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于是，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发起和推动了全国轰轰烈烈的**学雷锋运动**。

对于雷锋，中国人大都不陌生。他小学毕业后便参加工作。工作期间，曾1次被评为机关模范工作者，3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5次被评为标兵，18次被评为红旗手，并荣获“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光荣称号。1959年12月被破例批准入伍。雷锋入伍后，被编入工程兵某部运输连四班当汽车兵。在部队的32个月里，他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2次，被评为节约标兵，荣获“模范共青团员”，出席了沈阳部队共青团代表会议。1962年8月15日，他因事故不幸殉职。

在部队里，由于他表现突出，沈阳军区《前线报》开辟了“向雷锋学习”的专栏。据报导，1960年，他曾给辽阳灾区捐款100元救灾，给驻地附近的和平人民公社捐款100元……1960年6月×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因公外出，我在沈阳车站，看见了一个老太太，在汽车旁焦急地徘徊着，像是有什么困难。我上前询问，一看证明，原来这位老太太是从山东来部队找她儿子，路费用光了。我了解清楚后，立即请她老人家吃了饭，并给她买好到她儿子驻地的车票。本月8日，这位老太太的儿子，给我们部队首长写来了一封感谢信。”又据“雷锋帮老大娘找儿子”照片的拍摄者，在40年后所写的《我给雷锋拍照片的故事》一文中回忆：



抓拍雷锋做好事照

“1961年2月初的一天，我陪同雷锋到丹东工程兵某部作忆苦报告，回来在沈阳换车时，见一位老大娘拿着许多东西，走路很吃力，便跑上去帮助拿，扶她上了火车，找到座位。老人担心找不到在抚顺的儿子家，雷锋一听是同路，便安慰说：‘您放心，到抚顺后我帮您去找。’到了部队驻地瓢儿屯站，我们没下车，而是去了抚顺南站，把背包寄存之后，陪老大娘去找儿子。老大娘初来抚顺，不知儿子在哪儿。我们只好按照信上的地址，四处询问，终于在近郊找到了大娘的儿子家。当孙女跑出来拉住奶奶的衣服时，**我抓拍了这个镜头。**”
(右图：雷锋做好事留照不留名)

那个年代的人们，还会经常看到这样的报导：“**雷锋做好事不留名。**”等等。

雷锋走到那里，便把好事做到那里，而且做好事不留名。他是模范，是标兵，是先进工作者，因而被权贵和御用精英们称为“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说他“**有着高尚的理想、信念、道德和情操；他的价值，在于他把自己火热的青春全部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这一切，在那个年代，几乎成了中国人的共识！

随着那个年代逐渐远去、陌生，人们对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雷锋精神”，已经发生了分歧：有人说“雷锋精神”永存；有人则认为雷锋是“人造英雄”；还有人甚至大胆地预言：如果雷锋活着，一定是“四人帮”的重要成员；但也有人认为，雷锋是个爱拍照、有丰富生活情趣、一度被神化从而与普通人拉开了距离的平常人。笔者倾向于后者。

近几年来，有不少雷锋朋友或与雷锋共过事的人，在回忆中较详细地介绍了雷锋的個人生活。介绍使人们了解到，雷锋是一个有着七情六欲、丰富生活情调的普通人：他是一个文艺青年，喜欢写诗歌、散文和小说，喜欢穿好看的衣服，喜爱照像，短短的一生照了六七百张像；在他遗物中，不仅有他缝补过三层的袜子，也有很时髦的毛衣、皮夹克和手表；他同包括笔者在内的普通青年人一样，都有远大理想；在那个特殊时代，他把学习毛著、助人为乐作为追求理想的方式，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才是生活中的真实雷锋。笔者这么说，丝毫没有贬损雷锋的意思。

贬损雷锋的却大有人在，就是那些为政治而神化雷锋的人。例如：有人不顾雷锋每月仅6元收入和有限的支付能力，宣扬他两次捐款200元和多次送路费的“先进事迹”，有损雷锋精神的真实性；那张“雷锋帮老大娘找儿子”照片拍摄者的回忆，系“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回忆，当时拍摄的那张照片，应属表演，即雷锋与拍摄者合作摆拍，使人质疑雷锋动机的纯洁性；雷锋做好事照片和日记的存在，又是对“雷锋做好事不留名”的讽刺，等等。所以有人认为雷锋是“人造英雄”，就是由这种神化而异化为贬损的结果。

雷锋最大的贬损者是毛泽东。为了政治需要，他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大力支持新的**毛泽东式政治造假**：在平凡而真实的雷锋身上，注入了许多编导事迹，并对平凡事例进行政治神化性包装。以假乱真后的雷锋，便被捆绑在他个人崇拜的政治战车上！

毛泽东看上雷锋，并不仅仅是因为雷是模范、标兵、助人为乐、“做好事不留名”，因为，在中国，像雷锋这样做好事的人很多。为了**博爱和赎罪**，基督徒们一心做好事，不计个人得失；为了聚积功德，佛教徒们长年行善，终生以此为乐；伊斯兰教徒信先知，行课功，施舍资财给穷人，义无反顾。可是，毛泽东不喜欢他们，讨厌他们，甚至还要罗织罪名去惩罚他们。毛泽东之所以能看上雷锋，主要是雷锋向毛、向党表忠心的那些话，正中他搞

个人崇拜的政治下怀。雷锋在日记里写道：

“我要不断地加强学习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坚决听党和毛主席的话，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随时清除思想上的毛病，在伟大的革命事业中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我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以后，懂得了不少道理，心里感到特别亮堂，工作越干越有劲，只觉得有股劲永远也使不完。”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聪明敏锐、洞悉君意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主持军委工作的国防部部长林彪，就在毛泽东迫切需要这份政治资源时，他大笔一挥，向毛泽东敬献了一幅极为关键的厚礼——学雷锋题词：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林彪命令全军学习雷锋，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崇拜毛泽东的造神运动。所以，有人一针见血地说，“**雷锋是毛泽东与林彪绝妙合作的政治产品。**”

出于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政治需要，那个时代学雷锋青、少年比较积极，特别是中、小学生。他们的思想比较纯真，在舆论一律的社会里，在反复洗脑中，他们会被洗脑工具报纸、广播牵着鼻子走：1966年疯狂的“横扫”和无法无天的红卫兵运动，就是这种反复洗脑的结果。相比之下，成年人上当受骗较少；上了年纪的对学雷锋还有反感，他们中不少人认为，在教信佛，行善积德，远比学雷锋作好事纯洁、真诚得多。

今天，当权贵和御用精英们，时不时还在为毛、林合作的政治产品——雷锋传扬鼓噪的时候，伊拉克战争传奇人物、美国女兵杰西卡·林奇的新传记《我也是一名士兵》出版了。这位在伊拉克战争中遭到伊军伏击身负重伤被俘的美军女兵，九天后被美特种部队从伊军医院中成功救出。这宗戏剧性事件哄动了美国，19岁的女兵林奇，被美国传媒描绘成身负重伤弹尽援绝后被俘的英雄，成了美国人心目中的偶像。但她没有把自己看成英雄。她在她的传记中这么说：

“我不想将不属于我的荣耀揽到自己的身上。事实上我没有开枪，一枪也没有，我没有杀死任何人。我只记得自己摔倒在地，那是我最后记起的事。”

“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什么英雄，或者做出过惊天动地的大事。我不会试图利用这种优势。”

“我眼中的英雄是我的朋友洛丽·皮斯特瓦（笔者：同遭伏击阵亡的黑人女兵）和其他身亡的战友。”

这位不苟名利、实话实说的美国女兵杰西卡·林奇，同“做好事不留名”而留名留照的雷锋，其对比之鲜明，令人深思！

在利用雷锋搞个人崇拜的同时，1963 年毛泽东又多次向全国发出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 的号召，进一步强化了对他的个人崇拜。

21-毛泽东和农业学大寨运动

帖子由 于松然 » 2024 年 1 月 14 日

作者 于松然

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回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的老家湖北省浠水县农村，曾悄悄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头语：“农村两大害：人民公社，学大寨。”



毛泽东看上了陈永贵

毛泽东看上了陈永贵.jpg (11.09 KiB) 被浏览 835 次

1958 年年初，毛泽东就开始构想公社问题，即“小社变大社”的意见。7 月 1 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讲演时，首次公开了毛泽东对把工、农、商、学、兵组织成为一个大公社的总体方案。到 8 月初，毛泽东说了一句“人民公社好”之后，全国七十四万多个集体所有制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先后合并成两万六千多个全民所有制的人民公社。到 10 月底，全国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

1958 年 8 月 29 日，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中共中央在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中写道：“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甚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11 月，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坚定地说：“苦战 3 年，再搞 12 年，15 年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还说，中国“现在已开始第二个过渡，吃饭不要钱”，“公社是 1958 年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 1958 年大跃进的产物。公社是实行两个过渡的产物。”毛泽东断言：“如何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如何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斯大林没有找到适当的形式，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我们有了人民公社，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并且将成为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11 月 21 日，在武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得意忘形地说：“我们可能搞得快一些，看起来我们的群众路线是好办。”“苏联已经搞了 41 年，再搞 12 年还没有过渡，落在我们的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他们没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我们抢上去，……我们要逼他先过渡，没有这种形势是不行的。”然而，苏联没被他逼上“过渡”路，中国却在他的率领下去“过渡”，结果，3,000~4,500 万农民在“过渡”中变成饿殍，

人民公社的全民所有制也被迫“渡”回到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给历史留下了可悲、可耻又可咒的一页。

为了活命，在党内右派“修正”力量的支持下，农民们用“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雇工、贸易、借贷、租地不加限制）等初级市场模式，与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相对抗，结果遭到了毛泽东的无理批判和残酷镇压。在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时代，亿万农民在贫病交迫中，煎熬了一年又一年。到了毛泽东死后的 1978 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十八户农民忍无可忍，签订“血”约，揭“书”而起，**砸开了人民公社枷锁，率先分田到户**。小岗村十八户农民勇敢行动，得到了全国农民的热烈响应，也受到了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的支持。很快，中国农民们，把罪恶的、横行了 20 多年的人民公社和它的前身农业合作社送了终。

在中国横行的 20 多年里，人民公社产下了一个怪胎——大寨。

“寨”，往往使人联想到“兵”，事实也确如此。所谓大寨，原是屯兵的营寨，住的是“平定”周围的官兵及眷属。然而，大寨这个怪胎，在毛泽东“农业学大寨”的命令下，却在中国红红火火地辉煌了十五六个年头，**使六亿多农民吃尽了苦头**。

请看，当年的大寨何等辉煌！

自 1964 年 12 月 28 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要学大寨精神**”并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起，到 1980 年 11 月 23 日《**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的批语**》止，到大寨参观学习的人数高达 700 多万人次。在国外，世界 134 个国家的 25,470 多名外宾，也到大寨参观。在国内，除毛泽东外，从国务院总理到省、市、地、县直到公社生产队长各级干部，大多数都来大寨“学习”过。来大寨考察、“学习”的经济学家、哲学家、教授等学者络绎不绝，文学家、诗人、记者连篇累牍地发文、咏诗、题辞，赞颂之词充斥全国大小报章，歌唱家们吼声高放，把“大寨的红花遍地开”唱遍全国大街小巷和穷乡僻壤……期间，大寨的领头人陈永贵，从大寨党支部书记、中共昔阳县委书记，一路飚升到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中共九大的山西省的代表、中共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和十届、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 年跃升为主管全国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成了中外千古难得一见的农民宰相。

毛泽东看上了陈永贵

大寨，一个六七十户农家、不足 300 口人的小山村，何以能如此辉煌？**要解读大寨，就要读懂他的领头人陈永贵**，因为，陈永贵是解读大寨历史的钥匙。九十年代，史学家吴思写了一部书，书名是“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吴思的书名准确地道出了大寨辉煌的原因：

毛泽东看上陈永贵决非心血来潮，而是深思熟虑的个人崇拜政治谋略之一。

在 1962 年 9 月的中共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为捍卫“**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的人民公社正确性，狠批了“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的“单干风”。尽管没有人敢站出来公开对抗他，但他十分清楚，反对人民公社的，无论党内党外都大有人在。因此，在狠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单干风”的同时，他必须树立典型人物来“说服教

育”反对者。这个典型终于找到了，就是昔阳县大寨大队的陈永贵。

陈永贵虽是个文盲，却是个能吃苦耐劳又聪明狡黠而长于计谋的农民。

毛泽东看上了陈永贵什么呢？

毛泽东看上了陈永贵感谢共产党是真心的，不计较他曾经是“陈二鬼子”。

1915年2月14日，农历正月初一，陈永贵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大寨乡小南山村，为长子。六岁那年，由于生活所迫，父亲陈志如先后卖掉他的母亲、姐姐和弟弟后，带着他来到大寨。一年后，父亲不堪生活的窘迫，活不下去了，独自跑回了老家石山村，一根绳子吊死在坟前的老松树上。饥饿夺走了他的母亲、姐姐和弟弟，饥饿又夺走了他的父亲，使他成为孤儿。他在贾氏宗族孟老人和她的儿媳妇稳周老人的收养下，长大成人，成了一个能说会道的棒小伙子。二十七岁结了婚，生了长子陈明珠。

乱世出英雄。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人和日本人在昔阳“拉锯”。据昔阳县县志记载，在扫荡和反扫荡中，有四五百人被日军刺死、烧死、活埋和机枪射杀，遇害事件比比皆是。既怕日本人又怕八路军的大寨当权人，就想请一个人出来维持维持。他们看中了长工出身的陈永贵，看中了他胆大心细、能言善辩，又能随机应变。于是，陈永贵当上了大寨村伪维持会的代表、伪村长、日伪特务外围组织“兴亚会”的情报员，常出入于日本人的炮楼和村落之间，时称“陈二鬼子”。其时，他也给大寨人办了一些好事。

日本投降后，昔阳成了共产党的天下，全县掀起了土改运动和反奸复仇清算血债的群众运动。当年与日本人有染的人，个个受审，人人过关，不少给日本人干过事的人，被人们枪杀或用石头砸死。陈永贵自然也躲不过这场审查。他被拘留起来，五花大绑在村里挨斗、挨了不少拳头。他担心自己过不了这一关，就向他的好友共产党第一任大寨村村长赵怀恩托孤说：“我明珠小，托付给你，你给我招呼他长大！”当时赵怀恩和有些村民，替陈永贵说了不少好话。他们说，日本人来了，总要有人出面吧？别人不敢，他胆大，就当伪代表，又没作什么坏事。话说得很有道理，被共产党采纳。共产党的谅解不仅使陈永贵保住了一条命，在被史称“中共对农民的第一次掠夺”的土改运动中，还分给他一处窑洞、十几亩地和几件家具。为感激共产党不杀之恩，感谢共产党分田之德，一句话便挂到他的嘴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陈永贵！”

毛泽东还看上了陈永贵听毛主席的话，紧跟共产党，把大寨的农民一步一步硬拉进了人民公社。

1946年，陈永贵响应毛泽东和共产党“组织起来”的号召，参加了共产党员贾进才组织的好汉互助组。不久他发现，村子里还有一些缺乏劳动力的困难户没有组织起来，其中有的是曾养育过他的，有的是在反奸中替他说过好话的。陈永贵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他离开了“好汉组”，成立了一个“老少组”，把困难户都吸收到他的组里来。凭着他一身好庄稼把式和不怕吃亏的报恩心，当年秋季单产就超过了“好汉组”。到1949年冬，老少组便扩展到了49户，占了全村户数的70%。

1948年，经贾进才等人介绍，陈永贵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2年，陈永贵被评为山西省农业劳模，成了昔阳县内颇有名气的人物。1953年7月，陈永贵谈起自己热心互助合作的原因时说：“……**我的思想，听了毛主席的话，是土改后农村的第二次革命，就是组织群众发展互助合作才能避免剥削，由穷变富，必走之路。**”

1952年，由贾进才推荐，陈永贵出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

1953年，陈永贵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大寨用哄骗和压服相结合的手段成立了“新胜农业生产合作社”，任社长，代领农民们开始走他们不愿走的路。这一年统购任务四万二，他咬牙完成了四万五，狠狠地超了三千斤，受到了党和政府的表扬。

1955年，毛泽东说：“**1955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12月，陈永贵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成立了高级农业合作社，自任社长。同全国各地一样，用“说服教育”、行政命令加批判“小农经济思想”亦即哄骗和压服相结合的手段，将农民们的农具、牲畜“作价”收为高级农业社所有，从此，农民们失去了一切生产资料。

1958年是“辉煌”的一年。那年，为响应毛主席“**超英赶美**”的“伟大号召”，各地丰产“卫星”纷纷上天，重磅“卫星”亩产竟高达十三多万斤。一流大科学家**钱学森**，也著文凑热闹说，**根据他的“科学”计算，亩产可达五、六万斤**。紧跟形势的陈永贵已按捺不住。据《昔阳农村经济史记》记载，陈永贵伙同第二生产队队长贾成富和副队长贾进才，在后底沟培养了3亩玉米丰产田，亩产达到14,436斤；在神土角，干圪梁上种植了二亩谷子试验田，每亩平均实产14,124斤，超过1956年最高年产量230斤的60多倍；他们培育的1.2亩高粱，共产高粱7,650斤，平均亩产6,375斤。笔者认为，陈永贵聪明之处在于，他没有放十多万斤的大“卫星”，只放了五万斤以下三颗中不溜“卫星”，符合钱学森“科学”。据报导，他的口号是：**全党全民搞丰产，干部带头跑在前，队队保证放卫星，争取秋天上北京。**

1958年毛泽东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号召。8月，陈永贵又从报纸上看到河南新乡专区办人民公社的消息，就对社员“耐心说服教育”说：“**事物总是向前发展的，事情既然迟早总得办，倒不如把挨批评变成受表扬。**”社员们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没有阻挠他。24日，他倡议创办的昔阳县第一个人民公社——昔阳县红旗人民公社宣告成立。高级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成立，被史称为“中共对农民的第二次掠夺”。在“第二次掠夺”中，陈永贵提刀纵马，成了先锋官之一。

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号召实现“**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还多次警告：“**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的阵地，社会主义的心脏，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陈永贵响应号召，牢记警告，在大寨办了三个公共食堂，还一度实行过吃饭不要钱、吃粮不定量。大寨办的公共食堂，尽管一年多才吃了19顿细粮，日常仍以窝头稀饭为主，但陈永贵还是高度赞美了他的公共食堂：**全村吃饭到食堂，花样多种味美香。七天生活一改善，过节过年宰猪羊。**一年多后，大寨的公共食堂同全国各地一样，也在一片愤怒地反抗声中垮了台。

毛泽东还看上了陈永贵的“大批促大干”，符合他的“革命加拼命”思想。

1953年，初级社刚成立，陈永贵就制订了治山治水十年规划。当年**首战白驼沟**，一个

月中，他们投工 1,500 个，筑坝 24 条，造地 5 亩。据说，首战当年大功告成，陈永贵豪气冲天地将白驼沟命名为“合作沟”。

1955 年冬，陈永贵开始了劳民伤财、破坏环境的**三战狼窝掌沟**。狼窝掌沟长约三里，宽约四丈，下点雨就山洪咆哮，能卷走一百多斤的大石头。一战狼窝掌沟时，全村 50 多个劳力，顶着呼呼的北风，搬着冰冷的石头，苦干三个月，垒起石坝 38 条，造地 20 多亩。1956 年雨季，一场大雨过后，狼窝掌山洪爆发，将 38 条石坝连同 20 多亩庄稼一扫而光。当年再战，1957 年夏一场大雨，大坝和庄稼又被冲了个精光。他没有灰心，当年排除异议，进行三战：70 多个劳力苦干了 27 天，搬运数万土石方，用石灰 30 吨，筑大坝 32 条。据说，“终于驯服了狼窝掌沟。”

1963 年夏，大寨大队遭遇特大洪水，给了大寨大队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大批社员房屋被冲毁，百分之七十的农民无家可归。尤其严重的是，陈永贵带领大寨农民辛辛苦苦干了十几年才修好的梯田，全部被洪水冲垮，庄稼和土壤全部被大水冲走。山西省委决定从国库中调出一批救济粮、救济物资和一部分救济款扶持大寨大队。但为响应毛主席“**自力更生**”的号召，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作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决定，即：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当年社员口粮不少，社员收入不少，上交国家的统购粮不少。据说，农民们眼巴巴地望着到手的救济粮和物资又被拉走了，敢怒不敢言。

1963 年下半年，大寨大队的社员在陈永贵的带领下，抢修梯田，重建房屋，抢种庄稼，经过几个月的“革命加拼命”，大寨在“**大灾之年夺得了大丰收**。”据说，1963 年总产量达到了 20 多万斤，“**不仅社员的口粮充足，还上交给国家 12 万斤**。”被大水冲毁的房屋重建后，据说“比原来的更好，创造了一个奇迹。”据说，到了毛泽东死后的 1980 年 11 月，这些战天斗地的先进事迹，很多都变成了真假搀合的谎言。

毛泽东最看重陈永贵轻视生命、漠视人权、压制自由的无产阶级政治觉悟、路线觉悟和管理才干。

1957 年，在帮助党“整风”的一个不平凡的夏季里，陈永贵当真动员了几次，号召大家给他提意见，可是成效不大。陈永贵装起下台架式。一次大会，群众问永贵怎么没来呀，县派驻队干部郝兑元依陈永贵之计说：“他还能参加会呀？”暗示陈已下台。会场上的农民们不知是计，七嘴八舌地出起气来。

复员军人、共产党员赵启福，带头指责陈永贵向国家卖粮太多，农民吃亏太多，指责办高级社“一切财务都归公，甚也得听他陈永贵的！”接着，胆大的农民们便骂将起来：

“陈永贵的胳膊弯不是往里曲，是往外曲哩！”

“哎！陈永贵卖粮有他的目的哩！”

“他卖粮是为了上太原吃白馍馍哩！”

“在大寨他学会了啥？他甚也没学会，就学会个卖粮！”

“干活没轻没重、没黑没白，还不如去当长工！”

“别的地方的狗是咬外，大寨喂下的狗是咬自己人！”

.....

不久，毛泽东说“**事情正在起变化**”，风向变了，陈永贵也立即组织反击。据报导，“支部及时组织社员，摆明事实提出问题，……狠狠地对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党内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赵启福开除出党，歪风邪气压下去，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正气迅速上升。”陈永贵学着毛泽东，对他的农民也玩了个漂亮的“**引蛇出洞**”。

1958 年大跃进期间，有位社员对办食堂不满，说了句怪话，激怒了陈永贵。他声色俱厉地说：“反对公共食堂，就是反对人民公社，反对人民公社，就是反对总路线和社会主义！”这种**无限上纲的毛式批判**，吓得那个社员再也不敢“乱”说了。

1963 年秋，面对大灾，陈永贵提出了“先治坡，后治窝”的口号，还有个口号叫“白天治坡，晚上治窝”。那时大寨人根据毛主席“**革命加拼命**”的思想，干起活来就得不要命：人们白天干在地里，晚上干在村里，早晨披星星，晚上戴月亮；对这种超时超强度的劳动，大家都咬牙坚持着，没有谁敢说一句“草包”话。超时超强度的劳动使社员赵小和赶着车困得睡着了，颠簸的大车把他从车上摔了下来，轧死在自己马车的车轮下。村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陈永贵说，赵小和是为保护集体财产不幸牺牲的，是个好社员，“死得重如泰山！”

1966 年，以郭风莲为首的 23 名铁姑娘提出了嫁出大寨的要求，这在陈永贵看来无异于对大寨的背叛：全国都在学大寨，大寨的姑娘却“不愿在大寨找对象，眼睛盯着工人和干部”，这证明“**大寨有新资产阶级思想，有新的阶级斗争**”。爱情必须服从政治，没有恋爱自由可言。他决定首先解决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郭风莲。于是，大队支委会共同来讨论郭风莲的婚姻问题，“一致”决定她必须终止初恋。年仅 19 岁的郭风莲泪下如雨，拒绝党支部干涉她的个人生活。陈永贵抛出杀手锏：“**如不答应，开除党籍。**”少女终于屈服。其余的少女们也只好斩断前情，被迫发誓“死了也不出大寨”。一场爱情的政治危机，就这样以陈永贵的全胜而告终。

此外，毛泽东还看上了陈永贵领导下的**大寨**，是个全国惟一什么经验都能出的地方。除“三战狼窝掌”外，诸如什么“七斗八斗”，“大批促大干”，“大批了还要大批”，“割资本主义尾巴”，“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斗一步，进一步；斗十步，进十步；步步斗，进一路”等等，都是大寨总结出来的推向全国的“**革命加拼命**”经验。可以说，陈永贵为树立毛泽东在农民中的个人崇拜，立下了汗马大功。

对毛泽东树立的陈永贵和大寨这个典型，各级干部谁敢怠慢？为了向“毛主席革命路线”表忠，六十九军军长谢振华奉周总理之命，派出一支 400 余人的队伍，帮助大寨修建了一个蓄水池，命名为“友谊水池”；听说大寨要搞“人造小平原”，有关单位马上派出了推土机；握有实权的一些领导干部，来参观学习时，还带来了化肥、良种、机械等生产物资，做为赠品、试用品，赠予或廉价售于大寨；农忙时，一些机关干部和大、中学生，“自愿”来大寨帮忙播种、收获……后来，由于“帮忙”人太多应接不暇了，才被陈永贵谢绝。

1964年12月21日，紧跟毛泽东的周恩来总理，在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将大寨精神概括为“**第一，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第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第三，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这原则、精神和风格的概括，把大寨典型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毛泽东死后，随着人民公社解体，大寨这个被大树特树的典型，在多方指责下，也悄然倒下，随毛泽东而去。

1979年春，农业科学家杨显东博士，在全国政协常委小组会上发言，第一个揭开了大寨“盖子”：大寨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把其他经济都砍光了；毁林造田，大造山间小平原，结果是破坏生态平衡；社员家庭副业都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都成了穷光蛋；实行穷过渡，吃“大锅饭”，严重挫伤农民的积极性；大寨的自力更生是假的。杨显东博士还对陈永贵提出尖锐批评说：“**我认为陈永贵欺骗了全国人民，欺骗了党中央……**”

1979年9月开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机构，派出一批记者去昔阳县和大寨调查了40多天，写了两组内参。主要文章有：《大寨走向了反面》、《一部充满谎言的“大寨斗争史”》、《“七斗八斗”给大寨造成严重恶果》、《一整套对抗党的政策的极“左”做法压抑了大寨群众的积极性》、《昔阳学大寨“大批资本主义”的真相》、《昔阳学大寨“大干社会主义”的成败得失》、《从帮派掌权到家族统治》，等等。

据昔阳县志记载，在陈永贵统辖昔阳的13年间，昔阳在农田水利建设施工中，农民伤亡1,040人，其中**死亡310人**，同时又虚报产量2.7亿斤。据高级记者杨继绳披露，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湖南、湖北的一些农村，出现了几起十八九岁的少女因不堪忍受“学大寨”的繁重劳动而集体自杀的恶性事件。例如，在湖北省红安县，由于不堪贫困的煎熬，1975年的几个月中，就发生过52名女青年先后集体自杀的事件。又据1979年8月13日《人民日报》报导，陈永贵在昔阳县领导学大寨创大寨县运动中，被戴上各种帽子批斗的有2,061人，造成冤假错案3,028件，导致**非正常死亡141人**。据作家凌志军记载，非正常死亡的141人中，多是上吊、投水或跳崖自杀，有两人死于乱棒之下。

那么，全国在学大寨运动中造成了多少冤假错案呢由于档案尘封，无据可查。笔者估算：全国2,000多个县，如平均按昔阳县的25%计，则全国在学大寨运动中的所造成的冤假错案，可能高达一百五十万件，包括农田水利建设施工在内的**死亡人数至少在二十万以上！“农业学大寨”运动，被人们称作二十世纪最愚昧、最卑劣、最野蛮的运动之一。**

在各方压力下，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时加了批语。《批语》承认，“历史已经证明，人为地树立先进典型，最终没有不失败的。”《批语》还第一次承认，对大寨这个“先进典型”，有些领导和部门“**……滥用职权，动用国家财力、物力和人力去支撑所谓‘先进典型’的门面，甚至弄虚作假，欺骗上级，欺骗舆论。**”《批语》回避了“农业学大寨”的始作俑者毛泽东和积极推行者周恩来的责任，以及由此带来的冤假错案和伤亡。但这个《批语》，还是把造成二十多万农民死亡的可悲、可耻又可咒的“农业学大寨”运动送了终。

在“农业学大寨”的冤假错案中，人们看到的多是一些抽象的数字，南方日报报业集团

高级编辑鄢烈山所写的随感《西风残照大寨行》，多少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他写道：

“中国真正的英雄是谁？绝不是追随毛泽东搞‘穷过渡’，与天斗、地斗、人斗的陈永贵，而是李云河、戴浩天、徐适存、冯志来、陈新宁、杨伟名这些坚持独立思考、见识卓异、舍身为民请命的人！可是他们在当时皆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李云河 24 岁时即任浙江省永嘉县委书记，31 岁的戴浩天是县委农村工作队长，二人在 1956 年不赞成毛泽东的农业集体化政策，在永嘉大力推行‘包产到户’。最后李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劳动改造，戴成了‘右派’加反革命，举家遣送农村管制。而支持李、戴，在会上喊过‘包产到户就是好’的农民徐适存，不‘适’不‘存’，**瘐死狱中**。1962 年，浙江青年冯志来、陈新宁等人投稿人民日报，讨伐人民公社，被毛泽东斥为‘**单干理论家**’，二人历经劫难，九死一生。陕西户县的大队干部杨伟名、贾生财、赵振离三人文化程度虽不高，却能清醒把握中国的脉搏。他们三人联名、杨伟名主笔的《当前形势感怀》，写于 1962 年 5 月，却不止于批评人民公社制度，而可以说是邓小平改革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初稿：他们对‘社会主义初期’的判断，对尊重‘价值法则’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呼唤，多么具有远见！可是，在权力即真理的中国，导师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对他们的‘回答’可想而知，**三人的下场不说也罢**。

“这些人才是中国的真正的精英呀——良知良能聚于一身。陈永贵在他们面前，借用毛泽东的语言，不过是一抔黄土！”

在鄢烈山的这段文字中，我们看到了三句这样的话：农民徐适存“**瘐死狱中**”，浙江青年冯、陈“**九死一生**”，陕西队干部杨、贾、赵“**三人的下场不说也罢**”。鄢被国内誉为“敢说真话”的体制内作家，但话到嘴边却留了半句，令人遗憾。仔细想想，也不能太责怪他。在国内，除颂扬唱诗派外，体制内作家们都知道，**文字与饭碗、牢狱的关系**。他们写作中创造了诸多隐喻暗语、旁敲侧击、闪烁其辞、拐弯抹角和打擦边球等笔法，用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笔法”去描述当局认为的敏感话题。我们并不期望像鄢这样所谓“敢说真话”的作家，也用《红岩》中描绘渣子洞里受刑共产党员那样夸张、渲染的手法去描述上面六个人的下场，我们只期望他们实话实说，把实话说完。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不吝啬地把“敢说真话”桂冠戴在遇事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鄢烈山头上。由此推见，那些尚不“敢说真话”的体制内作家、学者、记者、编辑以及当事人们，他们在报导、史著、传记、回忆录等等里面，究竟肯定了些什么？渲染了些什么？回避了些什么？曲解了些什么？甚至篡改了些什么？其可信度究竟有多高？

笔者不得不搜肠刮肚，终于从纪念《当前形势感怀》发表四十周年一组文章中，了解到了杨伟名的下场。

农民杨伟名执笔起草的《当前形势感怀》，又名“一叶知秋”，当时曾引起轰动。他们在文章中说：“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而‘严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农村而言，如果拿了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同是在党和人民政府英明领导下，何今暗而昨明？这种情况，已经是一望而知的事实，用不着连篇累牍地再行分析了。”文中还说，这篇感怀“其所道所说系实践事实与亲身体验，真实程度，颇堪自信！”毛泽东看信后勃然变色，遂于 1962 年 8 月在北戴河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怒斥道：“有一句话，‘一叶知秋，异地皆然’。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任何

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的同志也讲希望，他们讲单干希望……共产党员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遭到毛泽东严厉批评后，杨伟名惨遭批斗迫害，终因不堪凌辱，服毒自杀，卒年 46 岁。毛死后的 1979 年 6 月 29 日，杨伟名始得平反昭雪。

“农业学大寨”的主要承担者陈永贵呢？

杨显东博士批评陈永贵“**欺骗了党中央**”，笔者不以为然。事实上，他在当“陈二鬼子”、搞互助组时，没见他欺骗过谁（不排除曾骗过鬼子）；他带领大寨走所谓“共同富裕”的合作化和公社化道路时，也谈不上他欺骗，他仅是毛泽东和共产党制订这种祸国殃民政策的积极执行者；放卫星时有点欺骗，但那是大势所趋，他不得不跟上，跟不上就挨批；三战狼窝掌和大战天灾，更谈不上欺骗，而且还有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哩。当树成典型后，他变啦，变得欺下骗全国了，但既谈不上瞒上，更谈不上“欺骗了党中央”。为什么？因为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毛泽东、党中央和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管理和监督之下。党中央**纵容或默认他骗**，各级党委和政府**支持或旁观他骗**，从没有去过大寨的毛泽东，为了证明人民公社的正确性，**需要他骗**。他可能是进了官府，身不由己，在充满“假大空”即“假”获重用、“大”能升迁、“空”受表彰的官场里，**不骗人则被人骗**，他便顺着大流渐渐看惯了骗，习惯了骗，又渐渐学会并熟练了这种政治骗术。这不是为陈永贵开脱，仅仅说杨批他“欺骗了党中央”的话，不够恰切。

陈永贵对“农业学大寨”运动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理应为此付出代价。1979 年 12 月 17 日，他被免去兼任昔阳县县委书记职务，1980 年 8 月 30 日，他被迫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82 年 9 月 1 日的中共十二大上，他失去了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资格，成了一名退休干部。1986 年 3 月 26 日，71 岁的“农民宰相”陈永贵在北京医院病逝，结束他由长工到“陈二鬼子”，又从大寨党支部书记跃升到国务院副总理既辉煌又可悲、可咒的一生。

22-毛泽东为何发起全国学习解放军运动

帖子由 于松然 » 2024 年 1 月 14 日

作者 于松然

1964 年 1 月，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指示《人民日报》等报纸：“加上一版，专门报导学习解放军。”于是，1964 年 2 月 1 日，《人民日报》便发表了《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社论，掀起了新一轮的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

社论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缔造和领导的工人农民的军队，是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军队。”又说：“解放军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军队，最根本的原因是：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解放军大抓政治思想工作，坚持‘四个第一’的原则；解放军坚持我国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三八作风’；解放军注重创造四好连队、加强基层建设等等，这些都是解放军无往而不胜的原因。全国学习解放军，就是要把解放军这些方面的宝贵经验

学到手，真正活学活用这些宝贵经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中，充分发挥无产阶级化和战斗化的革命精神。”

人们从这篇社论中可以看出，学习解放军最根本的是学习“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如果说**学雷锋**是毛泽东要求他的人民读他的书，“净化”人们的思想，**学大寨**是毛泽东要求他的农民们用“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和干劲来承认他的人民公社的正确性，**学大庆**是毛泽东要求搞工业的干部和工人们，学会用他的所谓“两论”和“大兵团作战”思想搞工业，从而为他的臭名昭著的大跃进正名，那么，这篇经毛泽东亲自审定批发的《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社论，则要求他的人民必须用他的思想指导一切。在**造神运动**的设计上，毛泽东把学习解放军当成“纲”，学雷锋、学大庆、学大寨当成“目”，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纲举目张”。这种“纲举目张”，完美地体现了他的“大救星”情结和权力拜物教的权力情结。

毛泽东是个枪杆子崇拜者，“**枪杆子里出政权**”是他的名言。按照毛泽东的逻辑，枪杆子既然能出政权，就能保政权。夺得政权以后，他一直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紧紧握住枪杆子不放。令他不放心的是，朝鲜战争后，他不得不任命对他怀有“**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的彭德怀为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为了牵掣彭德怀，在1958年5月的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他出人意料的提议增补林彪元帅为中共中央常委，副主席，凌驾于彭德怀之上，获得批准。1959年9月，在庐山会议上，他又以“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罢免了彭的一切职务，并将其逐出中央，扶林彪为国防部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林彪同毛泽东的关系非同一般。

1906年12月17日，农历丙午年十一月初二，林彪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回龙山林家大湾一个富足的农民家庭。1926年初夏，他考入黄埔军校，成了第四期学员。同年12月，他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任见习排长、排长。1927年8月1日，已升任七十三团一营七连连长的林彪，参加了周恩来等人发动的南昌起义。1928年4月，朱德与毛泽东井冈山会师后，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任军长，毛任党代表。毛泽东的领导风采曾使林彪由衷佩服。他见到毛时脱口而出：“南昌起义的军队要是由你来指挥，肯定不会成现在这个样子。”毛泽东打量着这个瘦弱的二十二岁的年轻的连长，问道：“为什么？”林彪说：“除了敌强我弱和客观上的因素外，起义军的高级领导人不会打仗，只是从书本上或条例里死搬硬套地指挥战争，也是我们失败的主要原因。”林彪的这番话，深深打动了毛泽东，并被毛视为知己。很快，林彪便被晋升为一营长，1929年春，又升任第一纵队司令员，1930年6月，又跃升为红军第四军军长，1932年3月，未满二十六周岁的林彪，又被毛任命为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长。长征时，他紧跟毛泽东，率领红一军团斩关夺隘，爬雪山，过草地，强渡大渡河，奇袭泸定桥，智取腊子口等等，战绩卓著，受到毛的赞扬，尽管其间，他俩曾发生过严重分歧。到延安后，他曾被毛削去军权调任为抗日红军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但他毕竟是一员难得的虎将，抗日战争时期，他被毛任命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内战时期，他又被毛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和统帅百万大军的第四野战军司令员。内战中，他组织和指挥了三大战役中的两大战役——辽沈、平津战役，歼灭了国民党军主力一百多万。在战争年代，林彪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一路顺风，也为毛泽东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大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林彪对职位上的安排不太满意，便“称病”不朝。但壮心不已

的林彪，不忘窥伺政权，时刻注视着政局的变化；因无机会，便卧薪尝胆，等待时机。机会终于到了：1959年9月，彭德怀倒台后，林彪取而代之，成了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毛曾说过：“**林彪是忠于我的一员战将，我信任他。**”林彪心领神会，他对夫人叶群说：“毛泽东深谋远虑，一看就不是那种咋咋唬唬，轻浮得像张纸的人。我就感觉到，跟上这个人，绝对吃不了亏。跟对人，就是吃不完的资本呀。这是在任何书上都找不到的经验之谈，你要好好地读透这本**无字书**。”他对叶还说“**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为此，他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一步一趋，得一人而得天下”。他对他的工作人员说：“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大统帅，其他的人都不行都不够格。我们的眼里就是要只有一个统帅，一个领袖，一个天才。这是历史的选择，时代的选择。”此时的林彪已是毛泽东肩上猛鹭，毛泽东指向哪里，他将扑向哪里。

庐山会议上揪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后，全党沉浸在震惊和沉默之中。为了效忠，刚刚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打破了寂静，心中捧着“无字书”，在当年9月份召开的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发出了异常响亮的毛泽东想听到的声音：“**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称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捷径。”9月30日，他又发表了《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文章。文中说：“**1958年以来的国民经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高潮，显示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无限光芒。**”他警告说：“……不要群众运动，抓住一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而且是迅速克服的缺点反对群众运动，就是不要前进，不要革命。”

1960年1月，林彪把毛泽东的延安对抗大题词，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三句话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八个字，总结成所谓“**三八作风**”，作为军队革命化的标准。

同年，在广州召开的军委扩大会上，他宣扬学习毛泽东著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推出“**要带着问题学习，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学习方法。在他的鼓动下，全国迅速掀起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热潮。

1960年9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根据毛泽东“**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思想，又提出了“**突出政治**”的“**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突出政治”，实际上是突出崇拜毛泽东的政治。在他的主持下，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对此，毛夸奖说“**谁说中国人没有创造？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

1961年4月，林彪在部队视察时，更明确地指示：为了使战士在各个时期、各种情况下，都能及时得到毛主席思想指导，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的有关语录。于是，该报即从5月1日开始，在每天的报眼上刊登毛主席语录。接着，1964年1月5日，《毛主席语录》征求意见本出版了。到1964年5月1日，部队人手一册的《毛主席语录》，已发到部队战士手中。

1966年1月24日《人民日报》报导说，林彪同志说：“突出政治不是一项任意的政策，不是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这是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

基础所提出的根本措施。不突出政治，就是违反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顶峰论**”是林彪对毛泽东思想最重大的贡献之一。但物极必反，顶峰之后，接踵而至的必将是颓萎、堕落和衰亡，不论林彪主观上是否意识到。

军内造神运动，用真假搀和的办法制造了许多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分子，诸如**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等，都成全军全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偶像。

毛泽东对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的所作所为，看在眼里，喜在心中。特别是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使他心潮澎湃，无法忘怀。林彪在那次讲话中说：

“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

“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林的这篇“救驾”式的讲话，使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迅速走出困境，反守为攻。

借助林彪在军队中推行**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把军队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是毛泽东向刘、邓为代表的党内右派集团夺权的主要权谋之一。于是，他反复号召：“**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心怀“无字书”的林彪，已洞悉毛泽东的谋图。他在日记中写道：“**要整刘少奇。**”便积极配合起毛泽东来。

有人说，为了权力，毛、林相互勾结，狼狈为奸，这话虽然刺耳难听，但不是无中生有：林使劲吹拍，毛开心笑纳；他俩一唱一和，先后表演了十多年，直到林彪出逃摔死到温都尔汗为止！

林彪在军内大搞造神运动中，有多少军人伤亡？一将落难，又有多部属、亲朋跟着遭殃？在新闻封锁、舆论一律的环境里，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曾一度被报导过的文革事件后又重新被控制、封锁和加密的条件下，笔者很难从解放军出版物中找到多少有关资料。但人们还是能从军外的一些书中，找到伤亡事例。例如，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在他的《牛鬼蛇神录》一书中披露：

“小王在军队时亲眼看见过一次死刑判决和执行。被处死者不是监狱的犯人，而是一位解放军士兵。那时部队里正是突出政治、抓阶级斗争非常时髦的时候。有位连长选了他的一位喜欢顶撞干部的调皮战士做阶级斗争的活靶子，经常点名批判他。他对连长积下了仇恨。一天夜里，他取出他的枪，冲进连长的房里，打死了连长，后来又打死二十个来追捕的军人。他最后被打伤逮捕，不久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他的伤完全治好后才执行死刑。执行死刑前全军开了宣判大会，开会时，坦克排在会场外，杀气腾腾，好像被判死刑的是一个师的敌人。

这个士兵是被用步枪从他背后击中脑部而死的，死后有人用手枪补火，查实他确已死亡。”

人们还可以从广为流传的两个事件上，窥见到军内造神运动的惨烈。

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跳楼自杀。

1966年3月18日深夜，处于委屈、痛苦、悲愤和绝望中的罗瑞卿，从他住房的三楼楼顶纵身跳下去……他没有死，多处骨折、受重伤。

跳楼前，他给妻子郝治平留下了既可怜又可悲的绝命书：

“治平：会议的事没告诉你，为了要守纪律。永别了，要叫孩子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刘伯承元帅曾说过：“**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这可以说是包括罗瑞卿在内的许多高级领导人的共识。伦理共识使他们认为：革命永远神圣，党永远正确，毛泽东永远伟大；对他们来说，极左路线、个人崇拜等等都不是问题；他们甚至认为，“**生是毛主席的人，死是毛主席的鬼**”，无论个人遭到多大的不幸、委屈，包括个人和家庭的毁灭，都无损革命的合理、党的正确和领袖的伟大。这种与现代文明价值格格不入的封建忠君意识，是大跃进、文革中混乱局面得以控制、一党专政得以继续的重要原因。

一个忠于毛泽东、忠于共产党、事业日逼中天的总参谋长怎么会如此短见？

“绝命书”中说的“会议的事没告诉你”指的是什么？原来，自三月以来，毛泽东和林彪决定在北京召开批判罗瑞卿的会议，并指定叶剑英主持会议。罗在会上作检查；如果罗不承认给他罗列的一系列罪行，检查就不能通过。会议没有确定日期，停停开开，每当罗瑞卿要陈述真相为自己申辩时，他们就群起而攻之或宣布休会。显然，这是从“延安整风”继承下来的整人法：只能坦白、挨整，不许沉默、抗辩——**毛泽东式的逼供信**。风光时，罗瑞卿常用这种办法收拾别人，没有想到今天，会让叶剑英用这种办法来整自己！无可名状的痛苦，使他陷入绝望的深渊，整个精神崩溃了，他决心以死来抗争。

罗瑞卿怎么会得罪毛泽东呢？

罗瑞卿与毛泽东 1929 年相识，1930 年初罗任二纵队政治部主任期间，就在毛泽东手下工作。抗战初期在延安，罗被任命为抗大教育长，毛泽东经常到抗大讲话，对抗大工作作出许多重要指示，罗瑞卿是忠实执行者。1949 年到 1959 年，罗在担任公安部长期间，忠实执行了毛泽东的决策，先后镇压反革命高达 200~300 万，为稳定政局作出了巨大贡献。

罗虽被国外称作“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却被毛泽东称为“大警卫员”。毛泽东对他的工作很满意，他说：“**天塌下来有罗长子（笔者：毛泽东给罗的绰号）顶着。**”1959 年庐山会议上，罗瑞卿发现周小舟、周惠、李锐到彭德怀、黄克诚住处交谈，向毛泽东告了密，使毛泽东下决心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打成反党集团。毛兴奋地说：“**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1960 年 12 月 25 日，毛泽东在过生日前夕，对他的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说：“**今天在座的，受过我批评最厉害**

的是汪东兴同志，除他之外，还有罗瑞卿同志。我骂过他们，要他们从房子里滚出去。”他还颇为得意地说：“我狠狠地批评了他们，但是他们从来不恨我。”可以说，罗对毛忠心，毛用罗放心，他俩的关系非同一般。

如此忠于毛泽东的大将怎会遭到整肃呢？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他得罪了林彪。

其实，罗瑞卿跟林彪的关系也很好。

林彪同罗瑞卿从 1930 年 2 月开始相识共事。罗虽然比林大一岁，但一直是林的下级。红军时期，林当红四军军长时，罗是十一师的政委，林当一军团军团长时，罗是军团的保卫局长。到陕北后，林当红军大学的校长，罗是教育长。抗战时期，两人分开。内战打太原后，罗要求调到四野，林彪、罗荣桓同意，但由于中央决定调罗当公安部长，才未去成。1959 年庐山会议以后，罗瑞卿这名中共中央委员，已经成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十分耀眼的红人。林彪建议任命忠于毛的罗当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很快被毛批准。可见他们的关系也非同一般。

据说，不到两年，林、罗的关系就出了“裂痕”，而这种“裂痕”与叶剑英元帅和杨成武上将的“小报告”相关。1965 年秋天，林彪曾经对陶铸这么说：“1960 年，罗瑞卿对我的合作是好的。但是从 1961 年起，就开始疏远我、封锁我，到 1965 年便正式反对我了。”这话也许是实话。陶铸将林的话传给了罗瑞卿。笔者认为，林的意图不仅要陶铸把这句话传给罗，更要传给毛泽东。陶铸是否把林的话传给了毛，笔者手头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但笔者深信，陶一定会把林的话传给毛。因为，当年身为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是毛泽东向刘、邓夺权所信赖的重要人物之一；由于他是毛的亲信，在来京后的第二年，便被毛任命为文革小组的顾问，接着提拔为中共中央常委，迅速成了地位仅次于周恩来的党和国家第四把手。如此显赫的毛的红人，当时的他，怎会忘记把发生在林、罗之间的重大信息传给毛泽东？做为毛泽东猎鹰，林彪已经察觉到毛要整罗瑞卿了。平时对罗颇有意见的林，在借机向罗发出了严重警告的同时，便不失时机地向毛表示忠诚，并开始了倒罗的部署。可惜罗没有“吃透”警告，还以为他是毛的红人，林整不了他哩！

林彪是如何察觉到毛要整罗瑞卿呢？据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回忆：

“罗不是政治局委员，却曾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列席者，这是一个不可等闲视之的荣誉。但有一阵不让他列席了。原因是毛岸青（笔者：毛的痴呆儿子）夫妇的生活一直是由罗照应，‘四清’运动时，韶华（笔者：毛岸青夫人，江泽民时期授少将军衔）为了锻炼而到农村搞四清，罗知道岸青要人照顾，就劝她不要去，后来韶华坚持，罗考虑再三将她安排在离北京很近的地方，一旦有事可以马上回来。毛知道了这事很不高兴，罗也就被取消列席常委会的资格。当时一位知道内情的老同志给罗打招呼：‘罗总长啊，知不知道常委会为什么没要你来啊？’这老同志肯定是知道的，其他常委想必也会知道（笔者：常委林彪当然也会知道），但没有谁觉得有什么不正常。过了一段时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吴君旭护士长对毛泽东说，韶华去四清是她自己提出来的，根本不是罗总长要求她去的。这才解开了毛泽东的疙瘩。罗又能去列席常委会了。”

罗点点在回忆中还记载了另一件事：

“1965年5月，江青找到爸爸，说她对军队和军装都很有感情，希望有一套新的军装和帽徽领章。罗为了照顾江青同志的感情和维护现役军人的尊严，只发给江青一套军装，没有发领章和帽徽。这种不肯通融的做法，引起江青极大不满。”

点点说的对广大老百姓来说不可思议：**伟大领袖胸怀若谷，怎会如此小肚鸡肠？**但对熟悉毛泽东品格的林彪来说，这些信息对他非常重要。

猎鹰的双眼，决不会放过更为重要的信息：

1964年12月26日，在毛的生日晚宴上，毛当着众训斥刘少奇；1965年1月，在政治局会上，毛，刘又首次公开冲突；此时的刘少奇，在党内、政府中的势力已据主导；原先被毛看好的彭真，邓小平，已完全倒在刘少奇一边；党内外特别是在众多中、高级干部看来，毛最多是作为一个偶像而存在；自1963年以来，毛已发觉他在党政中被逐渐架空；到了1965年，毛已下定决心要打倒刘少奇；而此时，毛所倚重依靠的军队，实权已逐渐转移到贺龙和罗瑞卿手中；生性多疑的毛，并不信任贺龙，一旦毛、刘摊牌，贺龙的态度是个未知数，等等。——党内这种复杂而尖锐的权力斗争形势，怎能逃出林彪的鹰眼？

毛泽东所信任的罗瑞卿呢？自1959年出任总长、军委秘书长、特别是1962年出任书记处书记后，大权在握，自认为在军中有毛、贺支持，在政府中有刘、彭真撑腰，在党内有邓应援，大有取代林彪之势，因此，作风强悍，飞扬跋扈，除贺龙外，其他老帅大将都不在他的眼里，甚至许多事情也常绕过林彪直接向毛请示回报。而林彪呢？为怕与毛的红人罗瑞卿争锋，被毛怀疑夺权，自1962年夏天后，在罗咄咄逼人面前，无可奈何地“托病”逐渐放权，再次“卧薪尝胆”，等待时机。看出军内形势的刘少奇，为了架空毛泽东，也对罗采取亲近拉拢的态势。1965年5月他曾公开说：“**我们国防部长的接班人是罗瑞卿。**”罗也经常向刘、邓请示工作。党内右派势力也乘机散布说：“国防部长和军委第一副主席的位置由一个‘病人霸着’，总不是一件好事。”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权大盖世，上必除之，何况罗有依附于刘、邓的嫌疑？毛泽东听到传闻后，发觉大势不好，便开始了“倒罗弃贺”的新部署：他一方面严厉申斥林彪“**不抓大事**”、“**放权**”，另一方面秘密召见另一得力助手叶剑英、毛的“好学生”总政主任萧华和忠臣副总长杨成武，令他们注意贺、罗动向，收集有关“反对突出政治”的材料，同时晋升杨成武为第一副总长和军委副秘书长，做好了随时接班的准备。

遭到申斥的林彪终于等到了机会，便当着陶铸对罗发出了警告，并在备忘录中恶狠狠地说：“**大捧别人，大跟别人，回京后根本不来见面……让他做绝**”“**当作又一彭黄也**”。

权力资源是有限的，权力欲与占有欲却是无限的。在一切都取决于个人意愿的氛围中，很多问题并非原则之分、主义之争，核心不过是权力的转移。**权力的转移或再分配，就需要不断的斗争去实现**，这就是毛泽东“**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哲学。

有人认为，打倒罗瑞卿是毛泽东为换取林彪支持的一笔政治交易；但笔者认为，这是毛泽东一箭三雕的权术：**严惩不忠、警告观望和安抚林彪**。

了解中共内情的人都知道，他们要打倒谁，上面所说的理由是拿不到台面上来的。为了使广大干部和百姓们信服，他们必须在**至诚、至爱、至情、至理**上大做文章。

打倒罗瑞卿的第一个“至理”的罪状是：“大比武冲击政治”。

六十年代初，南京军区十二军军长李德生少将在某部二连蹲点时，发现二连副连长郭兴福训练有方。在李德生的重视下，迅速出现了一个训练典型：**郭兴福教学法**。本来对林彪大搞“三八作风”、“四个第一”、“活学活用”和“突出政治”颇有微词的罗瑞卿，在叶剑英元帅的支持下，使郭兴福的教学方法迅速在全军走红。对此，罗点点回忆道：

“时光很快就流转到 1964 年。回想起来，也许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事情有了一点变化。父亲周围的许多事开始变得别扭起来。那年 1 月里，叶剑英同志在南京军区视察时，发现了郭兴福同志的军事教学法很有特点。……叶剑英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向毛主席写了报告。毛主席看了报告十分高兴，大加赞许。林彪看了报告也表示赞许。毛主席批准了叶剑英的报告。军委还在 1 月 3 日指示全军，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学习这种练兵方法的广泛深入的群众运动。……父亲向林彪报告后于 1 月下旬到南京军区召开了现场会，对郭兴福教学法的推广进行具体的组织和研究，并通知了各大军区、各军兵种都派人参加……

“父亲的本意是十分明显的，军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祖国，军队战斗力的不断提高自然是他这个总参谋长的主要任务。……父亲总认为，突出政治不能光是一句话。政治也从来不是空头的。……军队当然应该拿出点像样的训练成绩来向党汇报。这不仅是部队建设的需要，而且实际上搞好了也是给突出政治从另一角度做个补充，是一件锦上添花的事情。

“父亲以他特有的热情和敏锐，成功地组织实施了这个轰动一时的‘大比武’。

“毛主席对每项精彩的表演都鼓了掌。

“面对这些可喜的成绩，军委各位领导同志以及毛主席、周总理都给以密切的关注。父亲多次陪同周总理、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观看军事表演。这一年的 6 月 15 日、16 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了北京、济南部队的军事训练。正在北京开会的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同志也都观看了军事汇报表演。

“毛主席对每项精彩的表演都鼓了掌。在看完擒拿格斗表演后，毛主席还对画有蒋介石头像的沙袋说：‘老朋友，久违了，我也打你几拳。’毛主席还在观看表演的时候说：‘北京、济南部队的表演很好，要在全军普及。’‘部队要练夜战，近战。’‘夜老虎连要普及，现在可以一个营先搞一个连，将来要使全军都成为夜老虎。’”

从当年新闻报导上来看，罗点点的回忆基本属实。但在当时“养病”中的林彪，已经窥测到毛怀疑罗的态度，便于 1964 年 12 月就当时部队工作中的问题发出指示说：“有的部队只抓军事技术，不抓政治思想，甚至弄虚作假，搞锦标主义和形式主义。这样下去，必然会把政治工作冲垮。”他针对全军大比武说：“要把这个风煞下去，很快来个转弯，不转变部队就会被搞得不像样子，就会吃大亏。”

罗瑞卿的把柄终于被抓住了。1965 年 5 月，军委就军队战备问题举行会议。会议总结发言理应待报毛、林后由元帅叶剑英代表军委作，但罗事先未请示即以会议主持人身份作出总结发言，把叶帅晾在一边，从而引起了元帅叶剑英、聂荣臻和上将萧华、杨成武、李天

佑等人的不满，使他们联合在一起向毛告御状。此时，在其打倒刘、邓的战略部署中已经对罗的立场产生了怀疑的毛泽东，借机申斥林彪“不抓大事”、“放权”。林彪招此批评，十分恼怒，借机对罗说：“要加强通气”，并说：“你过去的通气是有的，但不够，要加强。”并对通气问题作了五条规定。不久，毛泽东为确保在对刘、邓的斗争中军队的绝对忠诚，就开始了逐步解决贺龙、罗瑞卿兵权的部署，任命杨成武、李天佑分别为第一副总长和主管作战的副总长，在罗瑞卿不在京期间主持总参工作。与此同时，发现并积极推动全军大比武的叶剑英，摇身一变，成了批评大比武冲击政治的元帅，开始按毛、林安排收集起罗瑞卿冲击政治的材料来。洞悉毛心迹的林彪，便向夫人叶群面授机宜，叶群迅即以电话告知海军副司令李作鹏中将。1965年11月27日，李便同海军副司令王宏坤上将、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少将三人写信状告罗瑞卿，称其阴谋篡权海军，并罗列了他十条罪状。同落井下石一样，相互揭发，也是毛泽东用分而治之之策控制高级将领的重要手段。

在完成上述部署后，1965年12月2日，曾热情支持过大比武的毛泽东，在兰州军区党委关于第55师“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上作了这样的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毛还骂“罗个人独断，罗是野心家。”发出了整罗的信号。兰州军区的报告是杨成武首先“发现”的。早想扳倒罗的第一副总长杨成武，“发现”报告后，便飞报给林彪。林看到这份报告如获至宝，很快上呈毛泽东。这样，杨成武取代罗瑞卿只剩时间了。

在批示前的11月29日，毛的秘书通知叶群马上来杭州向毛做全面汇报。为了给打倒罗瑞卿找个“至情至理”的理由，同时缩小打击面，不惊动刘、彭、邓、贺龙等人，毛故意在叶群面前就“作战会议总结发言”和“五级干部定级问题”大骂罗瑞卿：“罗长子不是军委主席么！也不是军委副主席么！党内也不是政治局委员么！怎么由他做总结发言？有的老师（笔者：指叶剑英）组织了一个班子，准备了一二个月的总结发言稿，怎么不让这位老师做总结？听说罗长子的总结发言事先没有经过军委其他领导看过？大将也不只他一个么！现在许多元帅和大将怎么没工作干了？党政军的工作就靠罗长子一个人干？中央的五级干部定级的名单上怎么连国防部长的签批也没有？”骂声传达了明确支持林彪的信息。本来对罗不满的叶群，同毛一唱一和地骂起罗瑞卿来。

于是，便产生了倒罗第二条“至理”的罪状：“罗瑞卿反对林副主席！”

洞悉毛泽东思想的林彪，即命叶群同他的爱将空军政委吴法宪中将，编织了“烛影斧声，千古之谜”式的罪名：空军司令刘亚楼上将临终遗言。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与会者竟然扩大到了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叶群。这个被史称为的上海会议，会前，除毛泽东、林彪、叶群、杨成武和少数几个人外，连中共第二把手刘少奇也不知道会议内容。叶群在会议上作了3次共约10个小时的发言，句句针对罗瑞卿。她说，刘亚楼临终前，她去看他时，他对她说：1963年以来我几次想和你谈四条意见，是罗总长交代让我谈的。这四条意见是：1、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林彪也是要退出政治舞台的；2、要保护林彪的身体；3、林彪再不要干涉军队的事情了，由罗瑞卿去管好了；4、放手让罗瑞卿工作，一切交给罗瑞卿负责。叶群还历数了罗瑞卿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向党伸手等个人野心的罪行。面对叶群这个“死无对证”式的揭发，毛泽东“深信不疑”，迅速做出了“罗是野心家”的结论，使多数与会者茫然不解。10日，被通知从昆明来上海参加会议的罗瑞卿，一下飞机便失去

了自由。在毛泽东时代，这种颠覆法制文明的逮捕，早已司空见惯：对权贵如此，对下层百姓更甚！

人们不禁要问：英名盖世、明察秋毫的毛泽东怎么会相信叶群那种“死无对证”的胡言乱语？当想起当年庐山会议期间，由于罗瑞卿告密，就导致“彭、黄、张、周”被打成反党集团的那件事，人们就会看到这样的结局是“理所当然”的：在向刘、邓党内右派集团夺权决战前夕，毛以毛、林联盟和以莫须有的罪名拿罗瑞卿祭旗，并警告所有观望者和潜在的叛逆者。在“死无对证”的置疑眼神中，会议根据叶群的揭发，做出了撤销罗瑞卿的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的决定。

1966年1月初，毛泽东晋升在“倒罗(瑞卿)弃贺(龙)”的部署中的有功之臣叶剑英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并兼任原来罗瑞卿所兼任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军委秘书长等职。另一有功之臣杨成武上将，被任命为代总参谋长。

使人困惑不解的是，一个发誓“生是毛主席的人，死是毛主席鬼”的罗长子，在上海会议上还是个“反对林副主席”分子，但在三月叶剑英主持的会议上，一下子就变成反党、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阶级异己分子，是暗藏在军队中的赫鲁晓夫！这对于一贯忠于毛泽东的罗瑞卿来说，那委屈、那痛苦、那悲愤已经使他精神崩溃了，于是他绝望地一跳……

这一跳使既得利益者、因好色被人称为花帅的叶剑英元帅，诗情大发，改写辛弃疾《贺新郎》词中一段，讽喻背叛：

将军一跳身名裂，（笔者：辛词原句为“将军百战身名裂”。）

向河梁，

回头万里，

故人长绝。

许多人对叶剑英的幸灾乐祸颇有微辞。另一既得利益者杨成武上将，马上为叶帅圆场说：“这是惋惜。”杨成武全然不顾事实，又欺万里中华无词人。

更为惨烈的是：南京高级步兵学校教员郭兴福全家自杀！

在毛的中国，上层权力的再分配，必然祸及下层。罗瑞卿倒台后，郭兴福遭了殃。

郭兴福，山东邹平县人，1930年2月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1948年9月，济南战役时起义参军，淮海战役中荣立三等功一次。194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第十四步兵学校毕业后分配到12军34师教导营，后调到100团二连任副连长。在任副连长期间，他从实战需要出发，研究摸索出一套教学训练的好方法。军长李德生发现了他，并在12军内推广他的教学训练法。被誉为“郭兴福教学法”迅速走出12军，走向南京军区，走向全军。郭兴福因而被调到南京军区高级步校当教员。

1963年4月至10月，郭兴福应邀到了广州、武汉、沈阳军区，做了数十场表演，参观见习人员数以万计。

负责训练工作的叶剑英元帅在给军委的报告中写道：

“我于十二月二十三日（笔者：1963年）到南京，二十四日到镇江参加总参军训部召集的郭兴福教学方法现场表演会，看了郭兴福以及南京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以后所涌现出的许多优秀教练员和先进分队的八个课目的表演(总共有十九个课目)。看了以后，大开脑筋，大开眼界。充分说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

报告中还说：“总之，郭兴福教学方法已为广大群众所公认，自动要求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已自下而上的酝酿了很久，有几个军区已经正式作出了决定，条件已经成熟，建议军委发一个指示，在全军中加以推广，号召各军区，各军种、兵种、部队和学校及至民兵，结合本身的特点，学习郭兴福的教学方法，发扬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培养郭兴福式的教练员，借以掀起一个军事训练的高潮，进一步使军委有关训练方针、原则落到实处，大大提高训练的质量。”

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收到叶帅的报告后，立即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笔者：向毛泽东报告过程，与罗点点的回忆稍有不同)。毛泽东很快作了批示，对此表示赞赏，并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

1964年1月3日，中央军委转发了叶剑英的报告，号召全军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热潮。

为了检阅由“郭兴福教学法”引发的全军大练兵的成果，中央军委决定在全军进行一次全面的军事训练比武运动。1964年5月15日，总参、总政发出了《关于全军比武问题的通知》，拉开了全军大比武帷幕。

从6月到7月上旬，各军区、各军兵种的比武基本结束。从7月到8月，在总参谋长罗瑞卿的组织下，全军分18个比武区展开了全军大比武(不包括海军舰艇、岸炮、航空兵部队)。据不完全统计，全军参加比武的共有3,318个单位，33,000多人，在3,766个项目的角逐中，共评出694个尖子单位，3,070个尖子个人。6月15日、16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了北京、济南部队的大比武，都倍加赞誉。正在北京开会的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同志，也都观看了军事汇报表演。从6月到9月的全军大比武，被军史称为“百日辉煌”。

然而，到1965年秋，当毛泽东发现罗有投靠刘、邓嫌疑后，曾被他赞誉过的“全军大比武”，成了“冲击突出政治”、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罪状，他的忠臣罗瑞卿则被他臭骂为“散布一套折中主义”的“野心家”，迫其跳楼自杀，但积极推举“大比武”而与刘、邓保持一定距离的叶剑英，却安然无事，还获得晋升。

中国有句谚语叫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颠倒过来呢？在毛泽东时代，人们早已习惯了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一人落难，亲朋遭殃。遗憾的是不少人认为，这种潜规则理所当然！

生活在这种**充满封建株连规则**的氛围里，被李德生将军发现、被叶剑英元帅推举、最后被罗瑞卿总长看重的“郭兴福教学法”的创建者郭兴福，便随着罗总长的倒台而惨遭大难。

因被罗瑞卿看重而获“罪”的**郭兴福**，被戴着高帽子、坐在笼子里游街。有一次，他在气温高达 40 度的南京大街上，在水泥道路上爬行，爬一步磕一下头，膝盖上的鲜血把裤腿浸得点点黑红，豆大的汗珠在水泥路留下斑斑汗渍；有时还要手拿稻草大声说“我是罗瑞卿的孝子贤孙”，“我有罪”，“我罪该万死”……一个刚烈汉子，遭到如此蹂躏，他的身心受到了多么大的摧残啊！他绝望了；丈夫落难倍受歧视凌辱的妻子**李淑贞**，也绝望了。他们商量，**用全家自杀来抗议迫害**。与妻子抱头痛哭后，他要先“送走”他所疼爱的三个儿女——6 岁的儿子钢钢、4 岁的女儿炼炼和 2 岁的儿子久久，因为，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血统论横行的中国，他怎能忍受留在世间的三个儿女被当成反革命“狗崽子”任人欺凌？当看见他的三个儿女惊恐地望着他在抽泣、在啼哭的时候，他的心跳动得几乎要破胸而出。他无法抑制住双手的颤抖，但决心已定：神志上的歇斯底里，使他咬紧牙根，野兽般地扑向他的儿女，用颤抖着双手一个接一个地把他们活活掐死，然后与妻子一起通电自杀。然而，电把他俩打懵却没有打死。妻子李淑贞醒后，见丈夫、孩子已死，砸开窗户，跳楼负伤。被剧烈撞门声震醒过来的郭兴福，跑到厨房，拎起菜刀猛砍了自己十多刀，绝望地倒在自残的血泊中。撞开房门闯进来的邻居们，目睹了那血淋淋的令人毛发悚然又令人心碎的惨烈场面！三个小孩死了，郭兴福和妻子李淑贞被抢救了过来。郭兴福以**反革命杀人罪**被判处死刑，李淑贞被判处两年徒刑，监外执行。

呜乎！年幼无辜的**钢钢、炼炼、久久**，你们来到人世间的社会主义中国，难道命中注定要你们为**大比武**殉葬？命中注定要你们当**造神**运动的祭品？命中注定要你们用短暂的一生为中共上层的**权力斗争**付出生命代价？

谁是杀害他们的真犯！谁是杀害他们的元凶！公理何在！

死刑消息传出，正直的人都噙着眼泪愤愤不平。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原 12 军军长李德生，先后出面多方工作，才将郭兴福改判为 20 年徒刑，多少擦掉了一些挂在人们脸上的泪珠。

李淑贞已经没有眼泪，她常常坐在儿女的坟前发呆，久久不甘离去。好心人们常开导她，她也常不无懊悔地对人说：“当时我晕了，咋没有去挡他！”

毛泽东死后，度过十余年监狱生活的郭兴福被释放了出来，恢复了军职和官衔；但巨大的悲痛已经使他变得冷漠、苍老、珠黄。八十年代初，当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采访他时，见他“原先那么虎虎有生气的人仿佛死过一回，动作迟缓，眼睛里没有一点光彩，思想和语言都带有那种心灵破碎所固有的冷漠和偏执。他没有丝毫失去那可怕的记忆，一举一动在都告诉你，他对那些恐怖场面记忆犹新，或许他只生活在那些可怕的记忆里。”

1985 年，在儿女忌日那天，他曾想剥去双手，妻恸曰：“我们做过一次傻事，不能再做了！”他有所回心。然而一天，目光突然冷峻的他，骑着自行车，鬼使神差地与汽车相撞，结束了他五十五年辉煌、惨烈、悲凄的一生。

据说不久后，李淑贞在郁郁中死去。“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终于给这个家庭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都是后话。

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向更高层次上发展，“最高”、“顶峰”、“最最”、“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说教和口号，相继扶摇直上。在“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们看来，致伤、致残、家破人亡，给胜利者带来的不是困顿，不是郁闷，也不是怜悯，更不是悔恨，而是愉悦、舒畅、欣慰和颠狂。

23-荒唐的学《毛主席语录》运动

帖子由 于松然 » 2024 年 1 月 14 日

作者 于松然

林彪、罗瑞卿对推动毛泽东个人崇拜运动的最重要贡献是编发《毛主席语录》。（下图）



各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给林彪名字上打 X，发生在林从副统帅摔死成反革命之后.jpg (22.54 KiB) 被浏览 1141 次

1960 年 3 月，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提出：“毛主席有许多警句你们要把它背下来……我主张就是要背一点东西，首先是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最精辟最重要的话背下来，脑子里就是要记住那么几条……”并提出“要带着问题学习，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学习方法。1961 年 4 月，林彪在部队视察时，更明确地指示：为了使战士在各个时期、各种情况下都能及时得到毛主席思想指导，**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的有关语录**。该报便从 5 月 1 日起，开始在每天的报眼上刊登毛泽东语录。1962 年 2 月 3 日，总参谋长罗瑞卿在《解放军报》毛主席语录宣传小结上曾批示：“大型辑录形式好，以后还可以用。”于是，到 1964 年 1 月 5 日，由《解放军报》编辑田晓光负责编辑的《毛主席语录 200 条》征求意见本出版了。

1965 年 5 月，在总政领导和各部部长参加的集体讨论会上，讨论和审定了再版的《毛主席语录》。会议一致通过了再版《毛主席语录》的《前言》和全书的 33 个专题、427 条语录。由于林彪曾明确指示过：“毛主席语录本在部队很受欢迎，现在每班一本太少，大家抢着看不够用，要多印一些，一定要发给每人一本。毛主席著作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毛主席著作选读本和语录本，要像发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因此，总政为了达到军内每个战士人手一册，计划印刷发行 420 万册；但由于地方各级领导都来部队要《语录》，实际发行量大大超过计划，增到 1,213 万册。

凡是经历过“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的人们，都不会忘记当时被誉为“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由于林彪和罗瑞卿的鼓吹和推行，**毛泽东、周恩来、江青等权贵们强有力的支持**，这本小小册子，很快风靡全国、遍及全世界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创造了我国图书出版发行数量的最高纪录。这本有“东方《圣经》”之称的《语录》，从 1964 年 5 月问世到 1979 年 2 月 12 日中宣部发文通知停止发行时止，在短短 15 年内，仅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总数，就有 10.5 亿册！如果加上文革初期“造反”组织以及各机关、团体、部队、厂矿等翻印和私自编印的在内，其数量之大，更为惊人。又据报导：仅文革几年内，国内外出版的用 50 多种文字印成的《语录》，就有 500 多种版本，总印数高达 50 多亿册。其中，向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的《毛主席语录》，高达数千万册。还有报导说，法国、德国、瑞典、印度、马来西亚、刚果（布）、朝鲜等 21 个国家，用英、法、僧伽罗、泰米尔、印地文、旁遮普、朝鲜、孟加拉等 24 种文字自行翻译出版的《毛主席语录》，也有数百万册。其中，日本翻译出版了近 30 万册。据当年政府统计，当时全世界 30 多亿人，男女老幼人均持有《毛主席语录》1.5 册以上。因此，《毛主席语录》被国际上公认是“**二十世纪世界上发行量最大、读者最多的书**”。自此，在一些中国人的心目中，毛泽东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也是“**全世界人民的伟大导师和领袖，中国也因而成了世界革命中心，成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响往的胜地！**”

在中国，人手数册的《毛主席语录》，把中国变成了红色海洋。（下图）



红色海洋

红色海洋.JPG (10.16 KiB) 被浏览 1141 次

对于“红色海洋”，有人曾这样描述：

“曾记否，二十多年前，似乎在一夜之间，‘红宝书’忽然在中国大地掀起了红色海洋，呼啸澎湃，浩瀚无边。《毛主席语录》在人们手中飞扬，口里传诵；‘最高指示’响彻云霄，语录歌声昼夜不断。大街小巷所有的建筑物，里里外外都敬书高悬语录牌，全中国成了一个‘红彤彤的世界’。”

那时，全国除毛泽东本人以外，上自副统帅林彪，下至每一个学龄儿童，无不每天随身携带这本小红书《毛主席语录》，随时随地都要进行朗读或背诵，时称“天天读”。

每天早晨起床梳洗后，要举行敬祝仪式，即站在毛主席像前，行三鞠躬礼，手擎《毛主席语录》，口中念念有词：“**敬祝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然后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结

束仪式，时称“**早请示**”。晚上上床睡觉前，如法炮制，时称“**晚汇报**”。除了这种标准的宗教式的敬祝仪式外，还有唱歌、跳舞等敬祝形式。

也许有些读者发问：信奉唯物主义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怎会举行这种荒诞不经的宗教仪式？甚至有人可能认为，笔者有意用这种虚假、荒唐的无稽之谈来蛊惑人心。笔者是否在弄虚作假？否！读者请看敬祝仪式种种（下图）：



敬祝仪式种种-自左至右：1、林彪、周恩来在毛左右两边敬祝 2、病人在病房里敬祝 3、舞蹈式敬祝.jpg (22.34 KiB) 被浏览 1141 次

除“早请示”、“晚汇报”外，在上下班前后，在会前会后，在饭前饭后，在火车、轮船上，都要按时举行敬祝仪式。时称“**时时祝**”。

牛鬼蛇神一类“坏人”、犯罪分子没有“早请示,晚汇报”的资格，就“早请罪,晚请罪”：在毛泽东像前低头弯着腰站着，保持着请罪的姿势。

这种敬祝仪式，以它不变的、统一的、单调的表演，能逐渐消蚀人们的活动力、识别力、判断力和批判力，攫走人的情感和责任感，并使崇拜和臣服内化定型为一种惰性生活方式，一种奴化了的精神族群。这都是毛泽东所期望的。

除“天天读”、“时时祝”外，还要处处学习《毛主席语录》。请看下面一组“**处处学**”（下图）：



“处处学”《毛主席语录》.jpg (48.19 KiB) 被浏览 1141 次

总之，田间地头，工地车间，校内课堂上，军队演练中，都要拿出一定时间来学《毛主席语录》，不学便视为对毛主席不忠！

待人接物时，更要颂扬《毛主席语录》，时称“**事事颂**”。在人际交往中，也要像对口令一样用毛主席语录呼应。有人在文章中这么写道：

老太太上街买菜，对售货员说：“‘**节约闹革命**’，请给我称两斤菠菜”

买卖成交后，售货员答：“‘**为人民服务**’，这是找你的两毛钱。”

尽管这有戏谑之嫌，笔者并没有遇到过，但相信有存在的可能。

笔者打电话曾遇到过尴尬。那时电话不是自动接线，而是由总机人工连接。通常打电话者摇通总机，总机小姐便问：“喂，要哪里？”打电话者回个地址后，电话就会很快接通。但在《语录》盛行特殊年代里，通话“规则”大变。有一次我摇通了总机，传来了总机小姐的声音：“‘**反对自由主义**’，要哪里？”由于我没有先背段语录就说了要通话的地址，接线小姐当即拔线挂机，无论我再怎样摇机，对方也不搭理。无奈下，只好到别处找电话再打。

除“天天读”、“时时祝”、“处处学”和“事事颂”外，《毛主席语录》还是攻防利器。人们拿着《毛主席语录》，就像拿到了“尚方宝剑”，既可以攻击别人，也可以防卫自己。巴金在劫后的一篇《要有个艺术民主的局面》文章里，有过一段形象描述：

“有一个时期我们每天要举行几次‘请示’、‘汇报’、‘祝万寿无疆’的仪式。别人在我们面前念一句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于是我们就成了该打倒的‘反动的东西’。他们又念一句：‘**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于是我们就成了‘极端反动的人’”。他们再念一句：‘**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要进行批判**’，于是我们就被当作‘牛’给关进了‘牛棚’……”

在派性斗争中，由于造神运动向更高层次发展，毛泽东言论成了“最高指示”、绝对真理。因此，在两派大字报的你来我往、面对面的唇枪舌剑、对峙广播站的互相攻讦驳辩中，双方都根据自己的需要，从《毛主席语录》里引出对自己有利的条条，借以攻击和诘难对方，于是，便出现了滑稽的、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具有毛式奇特的“语录战”！如一方振振有辞地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对方便还以颜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文革派性斗争中，这种以“文斗”方式进行的“语录战”，到头来，多数都演变成了“武斗”，最后决定胜负的，仍然是拳头、棍棒和冷、热兵器。

中共在毛泽东逝世后的权力交接中，最高领导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里，居然也发生了“语录战”：一方说毛泽东的遗嘱是“**按既定方针办**”，一方说是“**按过去方针办**”。孰是孰非？这种在暗箱中操作的权力斗争游戏，只有天知、地知、当事人知，人民群众不得知。最后，老百姓知道的仅仅是：“四人帮”被“粉碎”。

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世界人民导师和领袖”毛泽东，必然要用他的《语录》作武器，

推向国际社会，直接用于“反帝、反修”支援世界革命的战场。例如，1968年4月16日，他曾以“世界人民导师和领袖”的身份，发表了干涉美国内政的“**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号召美国人民起来“**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于是，豪情四射的毛的“群众”们，频频以《毛主席语录》为武器，干涉他国内政，制造了多起外交事件：

“我驻X国使馆造反派，在大街上散发印有‘造反有理’语录的传单，东道国提出抗议。(笔者：‘X’，引录的资料原文如此，下同。)

“去X国援建的工程人员中的造反派，要在工地上竖起一块‘**社会主义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巨幅毛主席语录标语牌，当局不同意，他们集合抗议，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

“我驻非洲X国使馆的造反派，在公共汽车里朗读毛主席语录，在街头向来往行人硬塞‘红宝书’和毛主席像章，引起所在国群众愤怒。

“我驻X国使馆造反派，拦住蒙黑色面纱的伊斯兰妇女，宣传毛主席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遭到臭骂。

“1966年，我国派出一个青年文艺小组到与我国友好的法国访问演出，他们在每个节目表演前，都要先念一通毛主席语录，观众对此很反感，台下发出一片嘘声，越念嘘声越厉害。大使馆的同志们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很难过，建议他们不必每一节目前都念语录，但文艺小组领导坚决不肯，说节目前念语录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创举。台下喝倒采，他们说观众大多是资产阶级，敌人反对正说明我们是正确的。大使黄镇和宋之光为了维护中法友谊，对他们说，如果不接受使馆意见，就不要再演出了。这才使他们不得不做了让步。但到1967年，回国后的宋之光被扣上了‘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帽子，挨批斗，‘坐’了‘喷气式’。

“1967年，我国69名留英、法等国的学生，回国时途经苏联，到红场高声朗读毛主席关于反修防修的语录、与苏联警方发生冲突挨了打，30多名学生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其他留学生义愤填膺，成立了留学生总指挥部，准备组织莫斯科的百名留学生，再次去红场‘血战到底’！被陈毅签发的特急电报制止，差一点在莫斯科酿成大血案。

“留在巴黎的留法学生，听说第一批回国的留学生在红场挨了打，立刻带上了刷子，提上油漆桶，排队准备到苏联驻法大使馆去写标语，走到半路就被法国警察截住了，也挨了打，并被法方用囚车押送飞机场，逐出法国。”

在一系列丑陋表演碰壁后，到了1970年，自以为是的“世界人民导师和领袖”毛泽东，才不情愿地下令说：“**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这与两年前他号召美国人民起来“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的革命豪情，大相径庭。由是，毛泽东的“群众”们，在国外的荒诞行径才告结束。

《毛主席语录》在国外受阻，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无法发威；但在国内，不要说非议，任何对《毛主席语录》的不尊重，都会受到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严惩！

主编《毛主席语录》的《解放军报》编辑田晓光说：

“编选《毛主席语录》本来是件好事(笔者：看来田晓光不愿反思)，万万没有想到，竟由此引出了一系列‘《语录》案’，最后连我这个‘始作俑者’本人，也成了‘案犯’。”她还披露：

“北京x大学哲学系主任、有名的康德专家，由于席地而坐时，垫在屁股底下的笔记本中夹着一本《毛主席语录》，被打成反革命，从此，被撵下了‘无产阶级的讲台’，发配到锅炉房烧锅炉。

“解放军总部直属单位有位同志，在参加会议时，不在意把手中的《语录》本插进了翘起的‘二郎腿’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批斗外，还要继续对他进行审查。他惊恐万分跳楼自杀。

“编辑《毛主席语录》时，她的唯一助手张凯夫往毛主席头像上打×，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抓了起来。她也因此被株连，审查后打入‘牛棚’。”

她还抱怨，到1971年林彪出逃自我爆炸后，她又被隔离审查，审她在编《毛主席语录》过程中与林彪有什么联系。她说：“真是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的田晓光有所不知，在河南省许昌市，笔者亲眼目睹一个名叫**王华民**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枪杀于许昌东关汉朝晁错墓碑前。他的罪名之一是把《毛主席语录》垫在桌腿下。如果田编辑知道这件《语录》血案，是否能有所愧疚？这里，笔者没有要她承担什么责任的意思。

最兴的往往不是最持久的。1971年，随着林彪折戟沉沙于蒙古国温都尔汗，被个人崇拜搞得晕头转向的中国人，似乎有所醒悟，红色海洋的狂热也因之退烧。接踵而至的是，《毛主席语录》这个“红宝书”，也从亿万人高擎的手中悄然落下，到毛死后，完成造神运动历史使命的“红宝书”，最终被扫进垃圾堆里，并从曾为此发烧过的人们生活里淡忘、遗弃、消失。但许多在忠君封建思想熏陶下的中国人，对“红宝书”的风行，不愿反思，也不忏悔，甚至愚顽得附和御用学者们的刻意说教：“这是历史的必然”！